

# 布迈丁言论选编

161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译 者 说 明

《布迈丁言论选编》所收材料自 1965 年 6 月 19 日布迈丁上台至 1973 年 9 月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为止，共二十篇。内容涉及阿尔及利亚内政外交、中东问题、阿拉伯世界、第三世界以及所谓阿拉伯社会主义等问题。各篇材料按年代顺序排列，标题和提要均为译者所加。材料来源主要根据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机关刊物《非洲革命》(周刊，法文版)和 1973 年《圣战者报》(法文版)。另选译美国《现代传记》月刊发表的《胡阿里·布迈丁》一文，附录于后。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外国语学院法语教研组、《法汉词典》编写组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法文组的部分同志。

1973 年 11 月

## 目 录

关于本·贝拉问题答开罗《金字塔报》记者问 (1965年*)	1
纪念阿尔及利亚独立三周年的讲话 (1965年7月)	21
在东部五省党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6年3月6日)	29
在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1967年2月)	58
在市镇人民议会主席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2月27日)	64
在阿拉伯社会主义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1967年5月)	72
在“七十七国”集团第一次部长级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10月)	84
在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8年6月)	93
在全国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9年10月30日)	124
在视察阿尔及利亚各地时的讲话(1970年7月,10月)	140
对从前线奉召回国部队的讲话 (1970年8月)	153

---

\* 此处年月日系译者所加。原材料有的未注明确切日期，故目录中有的篇名后所注月日不全。

在阿拉伯律师联合会第十一届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70年9月) .....	164
在劳特菲上校客运自管制企业分红大会上的讲话	
(1971年2月) .....	172
在签订有关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两国边界和双边经济	
合作条约的签字仪式上的讲话 (1972年6月) .....	181
在市镇人民议会主席第七次全国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1973年2月) .....	186
接见意大利电视广播记者时的谈话 (1973年4月) .....	193
在第四次圣战者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73年5月) .....	200
在庆祝土地革命全国日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73年6月17日) .....	209
在6月19日复兴运动八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1973年6月19日) .....	216
在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1973年9月5日) .....	225
附录:	
胡阿里·布迈丁 .....	238

## 关于本·贝拉问题答开罗 《金字塔报》记者问

开罗《金字塔报》特派记者在阿尔及利亚 1965 年 6 月 19 日政变后，走访布迈丁，向他提出以下三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借助武力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总书记本·贝拉赶下台？（二）本·贝拉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三）布迈丁从支持到反对本·贝拉的全过程。以下为布迈丁回答的主要部分的节译。

你问我们为什么不通过党的途径<sup>①</sup>。这个问题确实提得恰当，但是答复要联系到党的存在问题。是不是？党是否存在呢？它仅仅存在在纸上，存在在墙上的标语上，其它就没有了。不幸得很，人们以为，特别是在国外，人们以为一个党只要有一个纲领，一个章程，一些组织规则，一些塞满革命词句的刊物和关于党的诱人的词句，这个党就成为现实的东西了。

本·贝拉不愿意阿尔及利亚、战士们的阿尔及利亚建设一个合乎人情、生气勃勃、有所作为的先锋队的革命

---

<sup>①</sup> 访问者在此提出为什么不通过“党的途径”而采取军事政变手段推翻本·贝拉的问题。——译者

党。为什么？因为这样一个党真正存在的话，会制止他的随心所欲，妨碍他操纵一切。它会监督、支配从下到上的一切权力，而本·贝拉，他的性格使他反对任何束缚、监督和批评，以便于他个人支配一切权力。他自认为是阿尔及利亚所等待的先知。对他来说，他的一切行动都是正确的，他的一切想法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讲这些丝毫没有夸大之处。他对人讲话时总是说：“我来到你们这里，负有神圣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不容置疑的。负有神圣使命的人是不受监督的，他不会错的，因此他不需要批评。他不愿意知道神圣使命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你和我们不少兄弟是朋友，他们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成员，你可以去询问他们有关这个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实际情况。他们是否有一天讨论过阿尔及利亚的国内外政策？他们是否参加过一次决议，即使只参加一次？他们是否有一天决定过一项要求政府干预某一件事的决议？在各部的组成问题上，他们是否表示过自己的观点？他们所做的仅仅是认可那个负有神圣使命的人不征求任何人意见而擅自做出和执行的决定。他们就跟一般读者一样，通过报纸来了解国内外政策。如果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的某一兄弟反对这种情况，要求讨论一件事的话，那个先知就会大发雷霆，指控这个人敌视社会主义，勾结反动派。至少他也会对这个人讲出一些人类尊严所不能容忍的侮辱性的话。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里有我们对神圣使命论的揭露和我们认为必须在党内尊重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及必须按党的需要为使党担负其职责提供机会的意见。但是本·贝拉继续拒绝使党及其机构

发挥作用。

豪基奈·扎胡阿奈本人在当时还是自由的，他印发传单指责我们搞军事独裁，他过去也曾经站出来反对本·贝拉的态度，认为他不懂得党。6月19日后，我见到他，我们长时间地谈论了这个问题，他对我提出了和你同样的问题，我对他作了同样的答复。他承认这个他称之为本·贝拉的根本性错误的事实。尽管承认，他还是不自觉地做出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行动，不过这些行动并未对任何人产生影响。因为，如果说扎胡阿奈在国外可能是被人所知的話，而在阿尔及利亚却没有人知道他。现在他只能对他的行动感到懊悔了。因此，如果说党的最高领导机构，象受骗的丈夫一样，到最后才知道实情，那么下级组织又会怎样呢？对于全国性的问题却没有动员人民，对于在阿尔及利亚建设社会主义却没有宣传解释的运动。

不论行政管理和制定方针方面，还是在真正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建设阿尔及利亚方面，党都没有真正参加。这并不是说党内没有真诚的战士，而是说这些战士受到压制，无能为力，他们曾向上面呈递数十份报告和情况分析，但一无结果。这些报告和分析一直没有启封，堆在那里，等到6月19日以后党的书记处组成时，它们才开始被研究。

如果说有少数战士能够成为党员的话，那么大部分战士却是被党所摒弃了。甚至还对他们进行了一场真正的心理战，依靠的是那些从来没有参加过革命的人，或者是依靠那些外国顾问和冒险家，他们控制了党的某些机



构。你怎么能想象一个革命的党在一个革命的国家竟然能够由一些外国人来制订政策和领导，这些人满嘴空话，玩弄一些社会主义的口号。除了阿来蒂饭店的酒吧间或者圣乔治饭店的露天咖啡座，他们对阿尔及利亚根本一无所知。

现在请你告诉我，我们能通过党的途径办事吗？这是一条不存在的途径！你这简直是要我们把阿尔及利亚引到虚无中去。本·贝拉故意反对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党。例如，他曾经突然决定免除布特弗利卡的外交部长职务，布特弗利卡提出要把这个问题先提交政治局或者中央委员会才能接受。本·贝拉断然拒绝。

我从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会议回来时，本·贝拉告诉我这件事，我回答他说，作为总理，他有权选择自己在政府中的合作者，但应由国家和社会所确定的总政策来作决定。如果外交部长犯了错误，要撤掉他的职务或确定其权限，那就必须提出客观的理由。负责讨论和判断这些理由的合法范围，是部长会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我问他为什么不把问题向这些机构摊开来呢？他原则上表示拒绝，后来他又装作改变他的决定了。但是军队内外的战士们给我们带来了秘密制订措施的消息和文件，这些秘密制订的措施是反对国内革命力量的团结和军队团结的，它肯定将使阿尔及利亚面临灾难。我们应该闭上眼睛不顾这个危险呢，还是采取撤换本·贝拉的行动？因为他这个人已经不称职，已经辜负了战士们的信任。为了铲除个人崇拜，使社会主义的阿拉伯的阿尔及利亚及其战士继续自己的革命道路，我们只有采取6月19日的



行动。有些人由于他们对阿尔及利亚的现状和军队不了解，出于善意或者是出于恶意把这次行动描绘成一次军事政变，说它是在二十四小时内通过少量坦克的突然袭击搞成的。而我们，我们说这是战士们为了把阿尔及利亚革命从本·贝拉一手造成的对革命的背离、死气沉沉的局面、以及个人崇拜的毒害中拯救出来而采取的革命的合法道路。

……你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到本·贝拉的那些错误。

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不认为革命委员会的公告是不明确的。相反，公告既明确而又详细。独揽大权、个人崇拜、背离革命路线等等，我们都谈到了。然而，我在这里还是可以向你举出革命委员会揭发的几点错误，是主要的错误：

1. 本·贝拉阻挠团结所有战士为在真正社会主义基础上建设独立的阿尔及利亚而建立先锋队的党。他对这方面的一切建设性的努力都进行破坏。

2. 他不去组织一个革命的阿尔及利亚国家，阻止一切对行政机构进行根本改革的尝试，因为这会从负责岗位上清除所有与殖民主义者利益勾结的机会主义分子。

3. 他排挤、清洗曾经积极参加革命的战士，容许机会主义分子窃据负责岗位，个人发财致富，危害人民。我不需要再向你引证阿卜杜勒·拉赫曼·谢里夫在这方面的例子。

4. 侵犯公民的自由，对公民横加速捕和严刑拷打，这仅仅是出于恐吓和个人动机，而毫无证据和理由。也许你已经感到奇怪，本·贝拉这个“社会主义者”，这个

“民主主义者”，6月19日垮台以后，还在黑暗的牢房里关着两千五百名犯人，由我们这些“军事法西斯分子”把他们释放出来。他逮捕了两千五百名战士，而我们在6月19日以后只逮捕了五个人，竟然还有人根据他们的“科学”分析，认为我们是一些法西斯分子。

5. 侵吞公款，用来从事阴谋活动和政治交易，以达到加强他个人权力的目的。

6. 经济政策的全面失败，特别是农业政策的失败。造成失败的原因正是他主观武断的干预和对自己所犯的种种错误的掩饰。

7. 对革命力量的团结和国家人民军的团结不断蓄意进行破坏活动。

8. 使革命背离原来的路线，从集体领导变为个人专权。而这个人专权正是在揭发了梅萨利派领导中的机会主义和背叛，把梅萨利推翻以后，为革命所废除的。

.....

事实上这还不是全部错误，不过我刚刚举出的这些错误，也许足以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了。我现在来回答你的第三个问题。

你对我说：“你们今天谴责本·贝拉犯的那些错误，当他犯错误的时候你们是和他共同担负领导责任的，因此，你们也应该因参与领导而负有责任。”你还说：“当时你们在哪里？特别是你，布迈丁先生，你在哪里？”问得合乎逻辑，我应该承认。但是你不认为还应该增加一个主要的问题来问我们吗？这个问题就是：“你们看到这些错误时又做了什么呢？”

事实上，我们开始时倾向于把其中某些错误归之于缺乏经验或者不理解。当我的同事们和我，我们坦率地向他表明对他的错误的看法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道歉说：“看在真主的面，原谅我吧，我的兄弟们，我受骗了。”这就使我们越发相信造成错误的原因可能是那些能够欺骗他的错误情报。当然我们接受了他的道歉，因为我们对他的诚意是没有丝毫怀疑的。但是当错误开始增加，而且变为指导他全部行动的政治体系的时候，我们开始发生怀疑。因此我们才考虑到由于这些错误我们对国家负的责任问题，因为我们参与了政权。我们决定提出辞职，面对历史，为了人民，从此对这些错误“不承担责任”。也许这还是第一次，我要向你吐露一个秘密：几位兄弟和我，我们在1964年4月召开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大会的前一个月，向他提出辞职，理由正是为了这些错误和他在党组织内排斥真正的战士所采取的反革命手段。我们对他说：“我们不能再跟你合作，不能再不顾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良心对你的错误担当责任了。”本·贝拉听了我们辞职的意图，显得很慌张，他和我们开了几次会，在这几次会议中我们十分坦率地一一指出他的错误。他承认了一部分，其余的他坚持说不知道。他又照老样子发誓赌咒（应该承认他有夸耀自己的诚实和掩饰他的不忠诚的本领），决心改正错误，回到集体领导和团结革命力量的政策上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接受了他的请求，收回了我们的辞职要求。

在那个时期，我们原来打算把一切都交给他，向人民宣布我们对那些已经引起人们不安、经常受到批评的

错误完全不负责任。但是他拒绝了,因为那样一来,真相就会暴露,他为了让我们对错误、逮捕、罪行、经济失败和全国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负责而玩弄的那些阴谋诡计和弄虚作假的真相就会揭穿。

但是,在他拚命赌咒发誓向我们做出的保证的基础上,我们同意继续同他合作以后,我们很快就看出他不诚实,更进一步还认识到搞阴谋诡计是他为了诽谤中伤、排挤战士、断送革命而达到树立个人威信所喜欢采用的手法。这一次我们认为提出辞职是消极的办法;不在灾难扩大以前,不在阿尔及利亚沉没在无政府状态和混乱中以前,结束他的鬼蜮伎俩,那就是逃避我们的历史责任。意识到这个责任,我们发动了6月19日运动。如果没有深深地感到这个责任的重大,我们就不会采取行动。在这以后还能认为我们应该对那些错误负责吗?

.....

在你的第三个问题中还有另外一点。我想谈谈自从独立以来我们和本·贝拉之间的关系。有一个主要的历史事实必须加以澄清:我们没有支持本·贝拉反对其他倾向。老实说,自从1961年起在民族解放军和临时政府内外的战士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涉及到与革命的进行和前途有关的许多无比重要的问题。使得政府成员之间对立的误会和他们一心一意想攫取权力而彼此勾心斗角所制造的阴谋,使我们感到惊讶。他们在这些企图的驱使下,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妄图把他们的分裂带到战士中间,破坏战士们的内部团结。不仅如此,每一个部长都图谋把一些机会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收罗在自己

周围,以反对自己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预算大大超过了用在军队和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士方面的预算,对他们的武器、粮食和药品等的供应都漠不关心。这些老爷们乐于在瑞士、纽约和其他大都市的豪华旅馆里过安逸舒适的生活。他们完全脱离了革命,脱离革命的现实和革命战士;他们的利益从此与人民和革命的利益发生矛盾。就是这样,他们最后建立了一个向后退的领导。正好在我们向他们指出现实情况、对他们说“你们是在背叛革命”的时候,危机爆发了。

这次危机的性质是什么?这次危机起源于职业政客同革命战士之间的各种倾向和利益的冲突。我们对民族解放军和所有担任领导的战士坦率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我们对他们讲明我们不可能同已经背叛革命的职业政客合作共事,但是正值我方同法国就自决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因此使问题复杂化。殖民主义可能从中捞到好处。因此我们宁愿辞职。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作为参谋部的成员,向军部提出了辞职。但是战士们拒绝接受。他们要求我们继续行动,根据既定原则担任我们的职务,即以集体领导为基础,排斥企图左右阿尔及利亚命运的机会主义者和职业政客,为建设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进一步制订一个明确的行动纲领。

在这期间,埃维昂谈判达成了协议。下面我也许要向你泄露一个秘密,当时我是反对这些协议的,在阿尔及利亚全国革命委员会为此举行的会议上,除自决权问题外,我都投了反对票。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这

些协议是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它同我们的战斗和一百五十万烈士的牺牲是不相称的。

当时，我们同关在法国的被称为“五位历史性人物”的本·贝拉、埃特·艾哈迈德、赫德尔、比塔特、布迪亚夫进行了接触。为了让大家都看清形势，我们向他们摆明我们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分歧。最后，埃维昂协议批准了，“五位历史性人物”也获释了。于是阿尔及利亚全国革命委员会举行会议。我们强调必须在回到阿尔及利亚以前确定一个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纲领。同时，我们同意建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集体领导班子。但是我们发现有人觊觎政权，企图从人民手里夺取烈士们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果实，这时候我们是多么失望啊！

我们起来坚决地反对这一切。因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作出决议，把我们排除出民族解放军总参谋部。但是这个决议出自一个无权作类似决定的机构。再说，这个决议也被战士们和民族解放军摒弃了。这时候，本·贝拉就来和我们说，支持我们的意见和立场，并且站在我们一边反对觊觎政权的职业政客。不用说，我们非常欢迎他，并且同他一起继续我们的行动。我们经过顽强的工作，并且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战胜了1962年夏季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我们数以百计的最英勇的战士不幸成了受害者。我们对本·贝拉的态度是革命者对待革命者的态度。但是我们不久就发现，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意识与倾向，他是职业政客一流人物，根本不是革命者。难道他不是革命前那些谄于政

治阴谋、但毫无成就的旧党派圈子里培养成长的吗？至于我们，我们没有变。而他则相反。一些事例使我们看清了他的真面目，一个伪装革命、玩弄权术的政客的真面目。他唯一的企图就是欺骗别人，统治别人，建立他的个人权力。

三年来，本·贝拉老是谈党，先锋队的党，领导的党，干部……但是这一切究竟怎样呢？十足的空话，空话，成吨的纸张，印得漂亮而内容空洞的口号。这样说丝毫没有夸张。今天，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言词变成现实，把纸张变成有生命的实体，把没有实质的结构变成能动的和负责的现实。如果我们不完成这个任务，那么6月19日运动就等于白搞。

……我们先得就政变的精神和性质商榷一下。军事政变实际上是一批属于正规军的军人借故进行的纯粹军事行动，旨在夺取政权，为自己的利益或反动势力的利益服务。这些反动势力支持他们的目的，就是反对人民的意志，满足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然而我们不是雇佣军。我们首先是战士，是农民和劳动者的子弟，是无愧于这个称号的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我们事先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我们拿起武器同殖民主义者进行战斗。就是这样一些战士，在解放战争中组成了我们的民族解放军，在获得独立后组成了国家人民军。他们是些什么人？是人民，是革命，是深信阿尔及利亚是属于阿尔及利亚人的、并以人民的名义拿起武器实现这个信念的革命战士。后来，他们之所以站起来，是因为他们深信背离路线的危险已经威胁革命——



他们的父母兄弟中曾经有一百五十万烈士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们之所以站起来，我认为，是为了纠正背离路线的问题，为了恢复革命的合法性，为了重新赋予革命原则以其全部价值。所以这不能叫作军事政变。他们不过是对人民尽了革命的责任。诚然，坦克曾经出现在某些街上。但是为时多久？只有二十四小时，并且纯属对付破坏企图的安全措施。当破坏分子慑于人民的愤怒躲到角落里去后，坦克就撤回了。

难道还举得出什么可以被认为是政变的特有表现吗？

难道宣布过哪怕一分钟的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或宵禁？

难道在公民中进行大规模的逮捕了吗？我们释放了两千五百名被捕的人，我们只逮捕了五个人。

有没有触及或解散群众团体或国家机构？

六百名新闻记者，6月19日那天在全国各地，之后又在为亚非会议作准备。他们之中有没有人看到任何可以称为军国主义的事实？

把6月19日运动说成类似拉丁美洲的那种政变，是否正确，或者，是否客观？拒绝正视现实的人总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想象错误地解释历史。例如他们已经错误地把1952年埃及的七月革命看成是一次军事政变，理由是埃及军队的坦克上了街。但是他们不去看看坦克的大炮对准什么方向，是对准国王和殖民主义，还是对准人民。他们也不懂得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兄弟组织和领导的自由军官并不是雇佣军，而是战斗的、革命的埃及青

年。今天，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6月19日事件上重犯了同样的错误。关于这一点，有必要强调指出，国家人民军是由革命战士而不是雇佣兵组成的。

再说，如果6月19日运动是一次违反阿尔及利亚人民意志和利益、同民主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相矛盾的法西斯军事政变的话，它还能成功，甚至坚持下来吗？

观察家是否会想到，“6月19日谁和本·贝拉站在一起？”七年半的激烈战争经验把阿尔及利亚人民锻炼成老练的、坚定的革命人民，如果他们确实支持本·贝拉的政策和领导方式，那么，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前主席从美丽别墅里赶出去。你说什么是人民？难道不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士兵以及党、国家和驻外使馆的战士们吗？这就是组成我国人民的一千二百万人。有没有一个士兵、一个工人、一个农民或一个有觉悟的知识分子站在他一边？你可能会说：那么首都的学生示威呢？我可以回答你：关于这些示威的情况，参加的人有多少，年龄有多大，请你去问随便哪个公民，去问任何一个在阿尔及尔的外国记者。你就会知道，不过是一两百个少年，年龄最大的还不满十五岁。我们用水龙头一浇，他们叫闹一番就散了……一些迷途的年轻人……现在我们来谈第二个看法。

你谈到本·贝拉，并把他描绘成一个从职业政客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典型政客。我得向你承认，这种描绘同我所能够认识和证实的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本·贝拉显然是有矛盾的。诚然，我不能断言，我的认识和经验具有绝对的价值，但是我可以这样说，本·贝拉对待社会主义、对待进

步的阿拉伯革命、对待非洲革命等等所采取的众所周知的立场,使他在我心目中以一个革命领袖的形象出现,而不是以一个一味想攫取权力的职业政客的形象出现。

阿尔及利亚有句格言:“蝙蝠见了鸟儿张翅,遇到老鼠露齿。”这就是说,蝙蝠随着环境的不同,把自己装成鸟或者老鼠。本·贝拉,还其本来面目的本·贝拉,在阿尔及利亚的生活中正是扮演着蝙蝠的角色。他是那样令人惊异地善于变换颜色,迎合交谈者。比如,他在同一段时间里接见极右的、极左的、中间的、东方的、西方的等等人物,每个人离开时都会深信不疑本·贝拉是与他站在一起而反对另外的人。可是,革命者是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的人和一切倾向的。为什么?因为,从革命者本性来说,他需要作出抉择,并且投入行动。革命者的抉择总是向着人民、向着革命和向着社会主义的。至于职业政客,他不可能抱定一种抉择,而是适应各种矛盾和各种倾向。他跟随各种潮流,玩弄手法。

他接见过你,并且象社会主义者那样同你谈论社会主义。随后他接见资本家,以资本家的语言与他交谈。你只看见过本·贝拉的一副面孔。否则你如何理解他能在同时把象阿卜杜拉·拉赫曼·谢里夫、穆罕默德·哈尔比这样一些彼此绝然对立的人拉在自己周围呢?他打算把这些人放到各种不同的场合去。

社会主义?在阿尔及利亚建立社会主义的肯定不是本·贝拉。如果说是他,那是对社会主义的侮辱,对全心全意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的侮辱。不,社会主义不可能也不会是单独一个人的意志的产物。这首先是特定现实

所提出的最高使命；这是一个民族卓有远见的选择。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以他们的革命、他们的先烈、他们的良心以及他们的利益，选择了社会主义；是阿尔及利亚的现实为美好的未来客观地提出来的社会主义。

但是在本·贝拉的思想 and 行为中，社会主义不过是满足他个人报复欲的手段，他要对反对他的个人权力和独断专行的人进行报复。

他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把一些人的财产没收，而把另外一些同样情况的私人财产保存下来。社会主义需要建立一整套经过认真规划、毫无例外适用于一切人的措施和法律，而不是心血来潮的决定或简单的个人反应。

把一家小饭馆或一家小理发店国有化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什么好处？计划化哪里去了？一再谈论的发展计划和土地改革进行得怎样了？

此外，他时常谈论的社会主义究竟是怎样的呢？他时而称之为卡斯特罗式的社会主义，时而称之为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时而又称之为伊斯兰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可以接受所有这些称号吗？这完全是对社会主义毫无用处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他对待阿拉伯主义也是这样。在开罗，他是阿拉伯主义者；在欧洲国家，他又不是了。有一天，他硬对我们说，“在非洲，我们不应该作为阿拉伯主义者来行事，而应该仅仅以非洲穆斯林的身份来行事，要避开一切关于阿拉伯主义的思想，因为阿拉伯主义在非洲不受欢迎。”我们强烈地反对，坚决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政策。我们既是阿拉伯的一员，又是非洲的一员。我们应当在文化和进步方面与阿拉伯主义紧密地联

系起来。

我们还要向非洲兄弟解释，我们的阿拉伯主义丝毫不包含象殖民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那种反动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作为一般世界文化和特殊的非洲文化组成部分的革命文化。开罗成功地采取了这一态度。

革命精神？我要指出，革命精神并不是向革命运动奉送明知不能兑现的诺言。其后果是明显的：被这些诺言所迷惑的革命战士遭到屠杀，而有人则坐享其成，得到个人的荣誉和称颂。

同样，革命行动也不是放弃对干部的培养、无视对国家和党的巩固、建设，而抱定宗旨让自己保住绝对的主宰者的掌权地位。

你知道阿尔及利亚有两百万失业者吗？本·贝拉除了激昂慷慨的言词和演说以外，哪里有什么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

我们唯一的愿望是让你看看阿尔及利亚城乡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象在某些作家笔下那样的城乡面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人奉命写作，拿的却是公家的钱。

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消失，并没有使我用我所不愿使用的言词来描写这个人，即使这个人叫本·贝拉。

我没有指名道姓地讲这个问题<sup>①</sup> 有两点原因：首先，所有上述的错误都证明了他的叛国罪。否则，这种无政府状态、这种破坏革命战士、革命力量的团结以及破坏党和国家的阴谋，就无法解释了。

---

<sup>①</sup> 访问者在这里提到关于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公告中对本·贝拉“叛国罪”的指控问题。——译者

其次，由于某些非常确定的原因，革命委员会不能让有关这一指控的事实公开。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有事实、有证据、有书面材料的，而这些事实证据和材料甚至某些担任领导职务的我们极其亲爱的阿拉伯兄弟都确认不疑。我知道你在东方为这个指控感到不快。显然，这是因为一件突然揭发出来、不为人们所知的事实才引起这样的反响。而我们在发动6月19日运动时就料到了这样的反响。……

我们庄严宣告：阿尔及利亚是阿拉伯的阿尔及利亚，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个人的愿望或者政治上的考虑。不。阿尔及利亚是阿拉伯的阿尔及利亚，因为不论从现实、历史、人民的旨意和民族的文化、命运以及共同的利益来看，都是如此。我们并不是从革命开始才是阿拉伯人，我们很久以前就是了。我们起源于十四个多世纪以前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这是一个客观的基本的论据，使得阿尔及利亚由于它的人民、它的地理和它的命运而属于非洲。正象不能使阿尔及利亚和它的阿拉伯主义分离一样，同样也不能使阿拉伯的阿尔及利亚和它的非洲主义分离。所以说，阿尔及利亚是阿拉伯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同它是非洲大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样。关于巴勒斯坦和被占领的南阿拉伯的解放事业是决定性的问题，是首先和我们利益相关的。非洲的殖民地也是同样情况，就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对待这些问题应该以负责者的身份行动，而不是以支持者的资格行动。由于历史的相邻关系，联系着阿拉伯马格里布各国的兄弟情谊是十分牢固的，我们积极维护着这些国家的团结。但

是这种团结应该引导到什么方向去呢？马格里布团结不应该建立在会和阿拉伯马格里布和阿拉伯马科雷克(Machrek)之间的团结发生矛盾的基础之上。

殖民主义在东方和阿拉伯马格里布之间制造分裂和划分人为的边界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过去我们软弱是因为我们处于被分割状态，今天，在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的人民和民主的基础上的一致团结，使我们获得了力量。

阿尔及利亚重视阿联的人民、军队和领导人的努力，重视他们在巩固也门的革命事业和共和制度所担负的历史使命，阿联在也门的行动是以我们全体的名义进行的，是以阿拉伯人民的名义、阿拉伯文明的名义和人类历史的名义进行的。至于我们的非洲政策，我只要提醒你注意我们和非洲以及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兄弟般团结就够了。当我们还在进行解放斗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奉行这一政策，因为我们坚信自由是一个整体。在战争时期，我们看到非洲的不同国家、甚至古巴的战士加入民族解放军的队伍，接受军事训练，感到十分骄傲。

今天，我们全力以赴继续奉行这一政策，阿尔及利亚掌握它自己的命运有多久，这一政策我们就要奉行多久。

认为有可能使一个国家从它的四周环境中孤立出来，或者削弱它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想法，这样的想法在我们的时代是无法实现的。我们在强调恢复国内形势的时候，丝毫也没有忽视我们在各国间的合作方面所担负的革命任务。因此，我们在建设作为阿拉伯的和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在采取



积极的中立主义和亚非团结政策的同时，我们充分意识到，在对待世界战争、世界和平、对待在尊重各国人民的充分自由和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的和平共处等问题上，我们应负的责任。我们还要谴责任何形式和任何来源的殖民主义侵略，要求清算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此外，为了减少工业国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生活水平的不人道差别，我们坚决要求采取严肃的行动。

这种局势应该成为每一个人最关心的事。的确，这种局势所具有的不光彩的特点丝毫也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感到光荣，就在目前，殖民主义进行的战争仍在耗费大量的金钱，同时，一场疯狂的核武器竞赛正在进行。

如同我对你说过的那样，如果我们建立一个不结盟的国家，也就是说我们不参加这个集团或那个集团，我们主张和所有国家在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合作，我们并不因此而不重视我们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友谊。我们同样也很重视在平等的基础上把我们和法国联系起来的合作关系。

现在我们特别要谈一谈我们和阿联的关系，我有意在此之前不谈这个问题。关于这点，我应该坦率地说，世界上有某些势力对阿尔及尔和开罗之间的兄弟般的紧密合作感到不舒服。这种合作在我们的世界上表现出一种崭新的革命力量，联系着两个国家的兄弟情谊绝不是某些个人的功绩，也不是个人关系的产物，而是从革命运动本身，从引导革命运动的目的，以及从两国的共同利益产生的。这种兄弟情谊不是权宜之计，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行动，而是坚决战斗的历史经验的客观产物，换句话

说，是在两个国家都牢固生根的人民意志的结晶。阿尔及尔和开罗永远肩并肩站在一起，这是自然的和必要的。这就是我们在6月19日以前和以后的抉择和信念。现实的力量、历史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将使我们永远也不会改变我们的信念。

译自《非洲革命》第145期，1965年11月6—13日

## 纪念阿尔及利亚独立三周年的讲话

1965年7月，布迈丁为纪念阿尔及利亚独立三周年代表革命委员会在电视广播台发表讲话，谈到6月19日以后阿尔及利亚国内形势、民族解放阵线党与国家的关系和经济建设方针；在国际方面表示要加强同非洲、阿拉伯国家、世界进步与和平力量的团结，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以下译文略有删节。

在独立后三年当中，我们的国家又一次面临着考验。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怀念我们光荣的烈士和所有曾经为阿尔及利亚获得自由和独立而出生入死的爱国者。

七年半战争的回忆，永远鼓舞着深受苦难的人民的激情，激励着战士们的革命行动，他们可以当之无愧地继续从事民族独立的光荣缔造者的事业。

6月19日，革命委员会在向全国发出的一项公告中强调指出了局势的严重性，这种局势促使革命委员会承担起具有历史意义的责任。

欺骗和动荡不安的局面已成过去。历史上的这一篇章从此结束了。

个人专权的不正常的错误路线深深地破坏了我们的

体制。

权力的混乱和集中,对革命干部的清洗,使得唯命是从的政策成为政府的制度。

独裁者企图束缚和制服国家的有生力量,使国家机关僵化和停滞下来,并且企图制造救世者的神话,从而蓄意破坏革命法制。

其结果是造成一种可悲的局面:权力被各种政治集团或行政派系所削弱,采取了蛊惑人心的社会主义概念,国家瓦解,党也瘫痪了。

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情况同样糟糕。耸人听闻的孤立的行动,通过偶而举行的集会或会晤当场作出决定,其目的实际上都只是为了在心理上对付群众和个人,掩盖浪费国家财富和国家预算的有害政策的混乱和矛盾。

但是,企图奴役全国人民而不受惩罚,是办不到的,因为全国人民曾为争取革命原则的胜利和美好的未来而斗争和受苦受难。

尽管有骗人的外表,但是个人专权本身就包含着走向灭亡的种子。因此,6月19日的复兴运动,是我国革命的历史逻辑所规定的。

.....

6月19日,革命委员会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承担了义务,重新发扬了我们历史传统,恢复了遭到嘲笑的人民的尊严,恢复了被践踏的人民主权,恢复了我们党——民族解放阵线——的真正革命先锋队的作用,以及建立了一个严肃的和有组织的国家,以保证革命永远继续下去。

民族解放阵线将是一个生气勃勃的作为革命先锋队

的政党，它将根据民主集中制进行活动，并且将由经过考验的战士们组成。

它的任务将是根据的黎波里纲领和阿尔及尔宪章，进行规划、制订方针，起鼓舞和监督的作用，而不是管理或代替国家。

在这种前景下，将召开一次真正的代表大会来自由地指定党的各个组织机构。

另一方面，必须建立一个以道德为基础、真正承担社会义务并尊重我们阿拉伯和伊斯兰传统的国家。

我们必须健全我们的体制，建立能保证纪律和革命制度，使国家和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受任何压力或请托的真正有效的国家机器。

国家的行动将依靠有生气的行政机构的稳定、精通业务和有效率而保证继续贯彻。

总之，使国家成为执行前后一致政策的真正工具，这是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

通过合法机构制定的国家体制，将使人民的意志得到体现和产生一部符合革命原则的宪法，从而铲除个人专权的一切祸根。

司法将对所有的人一律平等。它将避免专断和任何压力。它将不是任何人的政治工具而将是革命的工具。

这一切合理制定的体制将能组织国家内外的生活。

有了符合人民需要的体制和机构，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势必能确定我们国家政策的有力的路线，根据我们的基本抉择而进行合理的组织和有计划的管理。这是革命委员会所主要关心的。

我国独立已经三年了，我国真实的经济情况究竟如何？

取得的结果同我国人民作出的牺牲不相称，同他们的正当合理的抱负不相称，也同我们现实的可能性不相称。

如果说最坏的事情是避免了，如果说一些成果得到维护，这首先要归功于农民、工人以及他们的政治成熟。正是他们，而且只有他们创造了工人和农民的自管制度。个人专权企图把自管制度归功于自己，实际上，它只不过是承认了既成事实而已。而它拒绝认真地组织社会主义部门，这就分散了革命力量，致使工人对管理不感兴趣，甚至造成浪费和滥用生产资金。

过去三年的经济情况具有如下的特点：

- 生产下降，
- 生产资金减少，
- 其他部门停滞不前，
- 区域和部门之间的差距加剧，
- 经济上的无组织状态引起不安全感，使得群众的联合和工人的竞赛无法进行，
- 明显的财富集中和投资的完全告缺。

这种严重的局势是不顾阿尔及利亚的现实而把经验主义、无益的鼓动、草率从事、大而化之的做法作为政府施政方法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和出尔反尔的措施，盲目地只根据表面的没有根据的现象美化现实的倾向，使得劳动群众和好的国家干部的努力化为乌有。

在财政方面，一种树立威望和大肆宣传的政策使国

库的管理弄得不象样子。

使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这是一种蛊惑人心的和不负责任的态度。不能分享战利品而尽情消耗，而问题是要改造我国的经济和为此动员国家的一切力量。

我们必须首先调动我们国内的力量。在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的国际援助只能是辅助性的。还必须创造安全的条件，以保证国内投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抉择范围之内大大发展，保证有效地动员储蓄，保证全国人民积极参加争取经济复兴的努力。

在现阶段，整个经济问题是经济的领导问题和工作方法问题。急于求成，缺乏预见，盲目专权，同时又是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虚伪的乐观主义，因为听不进去而拒不承认显而易见的真象，直到6月19日前，上述种种到处存在着的明显情况，必须永远清除掉。

从今以后，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已是死去的东西，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作即将开始。我们的子孙后代决不会单凭言词而是将根据行动来作出判断。必须自觉地和有决心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而努力。

今后不准夸夸其谈并草率从事，不准浪费并损害自管原则，自管制度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抉择的前提之一。

在农业方面，因为农民在革命中起了推动作用而势在必行的土地改革，必将通过组织机构而促成群众参加国家的发展工作。

在国际关系方面，1954年11月1日所体现的阿尔及利亚革命，是属于争取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各国人民的



广大运动的范围之内。

今天一如既往，阿尔及利亚革命将始终忠于这一基本抉择，并将作出不懈的努力以加强在战斗中建立的同所有被压迫的人民的团结。

值此阿尔及利亚独立三周年之际，阿尔及利亚向从巴勒斯坦到南非为结束殖民统治和种族隔离而进行斗争的英雄的各国人民致以兄弟般的敬意。在帝国主义日益富有侵略性并对所有小国进行威胁的情况下，阿尔及利亚保证给予各个解放运动以坚持不懈的全力支持，并给予它们政治和物质上的支援。阿尔及利亚始终认识到，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必须加强自己的队伍，提高警惕，不断加强他们之间的积极团结。

阿尔及利亚同马格里布、非洲、阿拉伯各国以及世界上一切进步与和平力量的团结，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政策正是从这种团结之中得到启示和吸取生气勃勃的力量。我们国家深切地珍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和阿拉伯联盟的各项原则，它将对为非洲大陆和阿拉伯世界的解放和统一所作的努力不断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国家确信，马格里布的实现是一种历史必然性，因为它符合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而且它的根基就是这些国家的人民的深切愿望。

阿尔及利亚为争取和平与进步而采取了行动，为反对剥削和不发达状态而进行了斗争，这样，阿尔及利亚就站在面临同样的困难和遇到同样的障碍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一边。

将于 11 月间在我国首都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将

是一个机会，可以有成果地交换意见，开辟新的前景，以便同心协力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争取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自由发展采取有效的行动。

我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下定决心，要珍惜地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坚持自己的不结盟政策。在国际方面，我国的行动将决不讨好奉承，同时决不容许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干涉。我国的行动是基于明确的原则，是忠于我们的基本抉择的，不会有任何沙文主义，不会有虚妄的威信考虑，以便能同我们的真正责任相适应。

阿尔及利亚决意倡导在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同各国人民合作的健全政策。它重申决意保持和加强同所有国家的现有联系，特别是同第三世界各国和社会主义国家。它根据三年的经验满意地注意到自己同法国合作的政策的积极成果，这种逐渐适应现实的合作，将在相互信任的气氛中和正确估计两国各自的利益的基础上得到保持和发展。

在国际方面，我国的声望首先取决于我们国内建设事业的成功。而这种成功取决于明确认识当前局势的严重性。放任自流、只是为个人威望和政治利益而有计划地浪费国家资财的政策使经济与财政受到严重损害。复兴是可能的，但是要通过严格的节约，必须在各个部门，首先是在党和国家的生活方面，实行严格节约。

这要求公民更好地守法，要求负责人必须克己奉公。首先迫切需要有组织，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坚持不懈地作出努力。但是，考虑到国家的正当合理的抱负的我国政策，是以我国的现实为基础的。归根到底，我们国家的希

望将取决于每一个阿尔及利亚人的意志，取决于对我们的最优秀的女儿为之牺牲的那些原则的忠诚。

至于革命委员会自己，它决意要恪守在 1965 年 6 月 19 日的公告中所宣布承担的义务，它将致力于落在它身上的巨大任务。它将在争取进步、正义和众人幸福的道路上，坚持不懈地作出努力。

光荣属于我们的烈士们。

译自《非洲革命》第 128 期，1965 年 7 月 10 日

## 在东部五省党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6年3月3日至7日，布迈丁视察东部阿尔及利亚时，在党的干部会议上再次讲到6月19日运动发生的原因及其深远意义，并进一步阐明民族解放阵线与国家的关系、干部的职责、工农业自管制、土地改革、司法改革等问题，以及阿尔及利亚与阿拉伯马格里布、阿拉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以下译文略有删节。

战士兄弟们，战士姐妹们，负责人兄弟们：

我以革命委员会和政府的名义向你们致敬，并向你们表示，我非常满意看到这次国家东部干部大会的召开。

我向你们致敬，你们是党、国家、国家人民军、工人、农民和这个以作出英勇抵抗和巨大牺牲而久享盛名的地区的代表。

我向君士坦丁城的人民致敬。他们从来没有使阿尔及利亚民族失望过。正象你们知道的那样，自从殖民主义企图在这个地方称霸以来，他们就英勇抵抗殖民主义。我只消提一下就够了：这个城市每一寸土地、每一条街、每一个地区、每一幢房屋，战斗都打得很激烈。

最后我向这个城市所有的居民、向我国东部所有的

居民致敬。

兄弟们，你们每个人想必都明白这次会议的真正含义和它的深远意义。

这次会议，所有的组织都参加了，它聚集了所有君士坦丁地区的干部，代表党、国家、国家人民军、工人和农民。会议是在“革命团结”的旗帜下召开的，是在“革命行动”和“革命力量之间最广泛的协调”的旗帜下召开的，这对国家和革命的前途是一件带根本性和必要性的事。

.....

这次会议之后，将在本月召开另外一次会议，国家西部干部会议。这一系列的会议将以在首都召开的会议告终，参加这次会议的将不仅包括阿尔及尔地区的干部，而且还有国家东、西部的干部。

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努力，目的是使各地区的干部之间配合、干部和基层之间配合以及基层和最上层之间配合。

我们相信——历史证明如此——沿着这条路走，我们就能给予6月19日运动以真正的内容，我们就能回到革命的源泉去，这个革命是劳动群众、先进力量和革命力量的革命。这将是人民团结的最好保证，继续革命的最好保证，也是避免革命再次走上歧途的办法。

这个地方的政治斗争中遇到的个人专权是梅沙里·哈奇干的。我们不怕点他的名，因为这是历史。梅沙里·哈奇最初是第一流的民族主义者，但他走上歧途，使他陷入叛国投敌的泥沼。

对权力的向往、骄傲自满和极端自私使他认为他就

是一切，而基层是零，战士是零。这样他就孤立，固步自封，最后是叛国投敌。再也没有比从敌人那儿拿来武器打革命战士、打人民、杀害人民的子弟并在这块土地上无耻地犯罪更大的卖国罪行了。

这就是对权力贪得无厌和自私自利而做坏事的例子。当这些念头左右了—个人时，这个人就以为自己是一切而别人都是零。这件事发生于1954年以前，更确切地说是1953年，我们在革命以后的漫长岁月中都吃过这样的苦头。

1954年的革命并不是在个人专权的旗帜下，而是在它的废墟上发动的，是在一个明确的基础和原则上发动起来的，这就是集体领导。这是我们都经历过的历史事实。但是在1962年以后，国家又吃了个人专权的苦头。现在让我们以最大的坦率来回顾—下。我可以以今天掌握政权和国家命运的战士兄弟们的名义告诉你们：他们并不指望你们感谢或给他们报酬。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认为我们的义务。这个义务还没有完成，只有为了祖国神圣领土曾献出生命的人才算是尽了义务。至于活着的人，只要他们坚持革命和社会主义，他们就应该得到支持。

但是，坦率地讲，我们并不要求无条件的支持，我们要求对自己的行动和事业有信心的每个战士决不可放弃革命警惕性。因此，凡是背离革命道路的人都要从领导岗位上拉下来。个人总有一死，可是人民和革命将永垂不朽。

6月19日运动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思想的体现。

6月19日，我们没有说我们是真主的特使，也没有说我们带有真主的启示。我们知道真主最后的启示是由先知穆罕默德带来的。我们没有说我们是或想要在这个牺牲了一百五十万烈士的国家当领袖。命运注定我们在斗争中亲手埋葬一批又一批圣战者，并把一些人推向死亡。所有这些都不要忘记，每次我们谈到革命，就必须想起这些事，以使战士们和基层组织能永葆革命青春。

我们有义务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告诉你们一些事情的真相，使你们每个人有深刻的印象，并清楚地负起责任来：我们向每个战士讲，向每个属于国家机器或别的机构的兄弟讲，谁不在这个基础上同意我们，他就应当放弃他的职权。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坦率是法律和信仰的产物。革命的语言是坦率的，因为一个强大的革命是不怕坦率的。革命的领导也不怕坦率，他们坚信他们是为本国人民真正的利益服务的，是为劳动阶级服务的。谢里夫、贝勒卡塞姆兄弟刚才发言，提到了1962年我们经历过的形势，提到了当时产生的分歧，这些分歧使我们每人分属一派。我个人和这里在座的许多弟兄就属于某些派别。你们一定知道，我们所属的那一派那时自认为是最革命的，是加强这场革命的一个因素。

这就是我们在1962年所想的。我们作为党员，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说话的时候，我们不怕作自我批评。

我们说那时候我们在犯错误，因为这些先生们，他们希望当领袖。这些领袖先生们没有荣幸在1954到1962年之间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现实中。他们跳过这几年，因为



他们生活在国外,为了客观情况的需要,法国把他们安置在城堡之中,而不是关在监狱里。

我们在替历史讲话。法国报刊和有些阿拉伯报纸开始制造偶像,把他们奉为神明,竭力把他们推到前台。但对谁不利?对成千上万倒下去的人不利,对那些满怀仇恨和饥寒交迫的人不利。这些先生们脱离现实,远离1954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只是通过收音机以及法国和欧洲的报刊才了解到革命。

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经过情况,上述的分析是必要的。那时,这些先生们来了。他们来并不是为了代表革命,而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梦想,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自认为是我国唯一的导师。

假如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有一个例子必须提出:有人说他是传送天启的使者,他竭尽全力要把革命的过去抹掉。凡是没有他的份的,凡是过去没有参加的革命活动,一句话,凡是不是由他发起的,他就要一笔抹杀。他还说不要讲过去。我们回答说:不行!讲讲过去很有必要。它富有教育意义,包含许多光荣史页。如果历史上保存着用火和血写成的、阿尔及利亚感到骄傲、而且永远感到骄傲的一页,那么这一页历史就是1954年到1962年间我们的烈士们所写下的。至于那个人,当他为实现个人计划遇到困难时他干了什么呢?他在盗窃。我找不到别的字眼可以代替盗窃这个词。他盗窃了七十亿。七十亿是属于谁的?是贫苦的劳动人民一点一滴积累下来准备捐献给解放阵线的。这笔钱是为夺取胜利和获得独立进行斗争和作战用的。可是这位先生一旦当上了党的

领导,见有机可乘之后,又干了些什么呢?尽管领导的时间很短,他把党的全部库存都侵吞掉了:七十亿不见了。

诚然,他是对某些报纸和电台有过影响的那种人物,而报纸和电台又把他吹成了领袖。什么人的领袖?人民的领袖吗?难道人民需要这种叛国投敌分子和懦夫吗?我们允许独一无二的政党内部的两个领导人或两个党的战士间可以产生分歧、可以有相反或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不能允许有人以和另一位领袖意见不合为借口,拿走或者盗窃战士、劳动者和人民的财产,并把七十亿巨款存放在欧洲银行里。是谁靠这笔钱过日子呢?是一位原先的领袖,他还在巴黎、马德里、瑞士的沙龙里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回到祖国骑在为党工作的战士们的头上。

按照他的说法,党员都是盲目又天真的。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是党员的还是这个没有经历过阿尔及利亚现实的先生的过错呢?回答就象我说过的那样,既简单又清楚。这些人生活的地方,远离阿尔及利亚社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改造,这是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

这些人中有那么一个人想当国家的领袖,自称随身带有给人民的天启,在这个幌子下,他挑动分裂,让一派反对另一派。一会儿他宣布党代表整个国家,一会儿又说国家更为优先。他挑动党反对国家,国家反对党,或者挑动党反对军队,结果造成了无政府主义和混乱局面。为什么要这么干?目的何在?其实这不过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个人专权只能在这样的气候中建立起来,即在各种力量之间、党和国家之间、党和军队之间搞平衡才能建立起来。这是第一种情况,我们都经历过。

至于第二种情况，我已经说过，是另一位先生，另一位领袖干的，他一度当上了党的领导。他没有放过任何机会利用第一次纠纷偷走了党的财富，数字超过了七十亿，他现在正在外国享受。

我可以毫不隐瞒地对你们讲：每当一位党员或负责人路过瑞士时，总会出现一些诽谤性的言论，虚伪地提出一些疑问，说这位负责人或党员是否携带党的财产逃走，好象盗窃是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先天就有的一样。

我们对这件事的立场是清楚、鲜明的。6月19日运动后，我们试图收回这些财产，但是没有成功。我们对盗窃党的财产的事不准备原谅。每个党员都有义务迟早要把这笔钱追回。

还有另一个人，竟然动用了武器。这个人以为我们人民总是分成沙乌亚人、卡比利亚人和瓦赫兰人等等，试图利用我们人民中一部分人的感情。但是人民是怎样回答他的呢？人民揭发了这个阴谋并严厉地制裁了他。我所以要多做些必要的分析，是因为许多兄弟还不明白6月19日运动的原因及其深远意义。

我们告诉他们，发动6月19日运动的真正理由可归纳如下：不要领袖和个人专权，也不要天启或先知。要的是政权和基层之间的协调和合作，要的是基层和政权都来参与制定一切以后要执行的、各个方面都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决议。

“要革命的团结而不是要全民的团结”这种思想引起了一定的混乱。我在阿尔及利亚总工会成立十周年大会上曾宣布：我们要革命的团结而不是要全民的团结。

这件事你们最感兴趣，所有对革命有信心的人都关心。因为我认为那些对革命没有信心的人对这件事并不关心。我的话是说给这种人听的，是说给我国这批巨大的力量听的，他们相信革命，相信社会主义。我已说过，革命的团结和全民的团结在意识形态上和理论上是有区别的。

革命的团结是指把所有的革命战士，党、政府或军队的，都团结在革命的队伍中，把工人、农民、学生或妇女团结在它的队伍中。革命的团结就是这样，这种团结是建筑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你们知道，这个意识形态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在阿尔及利亚和在国外，有些奇怪的呼声时起时伏，想要提醒我们一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而对这些事情我们的态度是明朗的。那就是所谓全民团结的观念，这是和革命相违背的，这一点不论是在意识形态或理论上来讲都是明确的。

全民团结首先意味着我们允许机会主义分子、政治上的坏分子、所有通敌分子都参加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所谓全民团结，就是如此。这种观念对一个执行自由主义制度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行得通；但是对一个选择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制度、政治方向的国家，这样的观念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是办不到的，接受了就意味着消灭革命。国家政治方向的革命逻辑断然拒绝这种观念。

当我们谈到革命团结时，我们必须涉及到一个和我们国家的生活以及社会主义发展有关的重要问题。

这就是党和行政的关系问题。我们已经说过，党的任务是指导、鼓舞和监督；党是革命的基础。讲到革命就

不能不讲到领导它的党。党被认为是推动革命前进的发动机，因为革命是群众的事业，任何革命若不相信群众、不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就不能被认为是革命。

要组织人民群众，就要有政治运动，就要有革命政党。这是一条明确而又不容含糊的真理。党是革命所不可缺少的，它是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的唯一有效工具。所有这一切需要党设立一个执行机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

国家是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理论的主要和不可缺少的机构。但是这两个机构如何完成它们的使命和协调它们的动作使之互为补充呢？

过去开过一些会，对这个问题曾有过许多种解释。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绝不允许党和行政机构之间有对抗。党不是孤立的机构。它有支部和中央一级的组织，它的许多战士都担任行政工作。因而党的工作和行政工作应该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

在我们最重要的决议中有一条是：一方面召开省、县、市镇各级会议，另一方面召开党员会议以便研究省、县、市镇各级所提出来的问题。这就是我要求你们将来要做的。我在这篇讲话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指出我们要走这条道路。让那些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去走的人自己去选择吧。

不管怎样，所有和我们走同样道路的党员和领导，在省、县、市镇各级都是一致行动的。

这就是革命委员会、政府和党的正式立场。这是一条由明确的逻辑所规定的路线。因为我们这些人是要在明确思想指导下进行工作，而不能在混乱中工作。从这点出

发，我们应当对我们自己诚恳，使党和行政机构各级代表，省、县、市镇和分区各级代表都不要逃避他们的职责。

如果发生了个人主义问题，一致行动不能实现，误解丛生，责任不在革命委员会或执行秘书处。我曾经讲过，我们只相信建立在革命行动和团结的原则基础上的权力。在这方面，我们要对自己、对人民诚实。革命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要求我们每个人为人民利益作出巨大努力。我再说一下，为了使我们的行动无可非议，拥护我们的制度的人应该在指导方针的光芒照耀下，按照已经发给他们的指示而进行工作。我们不能满足于把这些指示用书面发给他们而自己却留在首都只用电话和他们联系。我们主张也到你们那儿去，访问全国所有的地区，东部、斯基克达南部、瓦格拉等地区，同你们讲计划，向你们讲清楚一些工作方法：怎样进行工作，怎样互相配合和相互了解。我们主张这种办法，以便创造协调的气氛，增进相互了解，使事情更为明确。

我代表革命委员会和政府宣布：只有一个权威机构。组织工作要求这个权威机构深入到基层去，所以必须在基层设立分支机构。最高领导必须一致行动，但这还不够。基层也要一致行动，基层执行工作的负责人就是党和行政的代表，也就是你们大家。

大家必须明确：什么是言行一致，不要口头上讲革命、社会主义和革命团结，而在行动上却另是一样。我们的行动必须和我们的言论一致。这是我们每天行动的准则，这些行动都建立在坦率的基础上，不要开空头支票。不要答应做我们力所不及的事。今天还不能做到的，我

们力争以后做到。我们认为这才是能引导我们成功的最好的道路和最好的办法。在省一级和省以下各级的配合和一致行动的问题上多讲几句，多用些时间，并不算过分。

对这些问题我们绝对不会嫌讲得太多的。省和省以下各级工作中缺乏协调一致，后果会怎样呢？谁将受到损失呢？

是不是省级党代表、省长或县长呢？不是，他们个人没有什么损失。那么谁将受到损失，什么利益将受到侵害呢？是人民的利益。

在我前面发言的一位兄弟说，人通过工作才有发言权。这的确是一条真理。因为在人民眼里，正因为负责人亲自抓工作所以才有资格当领导。假如这些负责人每天确实诚诚恳恳地关心人民的最高利益和人民的问题，我们是不会不知道的。我们说，我们不怕把责任交给你们。我们也不怕说：应该加强省一级的党代表和国家代表的权力。

这并不是逃避责任，而是我们按照这条道路加强市一级的权力。我们要说的话就是革命事业应该要求一切负责人代表党或是代表国家来汇报工作，革命事业要求汇报工作，国家和人民也这样要求我们。

如我刚才所说，最好的办法、最好的道路是协调地工作，相互了解和团结一致；目的是为了关心人民的问题，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就是遵循和执行我们已定的计划。在这方面的工作应该是很清楚的。这样，最高当局的职责也就明确了，省、中央局的职责也是如此。按照

这种办法，人们就不能对发生的事情袖手旁观了——有些人工作拖拉，一天浪费一两个小时也无所谓，甚至当有人诽谤革命时，他们也无动于衷，因为这些攻击反正不是针对他们的。

不论怎样，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应该把它消灭掉。对革命真正有信心、能捍卫革命并和它的敌人作斗争的干部，革命是需要的。

我并没有意思指责党或国家的兄弟们；我们的目标不在于此，我们还有一个更远大、更重要的目标。因为讲革命，讲革命团结，就有必要使这些思想有它的含意，有它真正的内容。

革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路线走下去，因为这是由党员进行的革命，他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奋斗，而不要总是依靠领导。当然，领导可以看到许多问题，但不能看到国内所有的问题。领导的责任是把政策、革命的方向和社会主义的方向交代清楚。

在类似这样的会议上，我们要让你们知道我们的计划、未来的成就和我们的缺点。然而领导不能面面俱到。当然，最高领导人、最高当局是职责分明的。但你们，兄弟们，你们有你们应负的责任。

从6月19日运动至今，我们除了进行说服和个别谈话，没有用过其他的办法。我们深信这个方法能引导我们去纯洁自己的队伍。而机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和存心不良的人，希望出现无政府状态，而不愿意要秩序和思想明确。应该把他们从我们的队伍中清除出去。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使我们达到我们的目标的办法。



我在报告一开始就谈过这个办法。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国家政治领导的意见。我们并不指望任何人感谢、吹捧或表彰我们。我们一点也不指望他们这样做。但是我们要对不同意我们意见的人讲：“去你的吧”！而我们要向那些对革命和社会主义抱有信心的人说：要有工作热情，有坚定的战斗精神，并从怀疑自己前途、革命前途和社会主义前途的人所持的观望和犹豫的态度中摆脱出来。

这些现象都应该全部清除掉。我们讲过稳定的问题。尽管因为时间短促不能对我们的行动作出评价，但是我们可以说在这短短几个月里是已取得了成果。将来成果将更大，不管是在党内，为党的事业而战斗的人中或国家内部都会有更大的稳定性。

这个地区的许多党干部在这里聚会，使他们能相互接触，也能和最高领导接触。关于省一级工作的协调一致、相互了解和真正关心人民的问题，过去，我已经谈过。

这就是我代表革命委员会向你们发出的指示。革命的敌人的行动从不同的方面和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行动、武力和言论直接向革命进攻。也有另一种形式：破坏，这种内部破坏又可以从几个方面：两、三个或更多的方面进行。可能是从经济、行政管理或思想方面，或从士气方面搞破坏活动，在人民中散布怀疑。

你们作为各部门的人民代表，你们有责任对这两方面的破坏情况保持警惕，进行斗争。象和那些为使革命失败而破坏国民经济的人作斗争一样，这些人企图在革命失败后说什么：“自从我们有了社会主义，我们再也见

不到幸福了。”人们看到：社会主义这个词和它的内容成了某些人在某些场合的批评对象，而这个词本来是应该象在解放战争中独立这个词所起的集中人民注意力和意志的作用一样的。

这就是革命的敌人进行破坏活动所造成的后果之一，这些人不愿意人们为人民的幸福和革命的胜利而奋斗。有人企图从经济上搞破坏，对此保持警惕很有必要；同样，对于犯了这种罪行的人进行狠狠的打击也很有必要。破坏也可以在行政部门进行，例如研究某一案卷有时一拖就是两、三个以至六个月，结果损失几百万。这种破坏可能是因一些当时就可解决的问题而采取拖延被动的态度而引起的，也可能是对犯有危害人民罪行的人不进行惩罚而引起的。

在行政机构里也有搞破坏活动的情况，这是反对革命的一种活动方式。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以革命警惕性武装起来。

行政机构中还有另一种破坏形式不易被人迅速察觉，这就是瓦解行政机构，阻止它为群众利益服务。这是革命的敌人采取的另一种武器。还有第三种方式：在人们思想中散布对革命胜利和对社会主义的功绩的怀疑。

我们应该了解这些武器，以使用更强大的武器来反对它们，战而胜之，一句话，使社会主义取胜。成功与否取决于所有的干部，所有的革命战士和劳动群众。

我有责任把以上这些情况告诉你们，以便我们每个人都能保持警惕，准备全力以赴地反对经济、行政、技术或其他方面诽谤革命及其成果的破坏行为。你们每个人

都有责任反对革命的敌人阴谋使用的这种毒辣手段。

反对革命的敌人，是有办法的。首先是进行解释工作以揭穿敌人的阴谋，然后党的代表应按照无可指摘的行动方针采取坚定不移的行动。

国家机关每个代表都应该十分重视研究公民们的事务。党和国家应该开展运动，目的是要把革命的敌人的意图和阴谋告诉人民，并揭穿敌人的目的，并且使人民信服。我们能够运用的最后手段就是警察机关。但这只有在国内其他办法都用尽了我们才使用这种办法。

我们对革命战士们的信念和信赖是真实的，是坚定的。正因如此，我们始终相信这种信任是我们的决定性手段，足以消灭革命的敌人，使搞破坏活动的人不能得逞。我们相信革命战士们将竭尽全力保卫他们的革命事业。动用警察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我们要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动用，因为我们对革命的力量、革命的正直不阿和革命的纯正真诚所抱有的信心是不可动摇的。这些都是大多数党员和人民所具有的美德。这就是我们要使用这种非武力办法的原因。所以我们采用了解释、讨论和组织的办法。

以上是我们对党的观念和党员应起的作用的观念的一般看法。这种观念应当成为党员团结的基础，协调各个组织和群众之间关系的基础，使最高领导机关和基层之间协调的基础。

除以上我们已经讲到的问题外，还有其他值得提出来并进行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曾遭到过批评，因为对于国民经济及其组织结构来说，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

自管制，不论是农业方面的或其他方面的，对我们经济总的结构来说都是重要问题。

正象我们多次肯定的那样，自管制是工人和农民强烈意志的产物。我们把自管制看作是土地归农民所有，工厂归工人所有。换句话说，自管制是七年半斗争和全体人民作出巨大牺牲的必然结果。

以上是对自管制问题的基本分析。某些人硬说自管制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事业，我们回答他们说：不对！假如把这个事业归于一个或几个人的功劳，那么我们斗争的成果到哪里去了呢？

毋庸置疑，这种错误观念会把我们引向鄙视群众斗争和他们的流血牺牲。不仅如此，这种错误观念还会使我们否认群众在解放土地和工厂的斗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种观念更会引导我们去维护剥削，我们过去就曾经陷入这样的歧途。大部分指责自管制的批评是别有用心，因为它的目的只是诽谤革命和革命的宝贵成果。另一些批评则来自无知和没有觉悟的人。

这些人把为农民基本利益服务的革命成果自管制度同自管制实行中因管理不善和干部问题所产生的一些缺点相混淆了。

我们的责任是把作为革命原则和社会主义方向的自管制和执行过程中产生的缺点，清楚地区分开来。这些缺点的确存在。革命委员会曾经几次开会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批评意见作了讨论和研究，然后又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能够消除自管制部门存在的缺点。我坦率地对你们讲，这些缺点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只能逐步克

服。革命委员会最近的决议特别注意给地方负责人更大的权力，把党对自管制的关心进一步明确起来，他们是可以把当前的情况掌握起来的。

我在这里向兄弟们、党员们讲话，希望他们能把党的精神贯彻到生产组里去。党支部和工会支部配合起来，在指导生产组、贯彻自管制决议等方面，应该发挥带头的作用。在这方面，我要求每个生产组、每个农场的帐目应当清楚。革命委员会有一项决定要求每个农场的利润分发给在本场工作的劳动者。这是他们所付出的劳动的酬报。至于一点没有收益的农场，农场的工人就只能领取他们的工资。

我们为实行分散管理作出了一些决定，也就是说，建立地方管理制，避免所有的问题都要中央去管。我们信任农民，因为他们是有觉悟的。只是我们对农民教育、引导、组织得不够。这些决定是理论性的，各地负责人要注意贯彻。

讲到这里，请允许我对职责问题稍加讨论。浪费、侵吞公款和放任自流种种现象出现了，引起了批评的意见，甚至引起了人民的愤怒。表现为这些形式的缺点，应当立即克服。你们是党和行政的代表，你们应该能够消除这一类缺点。

从今天起，我们不允许再有哪位兄弟跑来对我们说：某处发生侵吞公款的事、拖拉机抛锚了、生产资料被私人或家庭拿去用了。

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当由地方负责人解决。我们要告诉大家：方向已明，道路已定，负起责任来。为什么你们

不在公安部门协助下惩罚犯罪分子呢？

所有这些社会不良现象在我们的城市和村庄里都有，不能靠政府一级，而只有靠地方才能制止。政府有自己的职责：制订总政策，管理国家大事，确定大方向。这些大事，要求省、县、党的中央局、全国工会组织和积极分子去行使它们的职权。

从现在起，如果出现了什么缺点，你们就要负责。你们作为革命战士有义务过问和汇报，因为我们都是负责人。责任应由大家分担，从基层支部起，从市镇一级直到革命组织的最高级即革命委员会。道路已经确定了，每个负责人都应该在本村加以贯彻，而不要把责任往政府身上一推了事。

我们还要问一问中央局、省和市镇负责人：你干了什么？你还需要更多的指示、更多的解释吗？你是否还需要组织的规定或支持？我们早就告诉你了：只要你为群众利益服务，为扩大革命成果而工作，政府和革命就全力支持你。

这些例子一目了然，你们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责任是加强自管制的组织和机构。我们要讲它们的缺点，就象我们今天讲的那样，但我们要为它们找到完善的解决办法。

我们对社会主义部门和农业部门信赖，所以革命委员会和政府才拨给它们二亿第纳尔，帮助它们，目的是为了增强它们的力量。

加强这些部门意味着壮大劳动群众和加强革命基层。所以政府对自管制问题的立场是清楚的。

在谈农业问题的时候，讲一讲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土地改革问题是适当的。

土地改革在我国十分必要。按照我们所设想的土地改革最广泛的含义是为我国农民服务的一种改革、一种革命性的创举。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决定从今年起就开始贯彻这一原则，因为土地改革本身需要较长的时间、巨大的力量、持久的努力，以及干部对此要有深刻的理解。但这一切并不能影响我们从今年起开始贯彻土地改革的原则。

你们与人民和积极分子有直接的接触，你们应该有机会坚决参加制定计划的工作，并提出你们的想法和目标。

我们重视你们提交我们的意见。这些意见可以使我们避免犯错误。

我已经告诉你们，我们今年就开始贯彻这项原则，我还要告诉你们，为了加强基层，我们即将实行政权组织的建立并使之分布各地。

我们打算今年开始进行市镇改革，在这方面将有一个初步草案提交基层。

市镇改革非常重要，因为现在的市镇制度已经过时了，不能和阿尔及利亚新社会相适应。因此我们要在市镇这一级建立新的组织，使市镇成为基层组织。

我们将使市镇成为新的动力，要它担负起新的经济责任，因为我们认为市镇是代表人民的。因此，市镇不应再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基层组织，只负责一些无关紧要的简单事情。应当让市镇成为为革命服务的经济和社会的

基层组织，这就是我们在制定市镇新组织法时所要遵循的方向。

我们把新的责任赋予市镇，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职责，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这样做，毫无疑问，是加强我国革命的基层。

在土地改革之后还应当进行税收制度的改革。这个问题是和大多数公民密切相关的，因为到今天为止，人们对革命中出现的变化还没有给以重视。过去的富人今天变穷了，但对他来说税收制度并没有改变。至于原来的穷人因无政府状态和剥削的机会变成了富人，到今天为止也还没有交过分文的捐税。

旧的税收制度应当废除，代之以公平的税收制度：向公民征收他应该缴付的税款。

市镇改革和税收制度改革的效果要等到下次市镇选举时才能分晓。

今天在座的代表们都清楚地知道，自从阿尔及利亚独立以来，市镇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稳定。假如我们的政策可以解释为先建立牢固的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革命，假如我们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种真正的持续性，我们就应当从基点开始一直达到最高点。

所谓基点，这当然就是市镇。因此我们决定改革它，也改革税收制度，以便选出来的市镇负责人将来能掌握一个和革命步伐相适应的、和社会主义斗争不相矛盾的新的机构，从而能够在我国建立真正的稳定。基层的稳定对其他各级组织是有影响的。

为此我们决定市镇选举一定要在今年年底前举行。



当这两个条件具备,有了必要的物质准备后,选举就将进行。

现在提出来的问题是选举怎么进行?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发展方向,我们国家是一党执政的国家,候选人怎样产生?候选人是否将来就担任各市镇的领导工作?

革命委员会一致同意选举应在民族解放阵线监护下进行。人民可以(在积极分子中间)自由选择代表他们的人。人民的选择最有效。

这是一种新的形式,可以在党内、积极分子当中创造出积极性和生命力,也可使积极分子从复杂心理中解放出来。这种复杂心理使他不是依靠别人,就是只相信自己,把他们从中解放出来就可以使他们在管理市镇事务中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来。

市镇将显示出它的价值和重要性,因为它将负责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以后我们将就这个问题作更全面的解释。

还有一些别的问题,我只简单地提一下。例如有关保健、司法、人口调查和有关无主产权等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目前正在研究之中。

关于司法,在法官讨论会结束时,我曾有机会谈到过我国司法工作应和革命潮流同时并进。无论如何不能允许司法工作处于我国进步潮流之外。司法工作应当为劳动群众和社会主义服务。

谈到司法工作时,我想起了举不胜举的坏人坏事。这种情况是多年的无政府状态和无组织所造成的。在这些坏事中,我举出浪费国家的资金、结果是浪费了人民的

资金作为例子谈过。

我们的司法部门应该制止这些坏事。你们一定知道我会告诉你们某些堕落了投机倒把分子贪污盗窃多少钱财。作为战士和革命委员会成员，我有责任告诉你们每一个人、每个积极分子、每个公民：谁不揭发盗窃犯和投机倒把分子，他就将被看作是背叛。

以上是革命委员会和政府所采取的立场。每个积极分子发现有贩卖行为或盗窃行为时都有责任加以揭露，并要求对他们审判示众。

这样的情况要求我们建立一种不是一般性的司法制度，而是一种非常法，使我们能严厉审判在经济上犯罪的人。

在我谈有关问题而不对革命委员会和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作较多的评论，那么，我的报告就是不完全的。公民们对那些假公济私的人深为不满。另外有些人在短时期内发财致富。6月19日运动前，我们就听到过这样的话。我们对这些问题多半都进行了研究。对此，我要引一句民间谚语：“如果家长击鼓，其成员就只能跳舞了。”

本·贝拉先生利用职权亲自签字送给穆罕默德·赫德尔七十亿，可以让他能为所欲为地追求权力，扮演国家救世主的角色，此人如此行事，对别人还能说些什么呢？

这就是祸害的根源。正是这一切造成了组织的瘫痪。

但是我们是否应当光谈坏人坏事而不拿出行动来呢？不是，我们颁布了非常法，用它来惩办贪污盗窃人民钱财的人。

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所以我有责任把它讲清楚，让你们毫无顾虑地投身到行动中去，不要有任何自卑感。有人说某某人有朋友，有影响，有威望。我们说：我们大家应该联合起来制止这种坏事。

我再向你们重复一遍：我们没有这样的朋友，这种朋友的友谊是危害人民和人民的利益的。我们之中没有人有威望和影响，因为我们都是党的利益的捍卫者，不论是在思想上或是在意识形态上都是如此。我们的愿望是不折不扣地完成我们的任务，在完成任务面前绝不畏缩。

今天掌握着国家命运的或被历史潮流推上负责岗位的兄弟们和当年塔里克·伊本·齐阿德部队的信念是一样的。那时，当他们过了海，烧了船，曾讲过这样一句传奇式的话：“我们的前面是敌人，我们的后面是大海。”

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烧毁了船只，我们决不后退，因为我们的革命要向前进而不是向后退。我们应该一起前进。也就是说，要我们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要不折不扣地完成任任务。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作为革命最高机关的代表和领导人，我有责任在你们这次会议上把它提出来讨论。

另外还有一个要谈的问题：经济形势。它要求所有负责人长期的工作和不断的斗争。我们之中谁都知道这个形势是因为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政府和革命委员会当前的政策是要坚持不懈地关心贫穷的农业区，以便使那里创造平衡稳定的局面。

一句话，这个政策要按照确定好的计划做，使我们的经济部门帮助需要发展的穷苦地区和富裕地区之间取得平衡，尽管完全的一律相等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我们至少要使国内不同地区有相对的平衡。我们要求所有积极分子提意见，参加制定一个五年或七年的发展计划。这项计划目前正在研究中，为了要把全国所有的地区都包括进去，这个计划并不是几个人就能办到的。它首先是积极分子的计划，要他们进行协作：提出意见，认真和有效地讨论计划书。当我们对计划取得一致意见后，我们就要动员一切精神和物质力量。

关于国民经济计划，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你们知道我们今年的预算放在优先发展工业和农业上面。农业方面，我们准备给社会主义部门二亿第纳尔，给小农一亿第纳尔，后者从独立至今没有得到过任何帮助。农民承担了解放斗争的负担，但至今毫无所得，我们大家都要努力，使发放给他们的信贷能够公正地送到他们的手里。

工业部门掌管着众多的力量：石油、天然气、矿产。要我们详细讲，时间不够，所以我只简单地讲一讲。我们的政策是开发天然资源，发展和创建国家工业。开发天然资源也要能使贫穷地区得到发展。至于东部地区，君士坦丁，我们是有规模巨大的计划的，容我们到适当的时候再讲。

我们希望对这些计划的研究工作尽快完成，以便于今年年底付诸实施。

最后我认为我有责任，在讲完国内问题后跟你们讲

一讲另外一个题目：阿尔及利亚对阿拉伯马格里布、对阿拉伯世界、对非洲和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态度。

由于它的斗争，由于它在斗争中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英雄主义赢得的威信，阿尔及利亚在国际舞台上，不论是在阿拉伯马格里布地区，或是在我刚才提到的其他地区，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是主张建设阿拉伯马格里布的。我们的方向和政策是众所周知的，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对阿拉伯马格里布的前途抱有信心，但是阿拉伯马格里布的前途应当一方面建筑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要符合我国人民的愿望。

阿尔及利亚不是一个要闭关自守的强国。相反，它和这一地区有着语言、宗教等许许多多联系。至少可以说，阿尔及利亚是阿拉伯马格里布的一部分。它是人们称为“阿拉伯世界”这个民族的一部分。我们有十四个世纪的文明、历史和语言。

另外还有一个题目对阿尔及利亚很重要：非洲问题。对革命的非洲来说，阿尔及利亚代表着非洲大陆上革命和进步力量的希望。

阿尔及利亚没有别的政策和别的道路。6月19日运动时我们宣布过，今天，面临着严重的事件和动荡不安冲击着非洲的时刻，我们再次重复：没有一个人可以自诩为人民的化身。因为任何国家的人民，若把所有的责任都托付给一个人，并对他说他就是革命、他就是社会主义、他就是人民的化身，这个国家的人民就有可能碰到严重的后果，对此这个国家的人民要负主要的责任。

谈到我们的形势时我们讲过这样的话，我们曾经说

过：革命因有它的光荣的篇章、烈士等等而闻名于世，而社会主义是一种理论。

非洲有许多地区还处在殖民主义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之下，许多进步国家有过一定的后退。

我以你们的名义宣布：老是谴责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光要他们对这种现状负责任是不够的。他们应负责任，但与此同时，我们非洲人也负有责任，也有我们非洲人的责任。

阿尔及利亚，对它来说，它是无可指责的，因为，在它的社会主义范围内，按照它取得解放的方式，谁也不能声称是它的化身。

任何革命要持久，要繁荣，要巩固，首先要依靠农民、工人、战士和革命力量。它也应把国家的财富和资源放在工人、农民和战士的手中。革命有了这样的思想，达到了这样的扎根程度，就不会害怕以随便什么面貌出现的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它同时不怕任何危险，因为它是强大的，在人民中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基。

这就是我们在非洲面临的形势和情况。光是表态是不够的，还要加上别的武器和办法。

上面是谈非洲。至于社会主义世界，阿尔及利亚同这世界有着牢固的友好关系，它使我们能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反帝反殖斗争中进行合作。阿尔及利亚在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面前没有自卑感，因为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人 and 负责人不属于任何一个抱有特殊利益的特定的阶级。

我们的社会主义方向需要 we 和社会主义朋友合作，但这种合作要考虑到我们和阿拉伯马格里布、和阿拉

伯世界以及和非洲的关系。

另外还有一个基本的重要题目。我们既不反对宣传阿拉伯主义的人，也不反对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也不反对主张非洲统一的人。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政策是清楚和鲜明的。我们不能容忍别人干涉我们的内政，不论是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至于我们所有的公民，没有一个人愿意在任何口号的掩护下和外国势力进行勾结。

在革命委员会和政府看来，谁阴谋反对祖国，谁就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叛徒，就是阿尔及利亚的叛徒。

阿尔及利亚人不能失掉个性。殖民主义化了一百三十二年，用尽恐怖政策、愚民政策、破坏信仰和传统、妄图消灭我们的语言等手段，也没有能毁掉我们的个性。

今天我们的任务不是去消灭我们的个性，而是竭尽全力去加强和再度唤醒我们人民的个性。

我清楚地罗列了这一切，是为了使你们对我们的政策、对我们的方向有一个明白的认识，使你们和政府走在同一条路线上，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还有阿法关系和阿法合作问题。我有责任同你们讲革命委员会和政府阿法合作关系的看法。正象大家看到的那样，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的。你们一定注意到我们和法国之间存在着许多复杂问题，这是我国经历了几十年法国管理的结果，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和经济、文化有关的一些问题。

你们知道我们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达成了协议。这个协议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它使阿尔及利亚在这方面

得到一些新的东西。阿尔及利亚独立才几年，协议使它成为阿拉伯世界产油国家中第一个实现了这种协议的国家。在水力采煤和煤气等复杂部门方面，阿尔及利亚也是采取已解放的国家的积极政策的第一个国家。

我们还有文化问题，这是和教育制度相关的。我们有几十万儿童上学，需要大批教员和教育工作人员。这是不能省掉的，可是阿尔及利亚人又取代不了。我们要做到由阿尔及利亚人来逐步取代这些合作者，使教育和行政阿拉伯化。这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还需要时间。我曾经说过，我们和法国的关系是建立在互利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干涉阿尔及利亚内政的基础上的，阿尔及利亚所发生的一切只是阿尔及利亚自己的事。这种关系也是建立在尊重两国主权的基础上的。从这点出发，我们欢迎建立在双方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这样的合作不损害我们的自由和主权，不阻碍——这一点很重要——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欢迎这种合作，因为对双方都有利。如果相反，这种合作采取另外的形式的话，我们决不会接受，不管它是来自法国，或是来自其他的国家。

只是在有成效的相互合作的基础上，革命委员会和政府同意在有关水力采煤和煤气的谈判达成协议后再开始别的谈判，以解决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上面是我对这个重要题目所要讲的话。

结束讲话前，我要告诉你们这次会议将不是这类会议的第一次。我向你们承诺其他许多会议将要接着开。我将要重复说我们要一起工作，以后在类似的机会中我



们再见面，以便举行会议，告诉大家国家的政策和计划。这样我们一定会达到我们讲过的团结的目的，这个团结包括工人、农民、妇女、机关工作人员和士兵。

译自《非洲革命》第 163 期，1966 年 3 月 12 日—18 日

## 在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举行的 宴会上的讲话

1967年2月，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访问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方面授予桑戈尔总统以阿尔及尔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并举行仪式。当晚，桑戈尔总统设宴招待布迈丁。以下是布迈丁在宴会上讲话全文。

总统先生，您刚才向我们的人民及其领袖们表示的高贵情意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对此我们谨向您表示深切的感谢。这一符合我们兄弟的两国人民强烈愿望的幸福会见必将有助于加强我们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总统先生，您以有力而又婉转的语言表达了您以及兄弟的塞内加尔人民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深厚情意。您象诗人和著名作家——而您就是其中的一位——一般，用文学来热爱全人类。

总统先生，在您访问我国某些地区期间，您亲自证实了我国人民对您以及您尊贵的随行人员的热烈欢迎。我国人民通过您转达了他们对塞内加尔人民的敬意，从而增进了对塞内加尔人民兄弟般诚挚和友好的情感。

这次访问使您有机会估计一下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

设和它的发展所作出的努力。

在农业方面，我们已经将全部土地收归国有。自管制是革命的伟大成就之一，它是对整个民族和劳动群众在解放斗争中所作出的直接而又卓有成效的贡献以及对他们的向往终于实现了表示感谢的一个行动。自管制的实施对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都有莫大的好处，因为国家已经完成了通过人民、为了人民的革命。在我国，社会主义这个词是要到未经历过封建制度的传统农业中去找根源的。

在实行自管制方面，我们是从我国的历史和对我国社会与经济结构进行研究后才得到了启发。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低估也没有否认其他在我们之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经验。恰恰相反，它们的榜样对我们是很有利的，丰富了我们的知识，避免了许多无法避免的周折。

在工业方面，全国工厂企业的管理工作都由国家的新生力量去肩负起这个责任。工业和农业中的自管原则加上根据这条原则而获得的真正的经济利益，证明了这条原则是一种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教育群众的心理因素。它向劳动群众和全国新生力量灌输了采取主动、勇于牺牲和善于团结的精神，磨练个人对集体和总的来讲对国家有利的责任感。

我们在所有这些领域里的行动都是为了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国家的发展，肯定我们的主权和巩固我们的政治独立。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通过生产资料国有化外还把地

下矿藏也收归国有之后，我们为我国的经济独立建立了一个重要支柱。从今以后，关于矿产资源、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进度和市场供应等问题都要完全、绝对为人民的利益着想。

半个月前阿尔及利亚进行了选举，目的是为了修订市镇条例，使条例一开始就要贯彻民主精神。这部新法典第一次让阿尔及利亚国家享有灵活而又便利的组织机构，便于人民在社会建设中直接作出贡献，并把市镇管理的责任全部承担下来。这种结构标志着对我国所有国家机关进行改革的开始。新当选的市镇会议将帮助我们实现与我们的基本抉择相适应的目标。

阿尔及利亚人民热情洋溢地集体参加选举再一次证明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智慧、政治上的成熟和它对民主准则的热爱。

阿尔及尔市人民议会在欢迎您这位尊敬客人的大会上授予您阿尔及尔市荣誉公民称号，这是阿尔及尔市人民议会从成立以来第一次正式行使这个权力。

我们是在诚挚和坦率的气氛中举行会谈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个重要时刻在许多非洲和国际问题上交换我们的看法。

我们作为深受殖民主义压迫的痛苦、忍受不公平和被奴役的痛苦、为了我们的人格受到侮辱而感到悲伤的非洲人，对正在争取解放的各国人民和受到毁灭性威胁的整个人类担负着特殊的责任。

我们不愿做悲观主义者，我们永远信赖人类的理智并希望良知最终能够占优势。然而，正当我们试图从我

们心中把怀疑的根子连根拔掉时，却又面临着一些震撼全世界的大规模的严重事件，我们只能是越发疑虑了。最后一批被赶回去的殖民主义者把他们殖民地的丢失看作是他们的强大的并非真正的衰落，看作是对他们荣誉的侮辱和他们卑鄙的野心的限制。但他们并没有就此甘心罢休，他们正在寻找适合现实的方法来掠夺他们的受害者的财富。

对于非洲某些地方正在流行的那种可恶的“种族”隔离，除了用这样字眼来形容，还有什么其他的字眼可以表达我们的憎恶心情呢？其首创人可能还在梦想把这个灾祸扩大到我们整个大陆。

今天有些阿拉伯人民还在忍受压迫、人格侮辱和被赶出自己的祖国。殖民者采用的这些方法不免使人想到中世纪宗教迫害所用的那种方法，他们还以为他们仍然处在殖民统治的初期。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这样野蛮的办法呢？

正在越南疯狂地进行着的毁灭性战争，同样在海洋上耀武扬威地航行着载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舰队，这样的战争在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一直威胁着东南亚，对这种战争我们该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呢？

我们又怎么来描写现在要毁灭整个这个地区、要引起一场意味着人类末日到来的世界大战（史无前例的战争）的这种威胁呢？

刚才我们和总统先生一起指出的这种令人不安的局势，只能是更加使我们相信全人类的良知。只有依靠那些有良心的有识之士，良知才能结束这一局面，把文明保

存下来,并保全人类的命运免于遭受堕落、粗暴和野蛮的袭击。同时,还要依靠共同的同情心才能使负有责任的人对这种局面担负起历史责任,而历史正是人类行为的永恒的铁面无情的纪录。

在谈到诸如反对殖民主义的人民斗争、联合国组织的加强、裁军、国际合作和不结盟等等国际问题时,我们双方都对我们两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团在相互配合和有效的合作方面所作努力感到满意。

联合国已委托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捍卫津巴布韦人民的事业,并使他们对自由和独立的合法愿望取得胜利。

在此,有必要声明我们两国都是“十一国委员会”的成员国。十一国正在为巩固联合国的基础而努力。因为尽管联合国象任何成立不久的组织一样也有它的困难,但它在解决国际问题的事务中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这些问题包括:和平共处,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在国与国之间特别是联合国成员国之间维持友好的睦邻关系。另外,我们的组织还应该为非殖民化作出更大的努力。

在“七十七国委员会”中,我们两国一致支持在第三世界国家间进行经济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全力支持国际合作的观点,但要强调修订贸易条款的必要性,应该使这些条款建立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我们怀着特殊的兴趣注意到塞内加尔在您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例如扶植三百项新的工业部门,创办了三百个工厂和一千个农业合作社,并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收归国有等等。您把这些土地交给了劳动公民从而

回到了具有一千年历史的非洲式的、以公共财产和集体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那个时代。

我们认为，我们大陆的文化同其他大陆一样，也在大大地为充实和丰富人类的文化作出了贡献。

关于非洲和亚洲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人类文化和智慧的策源地的事实是无庸在此赘述的。但绝不能因为今天亚非两洲需要采纳先进工业国在经济、科学和文化领域里获得的成就就降低了他们的地位。

总统先生，所有那些条件都形成了巩固我们两国——无论是在双边关系还是在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中——合作的积极因素。

译自《非洲革命》第 211 期，1967 年 2 月 27 日—3 月 5 日

## 在市镇人民议会主席第一次 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2月27日，布迈丁在市镇人民议会主席第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内容涉及过去的错误路线、集体领导原则、国内的安全和稳定、农业歉收、矿藏国有化等问题。以下是讲话的节译。

.....

亲爱的兄弟们，由于发动了群众和充分相信群众，1954年11月1日的革命才战胜了恶势力和殖民暴政。

全靠“通过人民、为了人民”的革命原则，我们的斗争在武装起来的阶段才取得胜利。这个作为1954年11月1日发动革命的根据之一的原则，在它一经确立之后就有效地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了。

鉴于在取得独立后不久，革命内部暴露了路线分歧的倾向，我们又树立起这个革命的座右铭，并且强调它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我想趁这个好的和甚至有历史意义的机会，特别向基层群众的代表们再谈一谈这种现象。众所周知，在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后，1959年11月1日的革命——即150万战士牺牲了的革命——遇到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其原因是由于当时为人民和革命先锋队所



具有的“领袖”资格被一个人篡夺去了。我们在6月19日揭发的正是这个路线上的错误，其目的在于唤醒我们的同胞们和某些青年人，因为他们让人背离了我们革命的神圣原则并且卷进了奉承和个人崇拜的潮流，而这个人不久就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置之脑后，专为私人和个人打算。

我要特意提一提这些事实，因为我们的国家过去曾经进行过一些其他的选举，如主席选举、立法选举以及关于宪法上的公民投票。不幸这些选举不是为革命的最高利益服务，而恰恰是巩固了某种形式的个人权力，革命不再是“通过人民、为了人民的革命”了，人民的领导让位给个人的领导，阿尔及利亚第一次实践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没有基础的房子一经震动就会塌下来。

我们大家，特别是我们的人民所取得的这个经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益的教训，就是这次教训促使我们重新树立起这些座右铭和真正革命的原则，这个革命必须为人民和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它还包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即任何个人、任何领袖都不能自吹是由他一个人解放我们的国家的。……

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又高举集体领导或管理的原则的原因。我们着重指出国家的真正秩序应该是合乎逻辑的、合理的，是建立在代表人民的基础上的，也是人民组织中的最小的一个单元，即市镇。

正是根据这个主张，我们才打算组织符合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和伊斯兰教的准则的，符合我国政治上的选择的新市镇。

6月19日以后,革命委员会结束了那些曾经危害革命的路线错误和一种曾经把假仁假义作为思想体系的政权,那时我们认识到必须首先在国内重新建立安全和稳定的局面,因为我们的国家曾经经历过危险和动荡不安的时期。

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可能不关心这个安全和稳定的真正意义,可是我们大部分人民完全领会到这一点。你们记得,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几次痛苦的危机、混乱和不稳定的时期,我们的人民没有能够享受他们应有的安宁和和平。但是近两年来,我们的国家终于得到了这种过去被剥夺了的安宁和稳定。我们革命委员会和政府所面临的各种情况,其中迫切需要的是重新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有计划的发展。我们记得有一个时期,我们的经济受到了无组织和鲁莽从事的严重威胁,农业部门的例子更为突出,因为国家竟支出了11亿第纳尔的发展费用,而总收入只有6亿第纳尔,这5亿第纳尔的赤字,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浪费、管理不善,甚至有明显的贪污盗窃行为所造成,这些问题都没有通过人民进行议论,掌握国家命运的主要负责人这时把时间尽花在对独立、自管和社会主义的歌功颂德上面。

亲爱的兄弟们,事实上,有史以来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它也永远不会是一个随机应变的行动。为世界各国所公认的真正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科学准则上的科学的意识形态。

面对这样一种形势,革命委员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因素占统治地位的措施。所以,今天我才可以

客观地说：我们的经济和财政都朝着令人满意的方向发展着。

尽管有一年的农业歉收，我们没有向大国伸手要施舍，而相反，由于采取了决定性的措施和发挥了每天继续不断的革命干劲，使革命委员会和政府扭转了财政困难的局面，从而谨慎地度过了我们国家所遭受最坏的一次收成。

今天没有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挨饿，我们用我们自己可兑换的外汇向国外买了我们所缺少的小麦。此外，在1966年，革命委员会和政府对圣战者兄弟们尽了义务，因为他们对祖国和革命的神圣事业贡献出了一切，我们特在国库中提取600亿作为补发1962年、1963年、1964年和1965年养老金之用。

多年来，直到6月19日那天为止，这部分阿尔及利亚兄弟没有能够享受这种权利，因为发放养老金的案卷堆在机关里无人过问，而为祖国的自由、独立和社会主义牺牲一切的圣战者们却在讨饭过日子。

同时，我们还克服了由于农业歉收而造成的困难。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国家在1966年一年里，就支出了约6亿第纳尔。此外，我们还有史以来第一次拨了1亿5千万的款子支援农民。因为我们没有忘记农民在解放战争中和对革命的支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亲爱的兄弟们，我们可以向你们证实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有了改善，并且正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我们确信一年将比一年好。

关于社会主义的实施，你们大家都了解一个叫做“自

管”的部门和一个称为“三月法令”的法令。实际上，这些法令在6月19日以前从未执行过。我们在这里第一次以现实主义和严肃的态度根据真正的法则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抛弃所有哗众取宠的做法和所有轻易博取群众好感的种种企图。目前我国的农业形势顺利地向前发展，管理委员会的责任比过去更大更明确。我们诚恳地希望他们今年能取得劳动果实，这将是合理地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较好的证明。

但是我们不是停留在我们收复被夺去的土地上，因为这个问题，甚至在解放战争结束前已经解决了，我们不仅接管并且使那些原资本家或负责人遗留下来的工厂重新开工，我们说“这就是社会主义”。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把其他部门的工作担当起来，例如收回国家矿藏资源。关于这一点，你们不会不知道在6月19日前，很多矿藏的开发权是操纵在外国托拉斯手里的。

今天温札市镇人民议会主席可能也在座，他可以给你们谈谈这些矿藏的重要性，开发这些矿藏的外国公司的势力和影响，不单影响了工人或纳税人的生活，而且甚至影响我国民生问题。我们公开声明这些资源是属于人民的，应该归还给人民。如果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绝对不能认为把那些外国公司留下来的只有破旧和无用的设备的“空”厂房接收过来就算了事。我们必须收回的是真正的生产手段，这就是我们过去所做的。

我们曾面临着克服托拉斯所制造的种种困难，由于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找不到买主，我们不得不把这种或那种矿产积压将近一年。革命委员会和政府颁布国有化

的法令，把矿山全部归还给真正的主人，就是劳动者。于是反对阿尔及利亚的联盟成立了，可是我们没有接受让人家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某些买卖交易，我们没有在任何压力下屈服。

我们宁可把过去由外国人所开发出来的矿产扔到大海里去，也不愿去利用它。

我们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为我们的矿产找到了销路。在收归国有的法令颁布不久，非洲其他兄弟国家也颁布了同样的法令。我们才明白，我们这一大胆立场不仅对在阿尔及利亚的外国托拉斯是一个威胁，而且他们在非洲其他地区，也同样受到威胁。……

我要指出革命委员会和政府的政策是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最近瓦赫兰大学的开学就是一个例证。阿尔及利亚西部和整个阿尔及利亚都为此感到自豪。

第三所大学不久也将落成，地点是在君士坦丁，无疑这将使阿尔及利亚东部和整个阿尔及利亚感到自豪。这些高等院校的设置符合国家在各个地区、各个方面和各个部门的平衡原则的。

……

我高兴地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上，特别在我们的国家和革命所经历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情况下，能够同时指出，除了发展我们的经济和结束社会问题、建立中小学、大学、医院各个方面化了极大的精力外，革命委员会和政府还要继续建设国家人民军队。

这是一道无需作注解的命令：这就是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进行革命，我们的制度最反对局部利益，也反对

那些超过我们国界以外的利益。

我们必须保卫和维护社会主义，为此，我们不能单单依靠人民的热情，以及他们的高贵感情。

我们必须为我们的人民制造一种工具，使他们能够用以战胜他们内部的敌人和保卫领土的完整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经验。

我们不能成为一个生活在空想世界里的浪漫主义的或富于想象力的人民。

社会主义的意思是彻底改变阿尔及利亚的社会，这里包含着排除和阿尔及利亚人民最高利益不相容的其他利益的意思。

这里也包含着取缔几十年来一直在剥削我们人民的外国托拉斯。

很明显，这样一个改变不可能不遇到困难。

这就证明了建设一支国家人民军队是不可缺少的，这是为了保卫我们勤劳人民的革命果实以及保卫祖国的基本条件。

亲爱的兄弟们，今天我们当着你们的面必须严肃地驳斥某些宣传和谣传，根据这些宣传和谣传，阿尔及利亚在加强武装，它已经获得“米格 21”、大炮以及舰只。

如果确实我们有大炮，最新式的装甲设备、“米格”飞机、舰只，但这些武器从未对准我们人民的利益，而恰恰相反，它们是保卫我们人民的。

这支军队不是用来支持我们到国外去提出收复土地的要求，我们满足于我们的国界。我们不提出任何归并的要求，也没有什么扩张的野心。这就是我们关于这个问

题的政策。

我们武装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达到国界以外的目标或者是去执行国外的命令。

我们并不想去占领巴黎或华盛顿或其他国家的首都。

借此机会，我们再一次声明，我们不论是对东方、西方、南方，都没有政治利益，我们最关心的是我们的经济建设和解决我们所遇到的困难问题。……

译自《非洲革命》第 212 期，1967 年 3 月 6—12 日

## 在阿拉伯社会主义讨论会 开幕式上的讲话

这是布迈丁于1967年5月在阿尔及尔松树俱乐部召开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参加会议的有“阿拉伯社会主义者”、外交使团人员以及观察员等约二百余人。布迈丁在讲话中着重阐述所谓阿拉伯的社会主义问题,思想与政治的关系,阿尔及利亚的经验,并提出当前世界形势中“北富南贫”的“畸形状态”等问题。以下是讲话主要部分的摘译。

.....

我们的社会和其他社会一样,也吃到思想与政治相互分开这种苦头,这种分割妨碍富有成果的对话和创造性的辩论的开展,由此出现了思想家与政治家之间那种由来已久的互不信任。

实际上,我们在过去以及最近都发生许多重要事件,加深了这种分裂,并保持着这种不信任。我们国家有过一些负责人把搞政治当作职业而不是作为战斗,把政权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拒绝和思想家对话,除非是一方授意,另一方唯命是从。我们国家也有过一些职业政客,要意识形态服从他的野心,把意识形态拿来颠倒是非,或颂



扬错误路线。具有人民解放性质的革命在许多阿拉伯地区给政治家和思想家对话这种传统观念带来了重大改变,证明有益的对话是可能的,只要把对话进行到底并建立一种无例外的对话传统就行。

我们应该坦率地正视阿拉伯国家中特有的矛盾,深入研究这些矛盾,以便取得实际的和真正革命的解决。这个任务当然是不容易的,甚至是艰巨的,因为阿拉伯世界正处在过渡阶段,一方面有与反动势力相结合的殖民主义残余,另一方面有人民群众中涌现的进步潮流,这两者之间正在进行着不可调和的斗争。

这是一场复杂的斗争,一方面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并有殖民主义思想所搞出来的最现代的技术来扶植的消极和保守势力,另一方面是我们概括的革命经验所支持的本国积极力量。这就是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利益还掌握着不可忽视的手段,特别要看到阿拉伯民族某些地区仍然停留在不发达状态,会使广大阿拉伯群众辨别不清他们的真正利益之所在。

过渡时期制度的相互矛盾,使情况变得复杂。除了我们还有资本主义尚未清除的、隐藏着倒退思想的机构制度以外,我们已经找到了另一种代表群众愿望、反映未来景象的制度和意识形态。

在这种矛盾中,如果不战胜殖民主义的残余,不摆脱坏的习惯和幼稚的想法,不停止在空虚中打转转,我们就不能前进。

现实主义要求我们对阿拉伯世界的形势进行全面检查,总结所有的积极成果,了解各种力量的集中点,明确

所有的弱点和停滞不前的原因。

谈到现实主义,我们并不认为就是我们自行其是,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即简单地使思想和行动互相结合,让思想陷于臆造的数字中,在自我陶醉和自尊心中僵化,忽视现实和现实可能性。同样重要的是,实际行动不应该被束缚在盲目的逻辑的框框之中。

阿拉伯的先进分子有必要恢复自己的本来面貌,以便从那种徒有其表的作风中解放出来,这种作风喜欢玩弄字眼而不讲究内容,喜欢城市而不喜欢农村,重视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而不是听取农民工人的深刻意见。

阿拉伯革命运动如果要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就必须关心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真正革命基础的农村群众。它应该寻求最有效的方法来解释它的观点,并保证深入到农村劳动群众中去。

这个任务不是不可能的,如果看一看上一个世纪和本世纪某些阿拉伯国家和第三世界所取得的成就的话。在十九世纪,有许多重大政治运动就是起于农村,并引起了某些政治形势和思想方式的变化。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时,阿尔及利亚革命依靠农村群众创造了奇迹,并且由于接近现实而解决了许多问题。

对于阿拉伯进步经验的探讨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因为这种探讨可以使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想家养成实验、比较和丰富自己理论的良好习惯。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阿尔及利亚才接待阿拉伯社会主义者,并为他们提供方便,使他们能够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实等方面深入研究阿尔及利亚的经验,同时给

以评价。我们无意把阿尔及利亚的经验作为唯一的范例或最好的解决办法来介绍。我们只是想让人们注意某些阿拉伯经验的积极成果，注意那些错误和能够损害革命经验的消极方面。

积极成果和错误加起来就能够巩固阿拉伯的革命意识形态，使之成为对革命潮流性质的解释、确立社会主义建设的法典、防止出现偏差、促使取得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根本基础。

阿尔及利亚经验对于评价人民首创精神这个问题提出了重要结论，经验证明，战斗先锋队发挥了首创精神，在明确的思想指导下开展工作，取得巨大成绩是完全可能的。

阿尔及利亚经验证明，真正从人民群众出发的政治斗争的发展必然会造成革命性质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为人民群众一旦登上了政治舞台，特别是当他们拿起了武器，他们就会懂得经济势力和社会势力对于政治势力的影响，就会相信唯有战斗可以不受影响。

这时人民群众朝着战斗的先锋队指引的方向真心实意地奋身而起，而先锋队所指引的方向确实是符合已取得的成就的要求的。这样，政治斗争就成了一次深刻的革命，这一革命继之又变为完整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这种演变是一切真正人民运动内部固有的逻辑所决定的，它说明了阿尔及利亚革命行动的许多具体事例。试以农业自管制为例，农业自管制在未经最高领导列为计划体系之前，在战斗的人民的基层就已经产生了。

由于阿尔及利亚革命先锋队知道从这种演变中汲取

教益，推进自管制的组织工作，充实并且修订自管制章程，使之成为为劳动者解放服务的有效工具，使劳动者由被剥削的工资收入者上升为对自己事业负责的保卫者。在这种思想范围内，还采取了其他主动措施，以便为这种试验的成功提供一切条件，从分区管理到设立国家银行，为这个生产部门提供财政经费，以及农业自管制部门各生产单位关系的建立。这样，劳动生产者在国民经济中的责任和作用就更大了。

在这方面，阿尔及利亚革命先锋队还拟订了一项土地改革计划，以实现“土地归解放者和耕种者所有”这个口号。

不论在这一阶段有多少困难，阿尔及利亚决定要渡过这一阶段，以便结束大规模土地经营的作法，偿还对农村劳动群众欠下的债务，因为在武装斗争时期他们承担了最沉重的捐税。

为了保证计划取得成功，阿尔及利亚革命先锋队还创设了一种新的市镇组织，给予基层人民代表以广泛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责任，使地方负责人成为来自人民的当权者，处理人民的问题并关心他们所关心的事务，而不是由规章、决议从外面强加进去的机构。

根据同样的情况，阿尔及利亚还面临着工业化的战斗。阿尔及利亚把这一场战斗同为清除新殖民主义一切基地的收回国家财产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新殖民主义不断动员其所有力量，并利用一切手段，使我们国家离开自己既定的道路。但是阿尔及利亚不会同意牺牲它的一百五十万子弟，让同样的剥削以新的形式在它的领土

上卷土重来。

所以阿尔及利亚选择了独立的经济政策，并且取得了重大胜利。

阿尔及利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它要按照根据各种精确统计并且经过专门研究而拟订出来的科学规划，努力发展工农业。

今天，我们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达到不会反复的阶段。我们知道强调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性不会使你们再学到什么，因为改变落后状态所发生的变革难免不犯错误，这是事实。如缺少干部，缺乏办法和经验，这就是产生自相矛盾的估计的因素。克服困难的唯一办法是提高政治意识，采用来自实践的革命理论，在生气勃勃的运动中丰富自己的经验，以使思想和实践完全协调一致。

我们相信整个阿拉伯祖国重视经过实践的革命经验，这有助于对尚未解放的阿拉伯地区确立适合该地区革命方法的思想，能够缩短走向社会主义的阶段，并且丰富社会主义思想。

阿尔及利亚的经验，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积极经验一样，突出地说明了一个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不断开花结果、发扬光大的真理，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多种多样，但是条条道路都和它的起步的基础相联系，这起步的基础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因每个国家自身历史条件不同而各异。

当我们决定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特定道路时，我们必须警惕和谨慎，因为反动的思想会利用这一真理，加以

无限扩大，直到从本质上把它分解为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

按照某些人的设想，社会主义看来只是一种外表，里面隐藏着各种完全相反的制度。所以当我们试图从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吸取教益时，不应该忘记社会主义的本质只有一个，其目的是要把人从剥削中解放出来，使生产者掌握经济和政治的权力。

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同为统一思想、消除思想混乱而进行的战斗有密切关系。

即使应该重视每一种经验的特殊性，以求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获得成功和采取适当的社会主义形式，那么，相反地，也不允许把这些特点强调到停滞不前、固步自封、拒绝外来影响的地步。

不要把这些特点和全局脱离，因为一切真正的革命经验都和全局分不开，其中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统治的斗争。根据这样的准则，我们就能区别真假社会主义，使我们的群众防止空谈，而空谈正是所谓多种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

按照我们的观点，这是可以使我们避免犯危险的理论上的错误、为社会主义革命开辟新的行动领域的一种有益的分析。

.....

作为阿拉伯人，我们不能从地区主义的角度来探讨我们的各种经验。所以，我们着手召开一次阿拉伯集会来实现我们这一宿愿。这次集会将是以后集会的一个开端。可是，另一方面，我们阿拉伯人不能撇开正在撼动世

界的各种危机来讨论自己的问题。所以，对阿拉伯世界所关心的问题如果不同世界范围的问题联成一个整体来加以讨论，就不能取得结果。

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冲突是第三世界与世界殖民主义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世界殖民主义在这一较量中的主要目的是要扼杀第三世界的真正经验，以便在帝国主义被迫退出的势力范围内恢复帝国主义统治。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把它们分开的侵略性对抗中摆脱出来了。如果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世界基本矛盾是以东西方对抗加剧为标志，那么，这种对抗的某些结果就是紧张局势的缓和和向和平竞争的转变。在这种较量中，由于东西方的冷战，弱国的解放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并且开辟了谋求生存和肯定自己人格的道路。第三世界作为一种新的现实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它们在肯定自己属于哪一个集团之后，又开始根据自己的现实和作为实体以明确的方式来确定自己。

由于发展中国家采取了新的立场，世界帝国主义对它所受到新的威胁的性质是不会不注意的。它更害怕肯定这样一条真理的危险，这就是：事物可能不是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所适用的准则而是按照第三种准则来演变。而当它看到这第三条道路可能在富有精神财富的坚强社会如东方阿拉伯国家那样的社会里取得成功时，这种恐惧更是有加无已。因为这种新的社会的范例的成功，肯定能够剥夺西方基本理论中的一张王牌，西方曾经用这张王牌搞心理恐怖主义并且对革命运动和第三

世界要求发展的愿望施加压力。

世界冲突的性质的变化在传统观念中引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表现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活力,即使是作为无可争辩或不可缺少的指导理论也在变。

第三世界朝着肯定自己人格的方面的发展,再加上世界经济竞争的要求,孕育着南北分裂的危险。富有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的这次分裂威胁着不发达国家的生存,特别是当人们看到一方是富有和贪利的少数人,另一方是一无所有的多数人这种畸形状态,这种畸形状态经常带有一种暴力性质,往往会达到动用武力的地步。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注意到这种新发展的某些侧面,企图利用这种情况来使人怀疑革命,因为新的发展一旦达到了经济繁荣的某一程度时,它就体现了革命的目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试图瓦解世界的革命和进步的运动。但怀疑革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革命并非来自抽象概念,而是和以财富的不公正分配为特点的现实状况密不可分的。

这种状况存在着,甚至它的趋势将更为严重。所以需要召开象我们这样的集会,以研究用怎样的行动方式,在保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来维护革命的势头和保持革命的完整性。

此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重新夺回它已失去的地位而提出的理论,不可能被革命者确定理论、制定原则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所打败。

而发展中国家期望同帝国主义打交道,这却是另一回事,这是属于经济方面的一些实际立场的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设法使我们的联合和友谊符合于这一准则。事实上，如果我们拚命空喊原则的价值，却忽视了这个问题的经济的一面，那么，我们就又一次扮演了故事上讲的那个只相信听到的而否认看到的人物了。

目前世界冲突正在使真理出世，这就有助于造就第三世界的思想家，阿拉伯社会主义理论家是这些思想家的先锋，这是为了使他们免于大失所望。

阿拉伯社会主义者要采取两个方面的行动，这就是在第三世界前进方向指引下考虑阿拉伯的行动和在第三世界演进中分析阿拉伯所发生的影响达到的程度。

不可忘记：正是由于西方对阿拉伯社会的优势才在世界上保证了霸权，这种优势是在非洲、亚洲广阔土地上把阿拉伯国家包围起来才实现的；可以这样说，阿拉伯的文化领域比阿拉伯社会的生活范围要广阔得多。

分析阿拉伯革命运动的内容，看看这一运动在阿拉伯国家外部的发展，就证明了上述这一条真理。

也正是这一真理，在今天，促使世界帝国主义对阿拉伯革命运动进行压迫，用“保护带”来围困它，阻止它同第三世界各邻国进行合作。

正是这种忧虑使世界帝国主义把阿拉伯世界列为战略目标的第一条。

因此我们不应不看到：殖民主义者的互相渗透关系在各阿拉伯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存在着。

我们应当相信，一方的削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另一方面的削弱。

第三世界各不同地区的紧密联系是牢固的，是在共同反帝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它们都是为走向繁荣的雄心所鼓舞。这意味着在准备好革命行动的理论基础之后，无数的边界就消除了。

说明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并不完全在于构思那么一种意识形态的哲学。现实的某些侧面指出了南北分离，这样的现实并不是一种单纯个人的想法。在这尖锐的对抗中，我们并没有侥幸取得成功的机会，而只有努力设法改变当前世界经济关系的性质。如果我们满足于利用世界现状的内部矛盾，仅限于在数量上的变化，那么，我们就在很大程度上有帮助西方维持优势的危險。

让我们找出一种行动方式，以便消灭目前正在扩大其恶劣影响威胁世界的这种经济“章鱼”。

穷人的世界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它要反抗新殖民主义及其阻碍穷人世界发展的复杂而阴险的机构，它正在遭受新殖民主义的残暴本质所造成的后果。第三世界——刚果、越南、也门、南部阿拉伯、拉丁美洲过去和现在的经验证明，殖民主义不会放弃暴力，即使是它另换一个新词。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又被重视了，至少可以说，这又使穷人增加了困难。

是的，弱国的人民的土地充满着财富，但这些财富却流到工业化国家银行的保险柜里去了，工业化国家使用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来反对这些弱国。弱国人民只有团结起来，禁止掠夺他们的财富，反对出卖他们的前途，只有这样才能摆脱上述那种处境。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必要的基础，从内部来加强自己，因为建筑在外援上的发

展是虚假的。

.....

译自《非洲革命》第 224 期,1967 年 5 月 29 日—6 月 4 日

## 在“七十七国”集团第一次部长级会议上的讲话

以下为布迈丁在1967年10月召开的“七十七国”集团第一次部长级会议上讲话的全文。他在讲话中着重指出“今日世界的主要冲突只能是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富裕的北方与贫穷的南方之间的对抗”，以及不发达国家应采取的对策。

今天，阿尔及利亚高兴地欢迎“七十七国”第一次部长级会议的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成员国。

这次会议在研究起草各国新经济宪章方面，将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阶段。

强调这些要着手进行的工作的深刻意义，强调这些工作必然会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对它们消灭不发达状态的共同斗争的深远影响，看来是并不过份的，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关系正经历危机而不利于与西方工业国家进行有效对话这样的关键时刻。

事实上，帝国主义势力不停地把热战强加给第三世界各个地区——越南、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与此同时，公开的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继续对尚未解放的兄弟

国家进行残酷的战争,以支持那里的外国势力,为殖民主义保持卑鄙无耻惨无人道的剥削地盘。

众所周知,恶势力总是要维护它们的剥削和特权的势力范围的。可是,如果它们想用新殖民主义的办法来为它们的利益服务,那么,不发达国家的成熟的先进领袖就要立刻揭露它们的企图,其结果必然调动起人民的潜在力量,并引导它对这种新剥削方式进行斗争。

这样的战斗立场引起了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强烈反应,它们用各种各样的形式,以最毒辣的手段来反对第三世界的进步制度。

这种态度清楚地表明帝国主义极端害怕看到第三世界人民选择使他们收回自己的财产、决定自己的经济前途、实现具有真正社会公正的可靠发展的道路。这就是说,大多数工业国不会接受在合理的基础上建立保证消灭不发达状态和建立和平的国际合作。

相反地,我们清楚地看到,发达国家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方法动用强大手段以确保它们的政治和经济的专制统治,并借助于地区性的协议来协调它们各自的经济,结果是这些大国越来越贪得无厌,加强对第三世界的压制,以便更多地掠夺第三世界的财富。

事实就是如此,因此举行“七十七国”会议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假如穷国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那么,要加速社会和经济领域里的发展,就必须大大加强它们间的密切关系和紧密合作。这是实现我们最关心的社会和经济发所不可缺少的。

所以，我们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应以争取参加起草国际性政治经济决议的权利作为我们的任务，以结束它们只能俯首听命于工业发达国家的状态。

假使为保证维护我们经济利益的有效团结没有建立，我们国家的政治解放、参加联合国的讨论将纯粹是形式。我们国家的潜力、基本原料都是最富有的，而我们的人民却最贫困、最悲惨，这是不正常的。

因此，作为不发达国家，我们必需根据我们的经济现实和发展需要，在国际事务中决定我们的行动，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财富。

不发达国家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新殖民主义以及它建筑在最新科学技术发明基础上的阴险手段，不发达国家必须击破帝国主义的阴谋，帝国主义是不会不利用它的物质优势来达到统治目的的；不发达国家同样会遇到由于公开的殖民主义掠夺它们的财产，毁坏它们的个性所造成的各种不发达的现象；不发达国家还要面临国际关系中的新情况，这些情况会加深它们的困难，加重它们经济和社会的落后状况。

但是，不发达国家有办法扭转这种局面，因为它们的联合使它们在国际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样就能保证预期的成功。它们还必须懂得正确利用它们的手段和可能性，引导它们的人民参加到唯一值得自豪的战斗中去，参加到为进步、繁荣、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战斗中去。

二十年来，世界上受苦人的经验证明，不发达国家能够影响工业国家的舆论，能够采取一致行动促使工业国家的舆论考虑它们的一部分利益。

舆论对于你们组织的关注，和我们不时听到关于必须修订有关贸易条款的反应，这都不是偶然的。这恰恰是第三世界努力的结果，是从1955年万隆会议到1961年的贝尔格莱德会议期间它们在意识到自身利益道路中所经过的各阶段的结果。第三世界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以历届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地区会议为起点，最后终于导致了“七十七国”会议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召开。

我们看到，由于我们的共同努力，我们这些国家能够迫使在世界范围内研究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的主要问题。1964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的决定并没有付诸执行，这是事实。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西方国家不愿意执行；另一方面，它们把不发达国家彼此对立起来从中渔利，它们所根据的原则就是“分而治之”。

所有这些障碍，都没有能阻止第三世界继续努力以实现贫苦群众的愿望。由于任务的复杂性、左右各工业国关系的利益的相互渗透和控制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垄断，我们不得不进行一场长期的和多方面的斗争。但是，在能使联合国听到被压迫者的世界的声音的统一阵线形成前，这些障碍却也能唤起人们的主动精神。

看起来，目前这场战斗并不平衡，力量对比还是有利于工业国家，但我们不应该泄气。不发达国家过去比现在更弱更孤单，但还是进行过多次我弱敌强的斗争，结果却获得了胜利。

我们不发达国家要认识到对我们战胜不发达状态的能力所散布的怀疑说法是来自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它们想从我们国家内部阻挠我们的行动自由，挫伤我们的积极性。

与某些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恰恰相反，第三世界不是注定永远不发达的。我们大家都认识到造成这种状况的确切的历史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先进国家富裕了起来。

没有必要再提欧洲和美国掠夺第三世界的自然财富。目前组成第三世界的半数国家的政治独立没有完全结束老殖民主义的控制，它还以多种形式出现：外国人的占有权，对国家财富的控制权，低价买进原料高价售出制成品，以及银行业务等等。

同时还存在着贸易条件不平等的情况，这些都给不发达国家带来最严重的损害。

第三世界必须准备坚决反对外国剥削，对当前世界状况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如果第三世界决心达到下述两个主要目标的话，这是能够做到的：

——由我们的人民收回他们对自然资源的完整主权。这些资源正被用人民的名义在开发，但结果常常是用来反对人民。

——为加速穷国的发展，要求工业国所作出的贡献只能看作是偿还债务中极小的一部分，这些债务是因西方国家几世纪或几十年的丑恶剥削而欠下的。西方国家对于不发达国家的贫穷和文化落后是负有重大责任的，这在今天已经是确定不移的了。

的确，要达到这两个目标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新殖民主义正竭力保持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



的不发达状态。我们也知道，它不断地用公开或隐蔽的方法来干涉我们的内政，目的是要反对我们走向经济上的解放。目前公认东西方的对立已经由冷战阶段演变为和平共处阶段，这种形势就更加复杂了。

如果说和平共处已取得某些积极成果，使世界摆脱原子战争的危险，那么，和平共处也不应该建筑在第三世界国家和第三世界正在为自身的经济解放而斗争的人民的痛苦上。但是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因为和平共处在第三世界得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帝国主义利用这种和平共处所创造的新条件，集中最强大力量打击第三世界要求政治、经济解放的愿望，其唯一目的是继续控制供应最重要原料的资源。

帝国主义利用这种新的情况在许多地方扩张势力，因此今日世界的主要冲突只能是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假如我们不及时改变这种局面，恐怕这种冲突就要发展为富裕的北方与贫穷的南方之间的对抗。

所有这些困难必然促使我们协调我们的行动，在我们各个部门建立有效的合作，采取保证能够在适当时期内消灭我们的不发达状况的经济建设方针，坚决地对抗我们的剥削者。

社会主义国家的范例是已经得到证明的事实；而且如果考虑到时间的因素，我们国家也不能按照十八、十九世纪欧洲采用的办法来建设经济。不发达国家应该考虑时间因素，毫不妥协地运用它们的权利和自由选择最合适的制度，排除帝国主义为强使它们采用有利于帝国主义统治和剥削的制度所施加的压力。

首先，不发达国家必须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把这个原则看作是保证胜利、取得自信和取得别人尊敬的首要条件。这并不是什么哲学教条，也不是对工业国的一种否定态度，而是我们感到必须表达和说明我们生活的真实情况、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的性质，以及为避免动荡和失败危险、把我们的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的方法的本质。

换句话说，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要求是在我们努力的范围内的，都是体现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宪章原则精神的，这些原则宣布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有正当的生活权利。

我们只要求对人类劳动的成果在全世界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为各国人民提供经济繁荣的各种条件。这无疑是我们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消灭对抗和战争根源所能作出的最好贡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请求世界各国人民、各大强国放弃政治统治和军事霸权的野心，用它们的巨大物质力量来消灭富国和穷国间存在的差距。不发达问题对地球上所有的民族都是息息相关的：北富南贫这种社会、经济的不平衡的加剧可能成为威胁世界的灾祸，其未来的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这些客观因素决定了我们所肩负着要实现的任务的性质，它使三大洲人民关心这次会议的进展，他们希望大会采取适当措施以改变目前状况，并设法促使工业国也共同实现这些措施。鉴于你们的经验，你们不会不知道，只有一致行动才能协调我们走向繁荣的步伐；我们国家间的紧密合作，我们政府在与工业国关系方面的努力配

合,对大家将是有利的。换句话说,“七十七国”集团会议肩负着历史重任,其成功与否不仅和第三世界的前途有关,而且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也息息相关。

事实上,你们的组织从成立到现在,对于我们的人民始终是关切的。我趁此机会要强调指出你们的会议的协调委员会在日内瓦所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它所作出的富有成果的努力和在工作开展中所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一定会有助于你们这次会议取得积极的决议。

作为世界上不发达地区的国家,假如不扩大交换物资和经验交流的话,我们的国际合作将不能取得它的成果。我们阿尔及利亚学习了第三世界所取得的各种经验,它已签订了一些合作协定,这种合作是对阿尔及利亚经验的珍视,阿尔及利亚经验来自人民的意志,即在取得政治独立后要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脉。阿尔及利亚将继续走实现社会正义的道路,它的起点就是无例外地在工业企业 and 农业企业中建立自管制度。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如何尽快地在各国间建立新的经济制度的道路和方法。也就是说,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希望你们把目前世界经济关系的性质来个根本改变,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只涉及贸易问题的“幅度”的一些改善。

这个任务看来是艰巨的。但是我们人民有着巨大潜力,我们国家拥有充分财富,我们领导人也有坚定的意志,只要我们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共同行动计划并保证贯彻,这个任务是可以实现的。我们肯定你们的会议将要深入研究这些重要问题,并从过去几年的经验中吸取

教训。会议将肯定基本原则，对于协调第三世界内部以及与工业国之间经济关系的统一行动采取明确措施。

结束讲话之前，我要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劳尔·普雷比希博士表示欢迎，大家都愿意承认他对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所具有的能力和所持的公正态度。我也要向联合国地区经济委员会各位执行秘书先生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工作的代表团致敬。

最后，我祝愿代表第三世界的这次会议不辜负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对它的期望。愿这次会议通过一个加强真正国际合作基础的共同纲领。我也祝愿订于1968年2月在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次会议加强第三世界的团结。

再次衷心向你们表示欢迎，希望你们将在我们这里过得愉快，希望你们的工作取得胜利。

译自《非洲革命》第244期，1967年10月16—22日

## 在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8年，布迈丁于6月19日运动三周年纪念日在民族宫召开全国干部会议并发表讲话，又一次谈到6月19日运动的起因，并回顾了三年来的情况。提出运动后的首要任务在于重新组织国家机构；在经济方面，谈到建立农业自管制、创办国营公司，以及对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政策等问题；在国际问题方面，着重谈了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的问题。

我们现在召开第三次全国高级干部会议。

这是6月19日复兴运动以后建立的新传统，事实上就是一种工作方法。按照这种工作方法，可以十分清楚地、坦率地和客观地提出并讨论各种问题。

今天庆祝1965年6月19日运动三周年，我们就要想到我国所有的烈士，想到我们解放战争的所有烈士。

亲爱的兄弟们，全国干部们，在这个日子里概括一下最近三年来我们所经历的阶段和已取得的成就，并检阅一下这一时期革命的各种情况，是不无裨益的。

我想没有必要再来谈6月19日运动的始末，我和其他一些负责人都已有过机会谈到这个问题，说明当时全

国和革命的情况，并叙述了导致1965年6月19日复兴运动必然发生的种种起因。

我也已经明确地、客观地谈到过当时运动的处境。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对这个运动进行恶意宣传，使国内舆论和国际舆论相信他们那种6月19日的运动是倒退而非跃进的说法，以此蛊惑人心，混淆视听。

有些利己的人，还有些为特殊的物质利益所驱使、把一切革命的进步都看作是对他们的特权的一种威胁的人，和一些外国雇用的代理人，有意制造和维持这种蛊惑人心、混淆视听的气氛。今天，我们可以说，凡是把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放在一切之上的人，他们今后的前途是光明的。

6月19日运动是反对各方面所存在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现象的运动，其目的就是要把革命从允许一个人为了个人利益篡夺革命果实，并以革命、社会主义、人民和阿尔及利亚党的化身自居的错误倾向中扭转过来。

有些战士、兄弟，或许是出于好意，为一个新领导者歌功颂德，自以为是与某种先知使命结合起来了，并且以他们的言行去鼓励个人崇拜，面对这种形势，另一些战士和兄弟却承担起自己的义务和责任。6月19日运动结束了这种错误倾向，使革命得到复兴。

6月19日以前的国内形势，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财政方面和国家各机关组织方面，都是岌岌可危的。在国营企业或在任何其他方面工作的富的或穷的阿尔及利亚人，没有一个会感到独立以后生活的稳定和安宁。

另外，有那么一些对我们国家和革命格格不入的异

己分子竟然能够钻进我们国家摇摇欲坠的机关里，试图把革命引向与它的目标相反的错误道路上去。

6月19日运动以后，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们首先关心的事情就是组织国家机构，建设国民经济，摆脱对外国的依赖。我们还应该在适合新的形势和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的新基础上改组党。

这个总的方向是我们运动的特点，其目的是要在牢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一个现代化国家。没有现代化的国家，一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就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重要的，以后一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再来讨论；但是，能否把整个问题弄清楚还不一定。

如果需要从历史观点来解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殖民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摧毁阿尔及利亚国家的结构。

但是，一百三十年来，由于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由于从埃米尔·阿卜杜勒·卡德尔起来革命到1954年11月1日革命为止连续不断革命的结果，产生了一种新思想，其特点就是造反、痛恨殖民者和要求解放。

这种战斗精神使人民献身并致力于清除殖民主义的工作。

后来，这种对任何一种权力或政权的表现形式的反抗精神就成了阿尔及利亚人的一种特点。

解放后要重建阿尔及利亚国家。

这时就有必要在我们的同胞中兴起一种新思想，向他们说明不建设一个国家，我们数以百万计的兄弟所为之牺牲的最高目标就不可能达到，但要建设的，不是为特

权阶级，而是为人民的最高利益服务的国家。

在我国独立以后，有些异己分子，有些托洛茨基分子曾经钻进党和国家各机关。这些人不相信阿尔及利亚的前途，毫不关心阿尔及利亚革命。

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制造思想上的混乱，进行恶意宣传，搞口头上的革命、客厅里的革命、传单上的革命，直到他们控制真正的阿尔及利亚革命为止。

异己分子、托洛茨基派或其他人的这些政治倾向，就是要使国家在还没有建设起来之前，还处在敌人破坏的一片废墟上的情况下，就分崩离析。按照这些宣传家的理论，国家只是剥削的工具。然而现代的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国家的存在，任何社会就不可能有进步的道路可循。这是明显的事实。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牢固这一事实，就是这种明显性的最好例证。

我要在这个问题上尽可能讲清楚，我们政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阿尔及利亚国家的再生，就是要建立一个受国内外尊重的现代化国家。

在我们的努力下，有许多目的已经达到了，首先是权力的增强。我们已经填补了真空，结束了区域主义和集团势力范围的时代。

在结束了这种不健康的情况之后，一个现代化的阿尔及利亚国家就能建设起来了，我们每天都在制订法规。阿尔及利亚干部从此占有其所应有的地位，而过去全国是在一种疑虑、不稳定、缺乏信心、忍受外国剥削、一些特定集团的统治下生活的。



去年1月5日我已经讲过，每个人在国家机器中都有他的集团按照他的意志进行领导。

为了消灭这些不正常现象，清除势力范围，我们已经采取行动，并且已经取得了具体结果，因为一个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依附于一个人或一个集团。

政府机关人员应该为国家的法律服务，国家的法律保障他的权利，也确定了他的义务。

过去国内所存在的这种情况，现在正在结束中。今天，我们可以说，这种情况，而且是很严重的情况，正在消逝，继之出现的是一种新的局面。

尽管中央、地区、甚至基层的组织有缺点，但要走的道路更明确了，胜利已经在望，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

国家机器、国家各机关正在巩固中；任何力量，不论多么强大，都不能动摇它。

国家的最高组织，近三年来遇到了许多严重的困难，但国家的基础没有被动摇，因为它是在十分严肃认真、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建立起来的。

所以，第一阶段以来我们就集中全力巩固国家，对于这个首要的目标，我们的干部已开始感到有此必要。

一百三十年来，人民按照自然和历史的规律，曾经对殖民当局进行反抗，终于认识到国家是自己的国家，政府是自己的政府，人民相信国家和政府都是为他的利益工作的，尊重国家和政府，就是尊重自己的利益。

有了这种认识，现在人民遵守国家的法律，尊重国家权力的代表和缴纳捐税和房租，以此对国家尽他的义

务。

这种转变感动了全体干部，这是必然的，因为以前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国家，所以干部也缺少经验。

的确，我们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如果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获得了我们所企望得到的一切，那就不现实、不客观了。

今天，国内秩序已经恢复，局势已经稳定，这是因为已经有了一个有效的权力机关和一个有效的国家来保障财产和人身的安全和受到尊重，结束无政府状态，和不遗余力地采取行动使各个部门、国家各机关趋于健全。

虽然有了这些成绩，但是要完成国家建设，道路还是漫长的。我们设立的机关是新的，我们的干部还很年轻，并且缺少经验和思想觉悟。

我们应该坦率地、客观地进行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缺乏觉悟，尤其是高级干部，只有极少数人是例外。这些干部在管理属于他们经管的部门中没有尽到他们应尽的责任，在和人民的关系上也是如此。

这个缺点已构成一种危险，值得我们注意。如果说，干部要求用法律来保障他的职务上、物质上的前途是干部的一种权利的话，那么，相对应地，以人民的名义要求每个干部和每个负责人对国家克尽厥责，对阿尔及利亚国家的建设作出贡献，这也是国家政权的权利。

在日常工作中，干部应对人民负责，保卫国家利益。

的确，经验和能力是与时俱增的，然而，我们必须自问是否所有的干部都有责任心，是否所有的干部对待其职责都是严肃认真、坚持不懈的。

我们应该承认，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无论是在组织方面和认识方面都还存在缺点。

现在我们大家都应该采取行动来克服这些缺点。

去年，我们已经在民主基础上成立了市镇人民议会，旨在为劳动群众、农民和工人服务。我们还赋予它一些职责，其范围正在扩大中。

亲爱的兄弟们，以上是我们在这方面所获得成就的梗概。

然而，除了这个极重要的问题之外，我们还必须谈一下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经济问题。你们知道，在现今世界，经济问题对一个民族的力量、自由和尊严是有影响的。

只要我国的经济依赖外国，我们的主权就不可能完整。

在这个物质力量占优势并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如果我们的经济基础不牢固，并受外国意志的支配，我们就不能确保我们的独立。

所以，我们政策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力量放在经济上面。首先，我们应该制止混乱状态。这种混乱状态一方面是由殖民主义者、“秘密军队组织”和对原殖民国家的经济依赖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由农、工、财贸等各部门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以及那种临事应付、逃避困难、哗众取宠、以第三世界领导自居的政策所犯的错误所造成。

明白了这个概况之后，我们再来谈谈经济领域各部门的情况。

阿尔及利亚农业，在殖民统治时期，它每年为法国移民提供数百亿的利润，现在已成为国库的重大负担。

这种情况产生在混乱和哗众取宠的时期，曾导致一千多亿旧法郎的赤字。在这时期，政府声称一切都很好，农业自管制也很健全。

谁也没有说一句相反的话，包括第一把手及其周围人员。这或许是由于缺乏勇气，要不就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

这是对人民、对国民经济的犯罪。这是一个把阿尔及利亚引向另一形式的殖民化的罪行，尽管有这样重大的危险，还是没有一个人敢于开口揭发。

我们已经起来反对这种情况，我们赞成的是没有赤字给人民负担的农业自管制……我们已经说过，农业自管制就其本身来说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只有必胜的人民革命才具有神圣的意义。

所以我们已经把农业自管制工作上的所有缺点控制住了，并且把所有诈骗行为揭露出来。这些诈骗行为的受害者首先是工人、农民和人民的儿女。

然而，当时一切活动都是由首都通过一种官僚组织和一种行动如此不便的集中制来领导的，以致农业自管制名存实亡，因为劳动者以前在殖民制度下工资只有七百法郎，而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后，在新的农业自管制下仍然继续领取同样的工资。

就是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才爆发了6月19日的复兴运动。

有些心怀叵测的人想用传单来摧毁革命。他们的宣

传是要使人相信革命复兴运动产生的政权就要取消农业自管制了。我们已经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这种造谣污蔑的宣传,我们认为只要农业自管制确实有利,我们就决心加强这个制度。

所以,我们已经把农业自管制工作上的所有缺点控制住了,并且把所有诈骗行为揭露出来,因为,有必要指出,工人、农民和人民的儿女是那些以农业自管制的奠基人、指路人和执行人自居的人的谎言、笼络、煽动群众的恶意宣传的受害者。

我们已经肯定了这第一个事实真相,尽管那些不相信农业自管制、不承认农业自管制有任何意义的人在批评和反对。我们甚至看到在瑞士等地,“拿革命做交易的人”在为农业自管制的命运而悲伤。农业自管制曾经被利用为在国内组织一个新的政治力量,一个与11月1日革命毫无关系的力量的武器和借口。这就是当农业自管制面临深渊、岌岌可危的时候曾经为这个制度歌功颂德、赞美它的成功的那些人的真正目的。

我已经宣布过,这个部门的赤字达一千亿之多。这给独立后头几年的农业形成一个巨大的障碍,而造成赤字的原因就在于无政府主义、临事应付和哗众取宠的政策。

每一个干部、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审核这个赤字。有会计和各种明确的统计可以为证。

农业部门的不景气,引起了人民的巨大不安。

穷苦的小农完全失去了对国家的信任。在他们的心目中,国家已变成了剥削的工具。这就使得他们采取自

由散漫、怠惰的态度和放弃田园的办法，以免国家掠夺他们的劳动果实。更严重的是，他们开始把社会主义看作与它的使命背道而驰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把情况讲清楚，把所有应该纠正的缺点和弊病都摆出来。

我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分析、研究这种现象，以便实行农业自管制，避免空口许愿。

为此，我们于1966年10月才决定在农业自管制方面推行一种地方分权政策，让各生产单位走向内部广泛的自治。

当时我们曾经向农民宣布，他们有责任在新政策实施时争取积极的成果。去年6月11日，我已经能够得出各种结论，并且肯定了经过三年来努力推行一种明确而真诚的政策的结果，农业自管制执行状况是良好的。

此外，各种数字也有力地证明农业自管制的情况是健康的，因为第一次看到五百八十个农业单位的劳动者能够摘取他们劳动的果实，他们每人都获得将近一千个第纳尔的收入，相当于他们在全部利润中应得之数。

实际上，这些成果还是不够的，因为在一千八百个自管农场中，仅五百八十个农场获得了积极的成果。然而我们对于将来情况的改善抱有很大的希望。

实行这种新的明智的政策的结果，就是传统部门的小农首先恢复了自己的信心，其次就是恢复了对国家的信任，因为国家帮助他们，特别是给他们补助金。他们知道革命政权关心他们，在任何困难情况之下都会负责保护他们的利益，同时兼顾各种经济、历史和政治情况。这

不过是对曾经忍受战争和革命的全部负担的那些农民表示公正而已。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由于6月19日的复兴向这个被遗弃的阶层伸出了手。

住在山区的贫苦农民，以前被占有良田的殖民者所赶跑，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经常关心的对象。近三年来，社会主义革命给这个勤劳而无产的阶层的财政援助等于整个殖民统治时期他们所得到的援助的两倍多。

这一切都鼓励农民去取得新的设备，在管理和开垦土地方面采取防范措施，以便发展农村。

我们相信，在以后各年中，将会看到这些努力的结果。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走上了进步和发展的道路。

亲爱的兄弟们：

在工业方面，曾有两个部门：第一个叫做社会主义部门，事实上只包括原业主所放弃的各小企业；另一部门是由外国公司和外国资本控制的。

这种情况迫使我们进行了一项组织工作，将小单位并入国营企业，使这些小单位能够克服困难，享受政府的援助。

这个政策曾经受到批评，其借口是：设立国营公司是同社会主义制度抵触的，也就是说，在有些人看来所有由国家控制的部门，都是反社会主义的。

这样，无政府状态岂不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了吗？在苏联和中国，各种企业都在国家控制之下。

农业自管制在有些现代社会主义理论家看来是一条

错误的道路。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把南斯拉夫实行的农业自管体制说成是背离了马列主义。

在阿尔及利亚方面，尽管有种种批评，我们还是作了决定，创办国营公司，因为我们已经着手结束这一部门的无政府状态、浪费现象和不景气情况。

这个新的组织形式是第一步，以后还会有其他的步骤。为了农民和劳动者的最高利益，政府和党都动员起来了。

这些革命目标已经达到了，并且给革命带来了新的生气，以便继续跃进，直到我们在工农业方面能够完全自给自足、摆脱依赖为止。

举例说，最近地中海对岸发生混乱时，我们遇到了牛奶慌。正是在这方面，比如说，我们所应做的事就是要使我国在牛奶、干酪等等方面都能自给自足。

所以，我们应该推动畜牧业，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的国家正在利用各种条件来进行发展。我们有足够的原料。

因此，我们自己生产国内消费最需要的物品，这是很容易做得到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有靠我们去使我们的资源开花结果。

这个工作已经开始，我们已经按照现行国家发展计划，在全国各地区建立许多工厂。在执行发展计划方面，我们所用的方法如果不尽是阿尔及利亚的方法，但在全国努力和认真执行政策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逐渐转变为阿尔及利亚的方法。



对于外国资本，我的立场可以概括如下：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同外国剥削资本合作。除此以外，采取任何立场，都意味着贫穷和匮乏。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作了一个试验，其结果是失败，虽然外国资本带来便利和保证，但是它没有能够摆脱这两种弱点：恐惧和剥削。

这个试验证明，外国资本不可能下决心同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共同工作。它只能给我们带来贫困，就象它在拉丁美洲或在第三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这些国家依赖外国资本，仍然处在过去那样的贫困和不发达的境地。

所以，按照这个经验，我们把我们的政策建立在和愿意与我们合作的外国资本密切合作的基础上，就象我们同法国的关系那样。

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同外国资本合作，因为这样的一种合作只能对我们的基本抉择和我们的革命方针不利。

这些抉择绝不是某一个个人的政府所能独断独行的，而是属于明确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的人民所有。

所有这些论点，都使我们懂得只能依靠我们自己。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已经把所有力量和潜力都集中起来，为这个政策和为这个政策的贯彻执行而服务。

这样一来，外国资本就只能按照已经明确规定的，即不许扮演我国经济的掠夺者的角色的条件，在我国经济中起补充作用。

至于民族资本，我认为拥有财力的阿尔及利亚人，应

该担负起责任,因为私人储蓄应该投到生产企业方面去,而不是冻结起来或者用于开设咖啡馆、酒吧间。

民族资本应该在民族中发挥其作用,并为民族尽其义务,国家则准备在明确规定的范围内提供一切保证。如果让这些资金停留在非生产状态中,那就不符合国家的利益。

另一方面,趁这个机会,我们必须再提一下政府为消除地区差别建立全国经济平衡而采取的一些决定。

瓦格拉和博特纳会议时,曾经采取了对萨乌拉和奥雷斯两省有利的措施。今后将陆续决定采取对于大卡比利亚、提特里和赛义达等省适用的一些措施。

这些决定是出自一个将引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民族最高利益服务的长期政策。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经济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来看,财政状况可以使我们免于遭受任何外来压力。我们已经不再受以借款或提供资本为幌子的那种压力。

这就是曾经被有些人所不理解的我们严谨政策的深刻意义。这个政策的目标,过去和现在都是要解放我们的国家,使国家在财政方面免受外国的控制。

我们不仅在上述两个部门中不断作出努力,而且在教育和教学方面也同样作出努力。教育和教学以及其他方面一样有理由需要排除外国的控制。

如果我们继续依赖外国,特别是在技术方面,那么我们的独立就没有完成。我们应该承认,我们还没有摆脱这种控制,还有许多外国技术人员在一些教学部门中。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外汇负担。此外,对这些外

籍干部来说,要理解我国的实际情况、领会我国的政策和方针也是困难的。

政府应该找出解决这种危险现象的办法。它鼓励教育,给教育在国民义务中以优先权。

许多学校已经建立起来了,一些营房已经改为学院,以便使人民脱离愚昧无知的状态,因而也就是解放我们的经济,巩固我们的独立。一个有知识的民族,不能容忍饥饿。

我们花费所有这些力量,其目的就是要在各方面培养足够数量的民族干部。政府已经花了巨额款项来发展这个极其重要部门,为我国在这科学技术时代的前途而努力。

至于原圣战者问题,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经过长时间研究之后,已经定出最后解决办法。

对于那些脱离运动,不是选择在革命组织即党内积极工作的道路的人,我们无可抱怨。

为了在新阶段继续战斗的需要,党有责任挑选一些人员,首先要依靠参加战斗、深信革命政权所制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的积极分子,而撇开不参加战斗的人员,因为参加不参加的问题是首要的。

第一年,我们宁可灵活些。我们对自己应该坦率。再一次肯定,凡是愿意在党内跟我们一起走的人都应该参加,因为参加不参加会影响革命运动的团结,关系到革命能否达到它的最高目标;同时要绝对排除没有参加的人。

这个总政策,我们的各级组织和所有党支部已经多

次进行讨论，并就所有问题自由发表了意见。

我趁这机会再说一遍，我们应该不惜任何代价来达到今年的基本目标：吸收新党员、团结和树立党的权威。

以前所采用的党的组织方法和在遴选方面的政策上的弱点，只能削弱党的机器。

亲爱的兄弟们，没有人民群众参加，没有人民群众组织，就不可能进行革命，这是毋庸赘述的。如果说过去三年我们曾使建立国家机关和取得经济解放领先，这不等于说我们忽视了党，或者说我们想干革命而又不要革命组织。

完全相反，我们曾经宣告，1968年是“党年”。我不想停留在这一点上，我要强调的是，在符合现代社会要求和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的基础上组织党的迫切必要性。

以上就是党的总路线。但我要提醒一下，有些人曾经是积极分子，而现在就不那么积极了。我们对他们不加以责难，如果他们愿意改过来，我们就不能敌视他们。

另外还有一些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所贡献，但在改造阿尔及利亚社会的力量下，无论在体力上，还是在思想上，都跟不上前进的队伍，不能在新阶段继续进行战斗。

除了历来遗留下来的问题现在变成一些障碍和困难之外，党远不能起推动和保卫革命的作用，它已变成了对负责人大肆造谣、污蔑、攻击的广阔场所。这是同积极分子的品质不相容的。

我们要坦率而又客观地说，如果我们不把那些不能

参加我们队伍、同我们一起高举革命旗帜前进的人丢掉，我们就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我已经把培养各级组织所需要的和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的干部的情况谈了一下。但是最好把举着革命火炬的人和戴着面具即实际上破坏革命的人区别开来。革命需要坚定、忠实的积极分子，需要能够抵御敌人的保卫者。

1968年是党的年，我们对胜利是有信心的。所以，对于那些不相信革命、不相信革命目的的人，我们应该让他们去。

胜利属于革命运动，因为社会主义的阿尔及利亚是以其长期艰苦的斗争史见称的。

鉴于这些情况，阿尔及利亚如果没有一个能团结许多真正积极分子，反对国内外敌人的革命保卫者的革命运动，它就不能生存。

我可以肯定地对青年说，这次党的改组应该为全国有生力量，为千百万新生力量，为这个纯洁而又能举起革命旗帜并实现大跃进的一代，开辟一个广阔的前途。

革命政权要尽力设法为把解放阵线的青年组成一支队伍提供条件，使青年能够在党内外积极工作。

我们对愿意积极参加工作的人并不关门。

从1965年6月19日以来，对所有的人来说，门是敞开着的，不问他们的过去如何。

我们要求每个人的唯一标准就是要他在为民族利益服务中表现他的能力和诚意。

对所有接受我们的政策并为它的实施作出努力的

人,门总是敞开的。

其他人可以脱离党,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

这一阶段和这一使党生气蓬勃的新的力量,将促使全国组织和党大为发展。

今天,在庆祝6月19日复兴运动的同时,我们并没有忘记去年同一时期阿拉伯民族遭到的严重灾难。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说明一下我们对阿拉伯马格里布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从1965年6月19日起,在保证光明磊落、不干涉内政的情况下提出的。

我们决不干涉兄弟邻邦的事务,同时我们也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们自己的事务、侵犯我们的主权和我们领土的完整。

这是一个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的原则。

我们曾经多次说过,我们的政策不会朝后看,去挖掘过去的光荣,恰恰相反,我们的政策是坚决要朝前看,朝着现代世界迈进的。

所以,如果我们谈起阿拉伯马格里布过去,整个阿拉伯民族过去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过去历史是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衰落时期的一部分,这种衰落曾被殖民制度所利用。

向后倒退停止在马格里布历史的这一阶段,就有陷入矛盾不能自拔的危险,就是阻碍任何建设性工作的进行。

我们就是根据这样的分析来制订我们的政策的。这是以将来为重点的一种政策,其目的是要向前发展,在阿拉伯马格里布建设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走到底。

我们已经多次宣布过，我们不应该受过去历史的影响。我们是能够理解将来的人。

我们的制度完全和我们的国家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在经济组织和经济建设方面，在对外政策，对正义的解放事业的立场方面，我们走的是一条特殊的道路。我们已经宣布过，如果社会制度不同的大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那么，同一个民族的兄弟、儿子之间更应该和平共处。

阿拉伯马格里布民族，从他的现实、历史、语言和宗教方面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民族。

为了将来，我们准备在文化、贸易和其他方面实行有益的合作。

我们将不提出现有的争端，我们可能放弃这些争端，以便处理更重要的事情。

如果说我们在国际集团时代不能够建设阿拉伯马格里布，那么至少不要再以新的障碍来阻碍这个事业。

我个人深信，6月19日制订的这个政策，现在仍然不变。

我们今天重新肯定这个政策，为的是使事情更加清楚。

我们赞成有效的、不附带条件的合作，并且还准备研究这种合作的各个方面。

至于这些合作的国家的政治制度，我们已经坦率地宣布过，这是每个国家的人民的事情，我们不对任何人发号施令，要他选择哪一种制度。反过来说，我们永远不容许外来势力干涉我们的事务和设法在我国人民的基本抉择上施加压力。

这就是我们对阿拉伯马格里布的政策。

另一个牵涉到阿尔及利亚并且关系到全体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问题，就是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应进行全面研究。这是在阿拉伯民族意志消沉、内部四分五裂的时候，在一次反阿拉伯民族阴谋之后，阿拉伯人民被赶出家园的问题。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征服国以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为基础建立起来了。

这个问题，不论要经过多少时间，即使要几百年，也要找到一种解决办法，因为这是一个正义事业。这是一国人民被另一征服国人民驱逐出国土的问题。

解放巴勒斯坦和收复被夺去的土地的神圣斗争，不能与中东反殖民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斗争截然分开。

犹太复国主义的国际宣传机构企图使人相信他那种屠杀犹太人、把犹太人投到海里去的宣传。犹太复国主义的这种怪现象实际上不过是殖民主义所制造的军事基地，其目的在于阻碍阿拉伯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从而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

二十年来，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为提出巴勒斯坦问题所采取的方法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改变方法，不在新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我们就要重新陷入这些错误。

我们应该根据一种政策来进行工作和斗争。对于这种政策，我们大家都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不幸的是，阿拉伯各国领导人在这个事业上所表现



的团结只是表面的和纯粹形式的。这种团结，在某些情况下，不过是一种情感上的反应罢了。

在这一灾难事件前后和当时，我们都曾经宣布过有必要制订一条对以色列及其炮制者进行斗争的总路线。我们曾经说过，不可能一面同以色列作战，而同时又和帮助以色列并给予财政和武器援助以加强其力量的人合作。

我们在遭到挫折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们所有的武器都要用来保证不致战败。

我们还曾经指出，事情的性质已经大大超过局部范围，这已经是所有阿拉伯人的事情了，应该对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帝国主义基地，特别是对强大的石油公司，进行全面战争，因为这些大公司控制着世界这一部分的各个重要部门，因而它们比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更为危险。

难道我们应该把战场仅仅限制在广大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所为之斗争的事业难道仅仅是为了阿卡巴湾、苏伊士运河或者叙利亚山脉吗？

问题是否能够只局限于耶路撒冷之战呢？难道我们不应该在更大的范围中去看这场战斗吗？

事情的发展已经证实我们的分析和我们在必须继续斗争并扩大战斗范围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正确的，决不允许在打了败仗之后承认失败。这就是把这一次败仗变为敌人的最后胜利。

当时我们已经说过，敌人占领大马士革、安曼或开罗，关系不大。有些人就说我们的立场是轻率的。他们

认为阿尔及利亚人被对法国殖民主义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能理解东方阿拉伯战争的性质。

但是，时间已经证实了我们所宣布的，并不断肯定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的观点是以客观的革命的 analysis 为基础的。

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愿意看到我们的兄弟国家被占领。

你们都亲自看到了这种情况，并且都知道有些评论竟认为对以色列的战争不是在巴勒斯坦，而是在阿尔及利亚。

这些意见不过反映了我国人民各阶层因失败而激起的愤怒感情。

在范围广大的不幸事件面前，我们曾经说过，敌人能够占领大马士革、开罗、安曼，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投降，因为最后胜利一定属于阿拉伯人民，而且我们确实能够取得胜利。

在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对失败主义者，对灰心丧气的理论家们说，你们错了。美国并不是一个不可战胜的国家。全世界每天都知道美国被越南人民的英雄儿女打败了。何况以色列以其区区二百万人口来对付整个阿拉伯世界，又能怎样呢？开罗市就能够集合四百万居民。

你们当中有谁不记得在我们首都进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呢？有谁不记得法国为了这一场战斗，曾经动员八万精兵来对付卡斯巴、贝尔库尔和阿尔及尔渔场的居民呢？

尽管有占阿尔及尔人口半数以上的欧洲人加入了殖民军,但战斗仍然继续。是的,虽然敌人在物力和人力方面占优势,但是战斗仍然继续下去,而我们也为自己的解放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在这样的榜样面前,今天还有谁能够说服我们要承认失败呢?

我们不承认失败,我们永远不会承认失败。

我们相信阿拉伯团结的必要性,但要战斗上的团结,而不是失败上的团结。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政策,也就是我们所明白清楚地宣布过的政策。

我们曾经宣布过,在失败之后,不可能接受停火,但要继续战斗,把战斗扩大到战区以外去。

阿拉伯人民,总的说来是准备扩大斗争的,这个斗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真正的革命,这是阿拉伯民族复兴的可靠基础。

但是,承认失败和占领的既成事实,即使不是直接威胁阿拉伯民族的生存,也将直接威胁阿拉伯民族的兴旺。

这就是我们的客观分析。这种分析是根据一国人民的意志而作的。人民相信自己,相信他的力量和经验。

这种分析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尽管有人对它进行了种种批评。

在6月失败一年后的今天,情况丝毫没有变化。以色列占领一些阿拉伯领土,并进行移民以巩固那里的形势。耶路撒冷城正处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统治之下。以色列是有力量的,而且时间是对它有利的。

我们不反对和平解决的原则。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

下,并没有一种和平解决的办法或用战争解决的办法,只有一种体面而又公正的解决办法和一种屈辱而又被奴役的解决办法。

所以,6月战争后一年,形势仍然是老样子。

在表示我们的观点的同时,我们还要重申我们对于解放和正义事业的政策。这种政策只能用战斗和牺牲去制敌取胜。

我已经从我国人民的斗争和越南人民的斗争中给你们举出了一些具体例子。越南人民甚至在西贡心脏地区作战,迫使美军司令不得不承认无力摧毁这个革命。

这次正好有机会提请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们注意他们应尽的国民义务。他们应该留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斗争,不管有什么危险和困难。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最好留在那里,死在那里,不要逃到难民营去。

所以,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们应该放弃至今还遵循的方便的政策,不要重蹈以色列人的后裔的覆辙:以色列的后裔们曾经对摩西说:“跟你的上帝一道去战斗吧!我们宁愿留在这里。”

巴勒斯坦人民等待了二十年,希望阿拉伯的军队替他去打以色列,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一场灾难。

当然,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负有义务;但是,巴勒斯坦人也要尽他们的民族义务,彻底抛弃脑子里的一切移民思想,去解放祖国。

至于革命的阿尔及利亚,它坚决执行自己的革命路线。事实证明,自从失败至今,它在这方面是尽了自己的责任的。在反对外国利益的问题上,它也采取了一些措

施。

我们认为阿拉伯人的义务就是要用自己所有的武器去打个胜仗。他们应该在现实而积极的政策范围内使用这些武器,以恢复自己的尊严;但是,为此,阿拉伯人应该知道恢复这种尊严所需要的代价。

除了巴勒斯坦的问题以外,我想提一下另一个和阿尔及利亚有密切关系的问题。这就是和法国的关系问题。

我今天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关于阿尔及利亚与法国合作的演变和因对方单方面作出决定和采取措施所造成的误解产生的结果等问题,近来有些议论。

因此,现在有必要就我们两国合作的情况探讨一下。应该指出,在这方面,阿尔及利亚的明智的政策已经克服了一百三十年的占领和七年半战争期间所造成的环境和仇恨。

大多数中立的观察家都认为,在我们独立以后,两国人民之间可以实行合作。

然而,阿尔及利亚选择了宽容和谅解的道路,拭干眼泪,伸手谋求合作,尽管还有法国军事基地存在——这个存在,幸得上帝保佑,我们今天已经把它清除掉了。尽管原子试验还在我们国土上进行,尽管我们有权采取坚定的立场,我们还是采取了灵活的办法,我们的军队与法国武装力量之间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的事情:战争,解放战争,这一切过去的事情都加以区别对待。

对法国武装力量,我国人民没有采取任何复仇行为,尽管没有一个家庭不曾受过这个军队的迫害。虽然有这

些问题，阿尔及利亚政府和人民曾经向全世界和法国政府说明，他们曾经为伟大的理想而战，这种理想胜于其他一切因素。

这就是我们已经遵循而且继续遵循的道路。大多数问题都已经有了解决办法。财政纠纷已经处理，其他问题还维持原状。

谁都知道，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有些利益；同样的，阿尔及利亚在法国也有些利益。

不过法国的巨大利益或许必须计算一下，而这是难以计数的。这是我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实，但它已经过去了，让仇恨也都成为过去吧。法国人民受过纳粹占领下的痛苦，但没有象阿尔及利亚人民受殖民化的痛苦那么大。法国人民能够与德国人民真正接近起来，也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有重要的利益，比如能源，法国所消耗的能源大部分来自阿尔及利亚。这些利益给享有者带来了巨额利润。

同样的，我们在法国也有些利益。有大批阿尔及利亚劳动者在法国，暂且不谈经过殖民时期以后的阿尔及利亚形势所要求的技术和文化合作。

阿尔及利亚认为，合作是一个不可分解的整体。

我们两国各在对方都有利益。阿尔及利亚尊重法国的利益，同样法国也要尊重我们的利益。

最近几年来，正当我们致力于组织我们的经济和财政，创办我们的民族工业，开办学校以教育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正当我们忙于考虑补助残废军人和战争留下的寡

妇孤儿，以及至今还不断发生的矿场事故受害者的时候，法国颁布了一道法令，禁止输入阿尔及利亚的酒。

最近我有机会说过，我们十四亿公升的酒是怎样由于法国在葡萄酒工人示威后作出决定而积压在我们的地窖里。

禁止阿尔及利亚酒输入法国，意味着同意给法国农民的利益由阿尔及利亚的农民来承担。这个禁令也可以解释为七百亿资金的冻结，而不顾已签订的各项协定。

我们有权提出这些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措施，是不是会严重损害阿尔及利亚的经济？

——在法国市场上禁止阿尔及利亚酒，是否为阿法合作事业服务？

财政上的损害肯定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而法国的决定可能在我国国民经济方面也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后果，如果我们没有采取必要的严厉措施的话。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这是关系到阿法两国所签订的协定的问题，因为酒是殖民化的一个后遗症。

对我们来说，合作意味着尊重相互的利益。合作不应该按照我们两国之间任何一国的某些集团的脾气行事。由于一些法国农民的不满而让阿尔及利亚农民付出代价，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不能接受类似的情况，因为我们的农民也要自己的劳动果实。

此外，我们的国家是年轻的，不象法兰西国家那样有办法。所以，关于酒的问题，在我们两国所签订的协定上关于尊重义务方面已有明文规定。

亲爱的兄弟们，这就是同我们特别有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我说明这一问题的情况，绝不是为了逃避责任。

这是尊重不尊重阿法两国合作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的最高利益的问题，我们不能不闻不问。

我们已经解放了这块土地，而当初看来好象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也已经能够填补给我们国家造成的真空，尽管“秘密军队组织”为了摧毁我们国家作了许多尝试。我们也已能够为我国经济奠定基础，尽管法籍干部跑掉了。所以，在这方面和在其他各方面一样，我们应该获得成功。

我们所要求的合作应该建立在明确规定的原则的基础上，这就是尊重两国的最高利益。

另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最近限制阿尔及利亚人到法国去的人数的决定的问题。这个决定是在谈判这一问题的时候作出的。法国有权拒绝阿尔及利亚劳动者入境，正如阿尔及利亚有权把一些公司收归国有一样。

但是，劳工问题是1964年签订的协定的内容，我们曾经要求修改，而当时谈判也在进行中。因此，对于法国政府关于限制阿尔及利亚劳工入境的决定，我们感到惊奇。

这一切要求我们作出一个明白清楚的结论，这就是要实行和6月19日运动所实施的具有革命性的调整相类似的革命性的调整。

三年来，我们已经不使用“援助”这个词了，为什么？因为事实已经证明，我们的前人知道一个国家给另一个



国家的援助没有不带交换条件的，除非这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牵着鼻子走。

因此，我们拒绝了所有国家的援助。

我们把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叫做阿法合作。这种合作是以两国互利为基础的。

各种数字证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石油公司所得巨额利润高达几千亿。

因此，我们应该说，现在合作并没有进展，因为这种合作不在互利的范围之内。

在这里，我们重申，我们决定拒绝一切旨在剥削我们的合作，不管是和法国合作，还是和我们东方国家的朋友或其他国家合作。事实上，在迎接我国独立六周年这个节日的时候，你们可以为你们的国家不欠任何国家一分钱而骄傲。你们还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那些持相反意见的人说，“如果你们有诚意的话，就请拿出证据来”。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退缩，因为我们是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要和人类一起努力前进。总之，我们不相信施舍的价值。

阿法合作应该继续为两国的最高利益服务。至于我们，我们准备在这个基础上，而且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走合作的道路，以便忠于我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达到建立社会正义的目的。

上面所说的话是三年来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概况。

这里无需再提阿尔及利亚对非洲、拉丁美洲、亚洲解放运动的立场，特别是对越南人民事业的立场。这一事业的正义性对我们来说是无庸置疑的。制造越南问题

的美国人，是干涉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他们必须回到本国去，把越南还给越南人。

我想简短地提一下我们今年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包括党和省的改组，大的剥削性产业的清算，以及农业自管制的实行和在农业方面适用于农业自管制的条文的充实。

还有教育改革这一重要部门。为此，我们要对各级教育进行一次真正的革命，使教育能够符合我们的个性和我们社会的要求。

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对国家机关，尤其是对经济事业的管理，实行建立国民服务制度的决定。这种服务制度将对我国革命产生巨大影响，因为这是第一次涉及动员我国青年这个潜力来实现国家在社会、经济和国防方面的目标。

这是第一次，农民、工人、学生和教学人员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

这种试验，第一年可能只有一部分青年，但是以后各年将容纳几十万青年以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动员起来建设国家、加强我国的革命。

如果1962年以前那几代人曾经用鲜血换取我国的独立，那么现在和将来各代人就要出力流汗，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1969年全国常设性组织打好基础之前，我们将把全部注意力和所有精力集中在这个广泛的计划上。这将是达到革命的目的而进行的解放战争第一阶段的胜利。

这也将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是我国人民、我们民族、我国革命的前景的开始。

要达到这些目的，就要靠所有阿尔及利亚人的努力。

我们深信，每个公民都会作出有效的努力，以达到这些目的。到了那时，在我国人民面前将涌现出一幅兴旺的前景。

那时将是我国革命的胜利，劳动群众革命的胜利，1954年11月1日革命的胜利。

光荣属于我国的革命。

前进！

译自《非洲革命》第279、280期，

1968年6月24—30日、7月1—7日

## 在全国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9年10月30日，在阿尔及利亚革命十五周年纪念日前夕，阿尔及利亚全国干部会议召开。布迈丁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和今后的行动方针。现将有关立法、政权建设、建立军队以及外交、教育、文化等部分译出如下。

现在我们来看看国家政权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们认为在这方面，已有几个阶段都是在新的、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完成了。而且是按照民主和权力下放的原则进行的，这些原则业已成为真正的无可辩驳的现实。按照民主的标准，全国选出了将近七百个人民市镇议会，他们享有最广泛的职能和权力。

今年，人民还选出了十五个军区议会，它们的广泛职能是众所周知的。一经付诸实行，这些职能将对我国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立法方面，我们为制订一套符合我们的传统和意愿的法律，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些法律同1962年12月31日当权者所作出的决定截然不同，当时的法律除了有关国家主权的条款外，是彻头彻尾的、纯粹法国法律的翻版。

这个决定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因为它本身包含着对我们革命的幼苗扼杀。

因为，过去的法律都是受殖民主义哲学的影响的，而一个负责的、明智的政府首先应当关心制订出能够捍卫我们革命所必须的法律条文。

如果说在立法方面我们还没有完成我们所承担的明确任务，但是靠着彻底的改革以及我们社会中所发生的明显变化，我们已经在道路上走过了一个重要的阶段，我们在很大范围内已经把自己从一部老式的法典中解放了出来。

例如已经通过的有关公职人员和干部的条例，国家和人民为了制订这个条例花了不少心血。

现在我们为了创建一个既符合我们的意愿，又符合民主和权力下放的原则的新机构，改革中央行政机关的工作尚待解决。

从明年起，我们就要开始这项工作了。这项工作是盖新建筑物的屋顶，因为它的底层——市镇和当中一层——军区已经建成。

单就彻底改革中央行政机构这一事实来看，就足以说明政权建设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但并不能因此说国家就是行政机关的总和。实际上，机关是国家的重要支柱。国家组织还要依靠其他的一些机构来充实，如警察部队就要把保卫个人的安全和财产担负起来。正是由于这支纯粹由阿尔及利亚人所组成的警察部队的警惕性，我们才得以实现前面已提到的许多目标。

政权建设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需要同时建立一支

军队。这项工作也正在按照我们的预见在进行。这支由农民和工人，就是说由穷苦大众所组成的军队，正在日益改变为一支用最先进的技术装备起来的、拥有几十名、甚至几百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现代化军队。尽管这项工作是在默默无闻、不加渲染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我们仍然感到满意，因为这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完成的工作。

由于我们军队干部的意志和忘我精神，我们的军队才得以完成自身的改造，这是一项最困难、最细致，也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进行的改造工作。这支部队目前已进入最后的建设阶段，它在从事自身建设的同时，每天还要在经济建设战线上和工人、农民以及农村群众并肩战斗。

今年，我们的军队还达到了革命所规定的目标，即我们在最近几次会议上都谈到过的实行国民服务制的问题。

如今这已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了，尤其是因为在今年年底之前，将近两万名阿尔及利亚青年要应征入伍。你们也知道，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完成征召、组织和教育两万名青年的工作，没有一支革命的战斗的军队是无法很好地完成的。

与这许多青年应征的同时，并在实施国民服务制的基础上，我们决定自明年11月4日起征集所有的大学毕业生入伍。这是第一次采取具有这样重要意义的决定，我深信这一决定的实施对我国青年的未来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就政权建设来讲，不仅涉及内政而且还包括外交。

据此我在不久前的一次讲话中规定了我国对外政策的路线。我的言论措词在我们大使兄弟们看来似乎显得强硬一点，那也只是由于我讲话坦率的习惯，而且这也是为了国家的总利益。

我们之所以对我们的大使兄弟们强调了将国外活动同国内方面的活动联系起来的必要性，无非是要说明我们的行动必须遵循同一条路线。而且他们同国家干部的往来接触以及同各部官员、省长、区长、军官、负责人、积极分子和退伍军人的联系接触只能是加强这一行动。在对国内活动方面进行了革命之后，应当对我们的国外活动也进行一次真正的革命，在国内，我们组织了军区并着手建立它们各自的议会，在不久的将来还要建立它们的执行委员会。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对省长和区长声明，他们在这类机构中的调动是必要的。他们将调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调到其他军区去或担任其他领导工作。

对于经济部门也是一样，对各企业负责人的工作进行批评总结也是时候了。我们曾对他们寄予信任、委以责任，但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监督办法确实是不够的。在这方面，我们将严格地从客观实际出发，并根据已有的工作成绩来采取措施。

由此，正如对待外交使节那样，我们将对经济各部门负责人的工作作出正确的评价。

假如工作已经积极地完成了，那么有关人员将要担任更负责任的工作。

相反，如果工作完成得很坏，那么，他就要受到撤职

处分。

更重要的是，干部必需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是绝对的忠诚，同时具有能力，第二是关心国家公务。因为没有能力只有忠诚是无济于事的。反之亦然。

这就是我们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这种政策是以自力更生的原则为基础的。

同样，在和外国进行合作时，这种合作要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真正的、持久的合作。

为此，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人民习惯于依赖他人，或者希图侥幸。

关于教育问题，我要重复我在前几次集会上讲过的话，即我们的政策一如既往，把学校教育象培养干部工作一样，也放在首要地位。

解决这些问题始终是国家最关心的，它不遗余力地在想办法。大家也知道今年已有将近两百万儿童入学，六千间新教室已经建成或即将建成。

由于这种努力，在独立时出生的大部分孩子才能够进入阿尔及利亚学校、革命的学校学习。

同样，由于军区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五十所左右中等学校已经建成或即将建成。

关于这一点，我还举例证明提济乌祖军区的一所能容纳一千五百名学生的中等学校确实仅用一年的时间建成，而从前象这样规模的一所中学大概需要四年方能建成。

以上这些根本性的变化促使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外，瓦赫兰大学已经落成，君士坦丁大学正在建造中，后者将能容纳约一万名来自阿尔及利亚东部的大学生。

还有阿尔及尔大学，你们也不会把它忘掉的。现在我们正在扩建已经显得狭小的校园，而且我们还要增设医学院、理学院以及工学院。

同时我们还把六十万套铺盖分发给穷苦学生。为了使教育有真正民主化的内容，我们在中学和大学里设立了十万个名额的助学金。在全国范围内所作出的这些努力，其目的就是要培养明天的阿尔及利亚人。我们在教学和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除了这个目的别无其他。

至于在教育改革方面，仅仅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正式设立专门的全国委员会；但是规定它的工作任务的条文现已准备就绪。

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在悉心致力于社会方面的问题。近年来我们不得不正视有关原圣战者、寡妇、孤儿和解放战争的残废者等等问题。在原圣战者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我已提到这些现在正在解决中的问题，依我们的看法，这些问题现在已不象先前那样，具有优先地位了。

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我们还有要达到的目标之一，就是新闻报道工作。

在不久的将来，电视网将遍及我国整个北方地区。同阿尔及尔的电视观众一样，拉卡尔、加扎乌埃特、梅谢里亚和杰勒法的电视观众都将能够收到从阿尔及尔播送的电视节目。

在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中，我们不要忘记指出：一方面是要复兴我们的民族遗产，另一方面要使人民革命继续下去。在此，我特地以你们全体的名义向所有文化人、作家、音乐家、作曲家、雕塑家、画家、演员等发出紧急呼吁，即从现在起他们要投入到为复兴我们的历史的战斗中去，特别是投入到一切有助于复兴和巩固我们的个性，有助于继续我们光荣的事业，即有千百万烈士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的战斗中去。

关于财政方面，我也要说几句。由于革命政权的努力，我国的财政情况不仅正常而且正在不断得到改善；另外，也由于新建的生产单位和尽管是执行得很不够的节约政策，我们巩固了财政并对内政和对外关系上都起了促进作用。

财政情况的改善曾使我们能够通过进口国家需要的各种设备来推行一项大规模发展的政策。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援引几个数字并请记住，今年的工作运行预算和购买设备预算不下于一万亿第纳尔，在我看来这是很重要的，并且促使这一重要部门前进一大步。

这些数字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对财政问题已无需多作说明了。

同样，在这个领域里目前最紧要的是，建立严格的监督。所以我们要求所有与财政有关的人员注意保护国库和人民的收入。为此我们建立了一套监督制度，目前这种制度可能还是脆弱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逐步巩固起来。

此外，我也非常详细地谈到过我们曾为之作出过巨大努力的工业部门。今天，我很乐于简单地追述一下，近年来，尤其是1968和1969两年，由于我们在这个领域里所采取的决定，我们奠定了完整的工业基础。截至明年6月19日革命复兴纪念日之前，这项奠基工作将全部完成，并且除开少数例外，各项计划都将得到实现。

我国从此奠定了牢固的工业化基础，尽管初期我们遇到各种困难，尽管我们的内外政策遭到各种批评。

有人对于国内计划方面曾经含沙射影地说某些工业，例如冶金工业的建立是不必要的。同样也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花费巨额资金去建造年产量在初期将达到四十万吨钢的哈贾尔联合企业。我们到底要拿这么多与我们的需要不相称的金属派什么用场呢？在此我姑且不谈我们从国外听到的另一些特殊论据。

然而，单是对我们的需要所作的初步研究就向我们表明，全国消耗的生铁远比四十万吨为多。因此我们就决定再建造一座钢的年产量在一百二十万吨以上的联合企业。我们是对这项政策负责的，而且未来也会对此作出判断。此外我们也毫不怀疑，这种判断必定是有益于进步和解放的。

今年我们第一次生产了生铁，其出口量在年底将达到十九万吨，到明年年底其出口量将增至四十万吨。这将有助于巩固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工业基础。

与此同时，生产动力机器至关重要，而且那也正是我们目前所专心致力从事的工作。

你们每人都将能在自己访问全国那些工厂区或工程

区——巴特纳、安纳巴、斯基克达、提济乌祖、阿尔奏或莫斯塔加内姆——的旅行中，亲自证实那里到处出现的热火朝天的建设活动和我国工业化建设的发展速度。

目前建设材料的匮乏清楚地显示着为巩固这个工业基础而在全国范围所展开的巨大力量。

我们曾经说过，整个阿尔及利亚要变为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以加速我们的工业化。由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措施，清除外国人在我国的各种利益，并且我们把那些依赖外国的部门从外国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以上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有利于我国工业化大踏步地向前发展。因此，我们这个行动还要靠其他的一些措施的配合。例如，结束外国人的企业。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社会主义基础上从事经济建设。一切要害部门今天都控制在国家和劳动人民手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外国人在我国就无法投资了。

我想，经过多年的斗争，外国资本最后也会明白，今天的阿尔及利亚是不允许再剥削了，因而它只有在阿尔及利亚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赚钱。

至于国内的私人资本，我认为它正在开始按照有利可图的计划进行投资。我们对它唯一的要求就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同国家政策协调起来，不要试图阻挠国家计划的实施。

关于石油天然气，我曾经指出，我们的石油产量每年增产百分之九到十。

在矿业部门，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正在全国普遍进行勘察矿产分布情况，目前我们在许多地区已经开展了这

项工作。

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即能源问题。现在让我来谈谈为了使人民都能从国家资源中，特别是从能源中受益，我们需要做出的努力，因为，要让所有阿尔及利亚的城市和农村在不久的将来能用到国家生产出来的一部分天然气——现在它的生产成本已经降到每一个人都能负担得起了，这样做不仅公平合理，而且也必须如此。天然气输送到寓所并能使用它，这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

关于全国电气化的问题，对六百个农村输电的一项计划正在拟订中。

近来还有另一个争论激烈的问题，即有关农业的问题，特别是有关农产品商业化和实行农业改革的问题。

实际上，由于实行了企业自管制度之后，农业自管问题已经不是那么尖锐了，因为农业机构的调整正在解决中，因此，目前农业遇到的巨大困难是在国内或在国外商业周转上的组织问题。显然，商业周转非常有利于推动和提高生产。

农业土改部在国内非常重视组织消费问题，在国外也很重视开辟新市场提高出口额。这个部还致力于培训农业干部，利用南方和北方新开垦的土地，建筑新堤坝，并且还在老的农业区里对需要国家的技术、财政帮助的小农给予援助。

同样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去年我已经提出来了：实行土改。的确，现在我们尚未过问，这就为某些人提供了批评我们的口实，可是他们忘记了在阿尔及利亚现在有三

百万公顷自管农场和五百个农业合作社。这已经在农业领域里构成了一次真正的革命。我们并不隐瞒，在阿尔及利亚还存在着一些迫切需要缩小的大面积私人土地。此外，我们认为土地革命首先是改造我们的农村，土改的目的绝不在于侵占一亩地，而是在于运用一切方法保证阿尔及利亚所有地区能过更美好的生活。

在最近一次讨论各军区根据各区具体情况制订出来的土改纲领的会议上，我们通过了提特里军区二十万公顷土地整治的决定。甚至在颁布土改法令之前就要实行这个纲领，而它的计划将在我已提到过的有关兴建新的试点村庄、公路和合作社的原则基础上实行。这些既是通过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来彻底改变阿尔及利亚农村面貌的措施，同时也是加强国民生产的措施，而只有这样才能使“农业”在国家的发展中起到确有成效的作用。

本着上述原则和政策，我们建立了一大批合作社，目的是把过去深受大地主压迫的劳动者组织起来。在革命政权的帮助下，他们今后能为自己的利益而从事生产。这项工作已经付诸实施了。

因此，现在剩下的就是把土改法令付诸实施。法令文本已准备就绪，现在只等农村的耕播工作结束，我们就要对此进行讨论。你们知道，我们实在忙得连时间也没有了。

此外，自10月20日以来，我已经发表过四次讲话了，这对一个领导人来说是很多的了。

我们的计划所包括的任务是很多的，所以我才在驻外使节会议、最高司法委员会会议和原圣战者代表大会

等等会议上谈到计划，今天又借国家干部会议召开的机  
会再和你们谈计划。

重要的部门谈完了，现在我们来谈谈贸易，只谈对外  
贸易。在这方面有两个重要任务需要完成：第一个是控  
制外贸，第二个是通过在世界各国开辟新市场来增加对  
外贸易额。在控制方面，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国家已回  
收了巨额资金。

在这方面来讲，去年在国家贸易局登记的出口收入  
达三百亿第纳尔。

如果我们加倍努力，收入将可达到五百亿第纳尔，从  
而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经济。

在国内贸易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国内市场迄今还  
没有组织起来。我们必须对国内价格进行控制，在商业  
利用批发来和那些不断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并造成价格  
不断上涨的投机倒把分子进行斗争。

亲爱的同胞们，这些就是依靠大家的努力所取得的  
成果。

以上就是今昔的对比。

假如我们试图确定我们未来的目标，那么我们必须  
再一次强调改组党的必要性，充分发挥它的领导作用。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目标上。我们也要继续建  
立国家体制的工作。在我已经提出的那些倡议中最紧要  
的一项，就是设立改组中央行政机关的全国委员会。

其他需要我们在1970年至1973年期间完成的任务  
就是实行四年发展计划。

我有意避免谈这一问题，因为我认为再过几个月，等

到全国性会议召开后再来审查比较好，目前我们所能说的就是，这个计划的实施必然会加强我国在各个领域中的独立性，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到各个方面的计划，再说要完成这个计划，也需要二万五千亿至三万亿第纳尔的预算。

毫无疑问，象这样大规模的投资对第三世界另一个国家来说那是办不到的。但是对于革命的阿尔及利亚，对惯于创造奇迹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来说，这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

关键在于我们动员起来，消灭不必要的开支、增加国民生产，换句话说，只要我们遵守我在其他场合已提到过的严格的节约政策就行了。

我们的重大目标之一是继续执行地区平衡政策。迄今为止已有四个具有不同针对性的发展规划被提出来，并各有各的预算。这四项规划是关于绿洲、奥雷斯、提济乌祖和提特里军区的。我们已经决定——为明年并在国家形势许可的范围内——再制订两项类似的有关另外两个军区的规划。

我们打算继续合理地执行这项已有成效的地区平衡政策。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提济乌祖军区，该区首长最近向我们保证说，该省具有特色的规划执行后已将地方上所有的劳动力都动员起来了，没有一个失业者。

地区平衡政策将继续执行到底，因为它是全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在我们的目标之中，我们不要忘记指出继续实行国民服务制。它将逐步变成教育和培养我国青年的基本手



段之一，它将使青年有效地投身到我国所面临的斗争中去。

至于教学改革和阿拉伯化问题，我在谈经济和社会问题时已经提到过了。

教学改革同样是必要的。我们每个人都应努力学习我们的祖国语言阿拉伯语，它将保证官员的晋级。对于那些自称学习阿拉伯语条件不够的人，我要告诉他们，目前某些人在学习外语，却忽视了花费必要的时间去学习阿拉伯语。照我的看法，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在从事外语学习之前，先学习本国语言是更合情合理的。

如今事情仅仅归结为一个遵守约定的问题，因为革命委员会和政府已经决定，从1971年底起，求职者必须懂得阿拉伯语。

目前，我们已经到了土地革命的阶段，在无数场合，它曾是我们讨论的对象。

今天我将乐意再重申一遍，这场革命的实现是我们试图展开的工作之一。

关于工人的组织工作，我们将要求颁布一部新法典，它将在所有经济和贸易企业中规定他们的工作任务，以便工人有权监督雇用他们的企业的管理工作。这部法典不是在往后几个月内颁布，至少要在明年年内颁布。它将通过组织特别是生产单位一级的工人委员会，以明确的方式来解决有关工人的问题，这种工人委员会将使我们能够从过时的组织，如行政管理委员会中解放出来，因为行政管理委员会同我们当前的革命已经不相适应了。

现在只要一想到财政问题，我们仍要抓住节约政策

作为主题来说明这一政策必须继续执行下去的理由。

此外,往后几个月我们将采取适当的措施,使节约成为大家都得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只要我们还没有彻底改变那成为无数同胞命运的悲惨状况,我们就不能考虑进一步改善那些生活条件较优越的人的处境。

我们首先应当关心的是改善那些在忍受不幸、贫苦和穷困的人的命运,因为既然阿尔及利亚是属于所有的阿尔及利亚人的,那么每个公民都应该能在阿尔及利亚享受到自由和独立,并享受由革命进行的改革所带来的果实。

载于革命政权纲领中的另一个目标是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培养足够的干部。

关于这一课题,我刚才在谈到发展教育事业、兴建新的中学、学院和大学的问题时已经讲过了。

使每一个公民都有工作做,是另一个需要作出巨大努力的目标,但这并不是超出我们能力范围之外的事,因为革命和来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如果对失业问题都认为是无能为力的话,那革命和社会主义政策还有什么用处呢?

亲爱的兄弟们,这就是我借你们会议的机会想扼要地向你们介绍的基本目标。

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说,1970年将是在各个方面、各级水平上都有创造性活动的丰收年,而且近年来我们所作出的努力已经开始带来成果了。

另外,1970年将继续实施民主化和权力下放的原则。

同样在 1970 年，在改组中央各机关中，我们将开始那最终将完成国家政权建筑物的最后一段工程。这是最后一段建筑的完工，也将是另一个新工程阶段的开始。

.....

译自《非洲革命》第 298 期，1969 年 11 月 8 日

## 在视察阿尔及利亚各地时的讲话

1970年，布迈丁到各地视察。7月中旬，视察东部地区，在斯基克达发表的讲话中，着重谈石油政策问题；在君士坦丁汽车拖拉机总厂工地的讲话中，强调利用自己的资源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在巴里卡向第一批参加“国民服务制”的青年发表的讲话中，号召青年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祖国，消灭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平等现象等。10月中旬，他在视察塞蒂夫时，着重谈土地革命和国家建设问题。现将有关部分节译如下。

### 在斯基克达的讲话

.....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在斯基克达谈石油问题，这是由于若干时间以来，我国和法国的报纸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论战，是由于我国的石油组织和外国石油公司发生了争执。

我们十分坦率地说，其中某些争执，实际上是这些外国公司——法国的或其它国家的公司——拒不让步而引起的。

至于除了法国公司以外的其它外国公司，当我们与他们之间一出现分歧时，我们就作出了国有化的决定，我们已宣布石油同阿尔及利亚蕴藏的其它资源一样，为阿尔及利亚所有。过去我们已断然宣布过这一决定，今天予以重申。

至于谈到法国公司，我们也要十分坦率地说，这些公司还没有理会阿尔及利亚已发生了一次革命，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革命确定了一些它所应该达到的目标。法国公司也没有理会我们不再是处在1830年，而是在1970年，阿尔及利亚正在全面发展。你们知道，1970年的形势与1962年甚至与1965年的形势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今天我们要求属于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土地，也正是外国曾在我国所占有的土地，现在已经归还给阿尔及利亚农民。

正如昨天操在外国公司手中的矿山今天已回到它的合法的所有者手中一样，属于外国资本的银行今天也已经国有化。正因为经济是为总利益服务的，因此，石油和天然气同样也应该首先而且优先地为阿尔及利亚及其居民服务。

某些集团没有能够懂得，今天的阿尔及利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们仍然坚持认为，在石油方面谈不上什么阿尔及利亚的完全主权，而是一种共同主权。我们对他们说：“不！”石油是属于我们的，天然气也是属于我们的，因为石油和天然气完全是在阿尔及利亚。不久前我们已经斥责过那些妄图把撒哈拉和特勒地区分开的殖民主义支持者。阿尔及利亚人已经团结得象一个人似地站起来

了，大声疾呼撒哈拉是我们财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尔及利亚人已经准备为他们的自由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如果我们对阿尔及利亚的石油作一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在它的成份中有我们先烈的血液，因为取得这笔财富，我们是付出了鲜血的。此外，外国资本为了开采石油所进行的那部分投资已经得到很宽大的偿还和酬报。

因此，石油应该为我国服务。

石油应该列入阿尔及利亚的经济，阿尔及利亚石油公司应该首先加以开发利用。

这样做是否意味着我们蔑视外国的利益呢？完全不是。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尊重那些不敌视我国基本利益、不损害我国革命的国家。

无论是现在或是将来，我们都尊重一切不妨碍我国人民经济和文化建设发展的国家的利益。

我们之所以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第一次谈到阿法合作，这是因为我们要十分明确、对等地确定这种合作的含义，使之为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两国和两国人民利益服务。

根据我们的长期经验，我们宣布：尽管我们正在进行一场艰巨的战斗，尽管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存在，但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与新殖民主义的特殊利益之间毕竟还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因此，合作应该为两国人民的利益服务。一切不属于这个范围和一切不符合这个原则的“合作”，革命政府决不能、永远不能接受。

我们已经缔结过一些协定，我们还准备在今天或明天在确保我国利益的基础上，在我们保证一切愿与我国合作的国家都能够接受的利益的基础上，缔结为期数年

的新协定。

从我们拿起武器的那一天起，我们就下定决心，为了不把我国的独立作抵押，绝不附庸于外国。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对合作都是加以肯定的，我们对于在阿尔及利亚人民和法国人民互利的基础上，在各方面扩大这种合作也是加以肯定的。但我们反对剥削。我国的一切资源必须首先而且优先地为我们的经济建设服务，为我们的孩子、工农的孩子建设大学和中小学服务，为消灭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棚户区服务。

这就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政策。如果这项政策不可能实现，如果我们对自已宣布的政策没有信心，今天我们是不会谈合作问题的。总而言之，我们重申：我们愿意与一切尊重我国政策、愿意在各方面同我们进行合作的国家合作。

所有的人都应该懂得，我国正在实现一次革命，我们正在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另外，他们应该知道，在我们尊重他们权益的时候，他们也得承认我们对自已的全部资源享有完全的主权。

我们的权利是不容置疑的，因为这些资源是属于阿尔及利亚的。

亲爱的同胞们！这就是关于这个特殊问题的一些解释。阿尔及利亚人民和政府准备与其它国家和人民进行合作，准备向一切真诚的伙伴，特别是向法国人民伸出手来。

阿尔及利亚人民已经表明，他们在政治上是成熟的，尽管过去出现过一些严重的问题，他们决不会耿耿于怀，

总而言之，他们是为崇高而神圣的事业，即他们国家的独立而斗争的人民。

他们今天正是以同样的热忱保卫着他们的利益，并朝着他们的未来前进。

……

取得成功的条件现在已经具备，而我们的革命和我国人民以往仅在几年内所实现的一切，在其它国家恐怕是用上几十年时间也难以实现。

既然取得成功的条件已经齐备，革命的道路已经明确，现在要我们做的就是实现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必然会导致另一场革命，即土地革命。此外我们还必须进行文化革命，培养能担负起责任的新一代。

……

译自《非洲革命》第 335 期，1970 年 7 月 24—30 日

## 在君士坦丁汽车拖拉机总厂工地上的讲话

……某些欧洲国家，就其人口、面积和资源而言，如果不是少于我国，也与我国差不多，可是它们现在却被认为是高度发展的工业化国家。为什么我们国家就不能够实现工业化和发展工业呢？谁能说我们不同于他们，是否他们比我们更聪明、更积极呢？显然不是，这些国家有时也是在困难条件下得到发展的。其中许多国家甚至用损害我们——曾经为这些国家的繁荣付出了代价的、贫穷的第三世界的人民——的手段而发展起来的。只要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原料曾被它们有计划地开发、用低价



夺走而以制成品的形式高价卖给我们，也就够了。这是事实，这恰恰就是我们和他们不同之处。因此，革命政权决心走工业化的道路。

.....

我国已决定实现工业化，并且朝着这个方向走过了几个重要阶段。由于今天向我们的干部提供了一些新的机会，因此，我们的干部日益有所提高，在能力方面有所进步。你们不会一点也不知道，如果我们在国内不能保证把他们培养起来，那我们就要毫不犹豫地把他们派往国外，把他们培养成为技师和工程师。

这就是革命政权所取得的成绩，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我们还申明过，我们的资源必须在我国加以利用，以便能够涌现出一批可以录用大量阿尔及利亚人、使我国人民首先得益的工业单位。

决定在我国制造汽车的同时，我们已经证明：我国的进步已达到了一定水平。

虽然我们已决定，在外国援助和国外技术的帮助下——我们感谢这种帮助——制造汽车，但我们仍然坚信，我国的孩子们在未来就将在没有任何援助之下完成这项任务。

我们还决定，在这个联合企业中制造拖拉机，以实现土地革命；为了实现这个革命，它要求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它要求有肥料，我们就依靠正在建设中的阿尔泽湾和安纳巴联合企业以及我国其它地区即将建立的联合企业加以确保。这个工厂，将制造纯粹的阿尔及利亚牌——“雪尔达”牌拖拉机，在这种情况下，它除了为小农服务别

无其它目的，我们将为了最贫苦的小农的利益而在农村实现一次真正的革命。……

可是，只有在我国具备了各种物质条件，才能很好地进行这场革命。这是使我们不再附庸于外国的唯一办法。

……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理直气壮地讲话，这是由于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真正独立了，我们国家是自由了，我们首先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我们的经济。因为，我们是完全独立自主地建设我们的经济，我们断然地摈弃了一切在性质上有损于我们主权的東西。在赞扬自力更生的原则的同时，我们毫无保留地提醒我们的同胞们注意：在我们获得独立后要走的道路，并不是一条铺满玫瑰花的道路。我们虽然已经走完这一段战斗历程，然而我们还要走上更艰巨、更长久的战斗历程。由于我们的努力和承受了最大的牺牲，在前不久已经能够摧毁殖民主义的堡垒。今天，我们就应该独自建设我们的国家，而且从那时起，我国的孩子们就应该辛勤地建设我们的国家。

……

译自《非洲革命》第 335 期，1970 年 7 月 24—30 日

## 在巴里卡向第一批参加“国民服务制” 的青年的讲话

第一批参加国民服务的士兵兄弟们，士官兄弟们，军官兄弟们：

……

在这个只有太阳和尘埃的贫穷地区，你们确实在完成一项使命，它可以与11月1日我们解放战争中原圣战者的使命相比拟。

与就要参加国民服务的青年相比较，你们也是一支先锋队，它打开了动员我们人力资源的道路。另外，由于你们被召唤去实现未来的一切，你们在历史上将被认为是我国人民的优秀儿女。

在提到动员人力资源时，要承认，仅仅靠动员物质手段是不能满足我国建设的需要的，物质手段的动员必须辅以全部人力的动员。这就是我们提出国民服务制这一口号的原因。

其实，国民服务制具有服兵役和建设祖国的双重含义，它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所确定的目标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外，除用来从事一些社会、文化和经济任务外，它还组成了一种合乎人情的重要实验，让工人的儿子同大学毕业的青年工程师、青年医生汇集在一起。就在这种实验中，将克服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更可喜的是，阿尔及利亚青年将有一个他们应该达到的崇高而神圣的目标，使他们能够认清生活的真正意义，向更美好的理想前进。……

今天的青年应该以建设祖国作为他们向往的目标。

当我们在向你们——优秀的先锋队——讲话的时候，也是在向全阿尔及利亚青年致意，全体阿尔及利亚青年今后都将享有参加国民服务的光荣。

你们中间的每一位，应该把自己看成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你们所承担的全部任务都将在这所培养人的学

校中受到考验。

诚然，生活条件是艰苦的，劳动条件更为艰苦，但作为革命政权，我们宁愿把你们安排在这条道路上；在这条道路上，你们的斗争将具有更大的意义，你们的存在将具有更深刻的含义。

如果说，在过去成千上万的青年投身于斗争，牺牲了一切，甚至是流血牺牲，那么，甘愿流汗就是今天我们青年和正在成长中的一代的责任。应该轮到我们的青年以流汗来建设我们的社会，使阿尔及利亚人民得以摆脱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状况了。这就是国民服务制的意义，这便是它的目标。

……

为了很好地了解国民服务制的重要性，我们只须举出下述这些事例也就够了，即用你们的双手所进行的整治土地和清理工程的工作，目的就是为了使你们认识到劳动和努力的意义……

你们不会不知道，我国绝大多数人民曾经受到掠夺。甚至你们中间某些人的双亲现在的生活还很困难。你们中间目不识丁的人也不少。因此，依靠国民服务制迅速改变这种状况，这是我们行动的目标，国民服务的任务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为我们的孩子建立中小学，使我们避免十分沉重的财政负担；建立新村庄，改建所有的棚户区；修建连接我国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的道路。

这就是赋予国民服务制的全部含义。

……

这次革命应该消灭一切差别，具体实现这个任务实

际上已经落在你们这一代的肩上。整个年轻一代——特别是有文化的年轻一代——应该懂得，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种书本上的理论，也不是一种沙龙中的哲学，而是一项要求：坚持不懈作出努力的事业，是一项与建设成为同义词的事业。正由于这样，应该行动起来，致力于把荒芜贫瘠的、同时属于你们的地区改变成为肥沃的地区，从而使阿尔及利亚人能够富裕地、幸福地、舒适地生活。

这就是我们赋予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和含义。……

我们可以断言，有文化的阿尔及利亚青年现在看到，在他们面前展开了一条光明而十分明确的道路。因此，结束了学业的医生，在阿尔及尔开设诊所之前，应该想到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民的孩子们受着疾病的折磨，需要医生的服务。同样，工程师也应该把祖国的利益放在个人目前的物质利益之上。

这些话是针对全体曾有机会受过教育的青年而说的。今天，责任心在召唤他们到农村去，了解农民的生活，并投入到为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设计划中去。……

……

译自《非洲革命》第335期，1970年7月24—30日

## 在塞蒂夫的讲话

……

我们经常讲，现在还要讲，每个拥有土地的人应当尽心竭力地耕作农田，每个在城市就业的人也应该把土地

让给缺乏土地的农民。

我们出身于农村，不能无视贫苦农民的处境。

在掌权以前，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是同那些缺吃少穿的群众生活在一起的。我们同他们一起身居陋室，同他们一起分享口粮。

今天，提到土地革命，我们坚定地认为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些具备一切生活条件的试点农村，建筑堤坝，并提供必要的资金供贫苦农民使用。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即使我们需花费多年的努力也应办到的是，永远消除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贫困和无知，并且提高所有公民的生活水平。

这就是土地革命的真正意义。如果说昨天我们拿起武器是为了解放我们的人民，那么，我们今天努力工作，就是为了全体人民的进步和繁荣。

我们并没有忽视这一点：我们人民中占压倒多数的人生活在农村，在农村群众生活条件没有获得改善以前，我们绝不能认为真正的革命已经完成。

毋庸置疑，通过我的谈话，你们已经明白了土地革命的真正意义。我们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我们唯一关心的事，就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工作。

这次革命，我们一定要使之逐步实现，从而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状况……

就我们说来，未来将要成为什么样子？这首先就是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开发我们的资源，在全国各地兴建许多工厂。那是可能的，甚至是极为可能的，因为我们国家蕴藏着巨大的财富。

你们不会忘记那些资源在过去曾经走上欧洲殖民主义道路,为别人建设工厂服务,而流亡在国外的阿尔及利亚人须历尽百般刁难才能在那儿被雇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开发我们的资源,建设足够的工厂使之遍布全国各地。这就是我们所执行的政策的意义。

谈到未来时,我们想提一提建立大、中、小学和其它技术学院,使成长中的一代能够达到先进繁荣的各国人民的水平。那还意味着,进化和进步也应建立在正义和平等的基础之上,从而可能避免剥削另一个阶级的新资产阶级的冒头。

从这一施政方针产生了一项地区平衡原则,它已使许多省区在一切领域中都有一套特殊的建设规划。

按照其它省区的先例,塞蒂夫省也将制定一套能够解决它的各种问题的规划。这样,在这个区域的同胞们将不会再有被革命政权所遗忘之感。

根据部长会议即将作出的决定,你们的省区即将增设新的工业、学校和医院。这就是我们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

.....

我们曾经立誓要把阿尔及利亚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变成一片辽阔的工地;看来可以确定,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在最近几年内,我们一定能达到我们的所有目标。

虽然过去我们没有资金,但今天我们已经着手通过辛勤的劳动去创造。昔日掌握在殖民者手中的财富,如今已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从而归于阿尔及利亚的国库。这笔巨大的资金现在已经用于我们的建设计划,而这些计

划将会使我国各地区的全体公民得到利益。

矛盾、空谈和放任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以行动和建设为标志的历史新篇章正在我们的面前展开。

依靠劳动和纪律，我们正在发展和繁荣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我国和资产阶级的欧洲有什么不同呢？你们和欧洲人有什么不同呢？

不同就在于所采取的政策、创造适宜的气氛和所规定的某些目标。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动员人民和采取行动的问题。

上次大战期间，一些民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大约二十年以后，都已经重建他们的国家。

我们目前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要求我们在这次建设战役中获得胜利。……

译自《非洲革命》第 348 期，1970 年 10 月 23—29 日



## 对从前线奉召回国部队的讲话

1967年6月以色列发动侵略战争，阿尔及利亚曾派出部队抗击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后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所谓停火建议。阿尔及利亚反对这一停火建议。以下为布迈丁在欢迎归国部队大会上讲话全文，着重申明阿尔及利亚对巴勒斯坦问题所采取的立场。

军官们、士官们、士兵们：

请允许我以革命委员会、政府以及我们亲爱祖国的每一个公民的名义，向你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我们对你们作出的流血牺牲感到无比的骄傲。向你们，这个旅和前几次各旅的军官、士兵们以及那些战死沙场的各个旅的烈士们，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因为你们参加了这场关系到整个阿拉伯民族的斗争。祈求全能的真主把他的仁慈赐予我们所有的烈士，赐予在运河前线、戈兰高地、约旦河东岸、黎巴嫩边境、被占领的领土内以及在敌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凄惨的难民营里壮烈牺牲的烈士们。

我们祝愿：为阿拉伯民族共同的神圣事业付出的大量鲜血不致白流。

事实上，这些鲜血是为了洗雪这次战败，甚至我们民族在阿拉伯东方所有各次战败的耻辱而流的。

今天，你们回到了你们的国家。阿拉伯这一地区的每一个公民都明白，你们到远离你们的首都四千多公里的东方去，不是为了在尼罗河畔或运河沿岸度过一个夏季，而是为了保卫阿拉伯民族的事业，正如你们的兄弟们从战斗开始第一天所做的那样。

你们以你们的先辈为榜样，是抱着夺取胜利或者战死疆场的坚强意志到东方去的。

当你们出发前往东方时，你们是以远没有治愈创伤的阿尔及利亚和它的人民的名义去的。

你们同样地是以成千上万的寡妇和一百五十万难民的名义去的。

你们是以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名义去的，因为革命政权过去深信，现在仍然深信，这一战斗是整个阿拉伯民族的战斗。

你们中间不少人已经战死沙场。在全阿拉伯民族经历困难的时期，你们曾经满怀信心地接受了每个公民期待于你们的一切牺牲。

你们远离你们的家庭、你们的朋友和你们的祖国，你们拒绝安居在尼罗河或底格里斯河沿岸的乡间别墅里，而宁愿战斗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

你们是怀着这样的志愿出发的。你们又昂首阔步地回来了。今天，阿尔及利亚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自豪地来欢迎你们。

我在这里对你们坦率地这样讲，是为了使我们所有

的同胞知道，你们是以阿尔及利亚、它的人民和它的革命的名义完成了你们的任务。

我们国家尽到了对阿拉伯事业应尽的责任。它不是因为受到压力或被请求才这样做的，而是当它的所有伤口还没有包扎、被殖民主义破坏的无数村庄尚未重建……的时候，它认为应当这样做。

阿尔及利亚革命所作出的努力和所承担的牺牲，不仅是为了我们国家的独立，而且也是为了重新提高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威望。

在阿尔及利亚革命胜利的最后阶段，经历了持续将近八年的人民战争，动员了所有的公民，这一胜利是整个阿拉伯民族的胜利。

阿尔及利亚所取得的成功，是阿拉伯民族衰落时期以来第一次看到胜利，每一个阿拉伯公民由此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不幸的是，阿拉伯民族在西部所取得的胜利，几乎完全被继之而来的战败所湮没了，甚至我们还不知道这场战争是怎样爆发的，怎样结束的，以及在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更不知道敌人——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怎样在几小时之内而不是在六天当中居然就取得了胜利。

正象世界通讯社、特别是西方通讯社某些人所想或写的那样，敌人——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是经历六天的战斗，而只是几个小时。这就是可悲的现实。

因为，战争不是在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意义上发生的。事实上，这是敌人一次闪电突击，阿拉伯军队的一次混乱败退，这次败退在古今战争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

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的极其痛苦的历史真实。

公布这一真实，绝不是为了伤害我们的兄弟，因为我们所遭到的失败实际上是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失败。

占领阿拉伯祖国某些地区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在事实上就是践踏了整个阿拉伯民族。

我曾经说过，国家人民军的先锋队，从走上战场那一刻起就是为了履行他们的职责。所以我们的士兵进驻了运河沿岸。

今天，你们奉命回到了你们的国家。

你们知道，阿尔及利亚已经拒绝了无条件停火的原则，因为这是同我们的主权和我们人民的精神不相容的。是与阿尔及利亚革命原则相冲突的，在阿尔及利亚革命中，也曾有人在“体面的和平”的外表下提出过这类无条件停火。

当时殖民主义向解放军提出“体面的和平”，这你们都清楚。这种建议就是要造成停火局面，然后进行接触，以便继续进行战争，或者停止战斗。我们的人民拒绝了那个建议。解放军也这样做了，解放军在阿拉伯民族历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一页，我们应当引以自豪。

民族解放军和全体同胞拒绝“体面的和平”，因为它同革命和解放斗争的目标是不相容的。

然而，我们从来没有接受停火的先决条件，我们却同一个得到大西洋公约<sup>①</sup>和世界资本主义军队最有力支持的更强大敌手进行了谈判。

---

<sup>①</sup> 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下述谈判事，系指阿尔及利亚与法国进行谈判。——译者

我们的敌手最后接受了我们的条件。谈判正是在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开始的，正象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许多烈士为了实现国家的解放和独立继续每天都在牺牲。

这就是我们的行动路线。

面对阿拉伯东方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我们从这一现实出发，表明了我们的鲜明态度，甚至当时战争有一触即发的危险。我们当时曾声明，如果发生战争，就是全面战争，一场从各个角度考虑都具有复杂多变形式的全面战争。

这一切，在我们所有以革命委员会和政府名义发表的公开声明中，都有力地作了说明。

我们当时曾经声明，我们完全拒绝无条件停火，因为停火就意味着投降和接受敌人的条件。

这一切，在6月5日之前就已经说过，在1967年6月9日和19日，以及外交部长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发言中又重申过，阿尔及利亚表示坚决反对1967年11月的决议。

我们拒绝安理会的决议，是因为我们过去相信、现在以至将来仍然相信，执行这个决议就是取消巴勒斯坦事业，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实行投降和放弃在整个阿拉伯民族的高度上应当继续进行的斗争。

象那些以阿拉伯民族的名义发言的人一样，我现在也同样以这一名义而不是以阿尔及利亚名义宣告，斗争不是一年或两年的事情，相反地，斗争应当在整个阿拉伯民族的高度上继续进行，直到它必然获得一个合乎逻辑

的结局为止。

我们在许多场合并且向各种国际组织都曾经声明，阿尔及利亚拒绝安理会的决议，因为这一决议除了宣判巴勒斯坦人民被赶出他们的祖国永远流放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难道我们能够容许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陷于这样的境遇之中吗？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因为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想法。

我们作为革命者，永远信赖人民的意志，我们已经使人民习惯于讲坦率而真实的语言，即使这种语言是令人痛苦的。

我们绝不允许把巴勒斯坦问题一笔勾销而承认犹太复国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拒绝安理会明确规定停火、承认安全边界和包括“以色列”在内的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的决议。

为什么不对我们各国人民坦白呢？为什么把现实真相对他们掩盖起来呢？

亲爱的同胞们，真实的情况是：我们所以拒绝这个决议，是因为这个决议违背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

我们已经声明，我们永远不允许取消巴勒斯坦问题，也不允许失败的结局重演。不管时间是多么长，我们不能接受 1948 年和 1956 年失败的结局，也不能接受 1967 年惨败的结局。因为，阿拉伯民族的这部分人，阿尔及利亚前不久就曾经拒绝屈服于暴力。阿尔及利亚人民曾经世代进行战斗，在战斗中不是牺牲了几十万，而是牺牲了几百万儿女。1954 年成功地进行的一次战役，是最

后的一次战役。

我们为我们的人民在昨天拒绝的东西，我们在今天绝不能代巴勒斯坦人、也不能代阿拉伯民族去接受。这就是我们确认必须继续进行斗争、同时拒绝安理会决议的理由。

但是现实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这场斗争还被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人们还没有吸取过去的教训。

因而这场战斗仍然停留在以装甲车对装甲车、大炮对大炮、“米格”式对“鬼怪”式的正规军队的水平上。这场战斗还没有在新的基础上展开。

确实，我们曾说过，我们现在还要重复说，只要阿拉伯各国人民仍然远离战场，就不会有胜利。

目前情况仍然是局限于几十万士兵的正规部队和装甲车、飞机和大炮的水平上。

当时我们就说过，这种战争观念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今天我们再重复一次，尽管某些人妄言我们是在远离战场四千多公里以外讲话。

亲爱的同胞们，我们相信，在当前既困难又艰巨的形势下，不需要说明我们是怎样的人。

历史会证明我们是战胜殖民主义的人民，是用武力把殖民主义从它的领土上和它的祖国赶出去的。

不需要重提阿尔及利亚人民仅在最后一次战役就牺牲了十分之一的居民。

这就是历史用火和血的文字记载下来的现实。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样设想的战斗是错误的，因为这不是一场“鬼怪”式的战斗。所以，还有另一些人民，

如光荣的越南人民，他们仍然在继续战斗：在打败了法国殖民主义之后，现在又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进行战斗，而绝不投降。

我们决定让你们在宣布停火和接受美国计划的翌日回国，是因为你们留在运河的第一线是同你们的国家和人民的政策相矛盾的。因为，既然不可能拒绝停火，那就不能让你们留在远离你们国家首都四千多公里之外炎热太阳下的战壕里。

那是一项我们不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所以我们作出了让你们回国的决定，因为在有关美国计划的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让你们仍然留在运河沿岸，那是不可思议的。

阿尔及利亚人民作出的决定，其含义就是如此。这个决定不可能有其它任何的理解或解释。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不允许我们、我们自己也不允许我们对这一问题展开论战。但我们有权肯定我们国家圆满地完成了它的任务，阿尔及利亚除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外，今天又增加了许多烈士、寡妇、孤儿和残废者。他们所作出的牺牲，并不是为了最狭隘意义上的民族事业，而真正是为了更广泛意义上的阿拉伯事业。

追述这些问题是必要的，因为近两年来，我们遗憾地听到了在东方所散布的一些流言蜚语，说阿尔及利亚采取狂热和极端的态度，满足于说大话，没有尽到它的责任。更严重的是，甚至说阿尔及利亚没有为阿拉伯事业承担任何牺牲。因此，亲爱的兄弟们，请允许我坦率地谈谈这个问题。



作为负责人和执政者，我们接受我们兄弟对我们的政治立场进行批评和判断，不论是肯定或否定；但我们永远也不允许有人公开地或转弯抹角地攻击我们的烈士，不论他在他的国家居于什么地位。

我们接受对我们的政策的批评，我们也接受某些人所谓正在医治自己创伤的阿尔及利亚还没有完成它的任务这种意见。但是我们绝不允许有人在任何场合在任何情况下对我们国家纪念的烈士横加污辱。

亲爱的兄弟们，这就是关于阿尔及利亚立场的某些真实情况。我们国家所采取的立场始终是同它的政策完全和谐一致的，今后我们将继续朝着这个方向行动。我们永远拒绝把我们的命运交付给比我们强大的国家。我们永远拒绝一个或几个大国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们从来不要别人来解决我们自己的事务，代表我们去谈判，或者代替我们去寻求解决办法。今天应当提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帝国主义什么时候关心过阿拉伯人的利益？

我们意识到每一个兄弟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完全有权自己处理它的领土和在它的国家主权范围内采取行动。这是它的权利，我们不干涉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

但是，我们有权以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名义声明：不论是阿拉伯国家的首脑或负责人，都没有权力这样处理巴勒斯坦问题，要巴勒斯坦人民承担 1967 年战败的赔偿和牺牲它的权利。

这就是我们确认的一个原则，对于巴勒斯坦事业我们不怀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想法，我们从来没有利用巴勒斯坦事业来谋取政权，建立一个政党，或谋求某些自己民

族目的。我们同巴勒斯坦事业的唯一联系就是采取积极战斗的主张，对这一事业的前途和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信念。

革命政权已经声明，我们将无条件地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我们将无保留地加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以便实现它的所有目标，即使这样做会使我们同一些阿拉伯国家意见不一致，即使这些国家在战斗行动和追求目标方面是同我们的观点极其接近的。

这就是我在你们从前线回来的机会要向你们说的话。我们的话是坦率的，目的并不是要伤害任何人，因为我们的愿望从来就是祝愿所有阿拉伯人民繁荣、幸福，我们同他们是同甘苦、共命运，同享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的。

为了这些话表达得更清楚，我要说我刚才讲的那些话，既不是出于愤懑、怨恨，也不是出于想成为阿拉伯民族的头头的欲望。

在这个地区，我们早已摈弃要取得领导权的想法，结束了偶像崇拜的神话。

因此，有人转什么念头诽谤我们企图取得两三个国家或整个阿拉伯民族的领袖地位，那岂不是不可思议么？

我以坚信我们有着共同命运的人民的的名义，以完全意识到我们正面对着共同的敌人的人民的的名义，再一次肯定这条真理。

我们热切希望阿拉伯民族和阿拉伯各国人民一点也不要被那些笼络人心的决议所迷惑。这些决议看来似乎可以结束目前的痛苦和牺牲，但必然会给我们造成未来

的大灾祸。

如果因为中东目前所面临的安全只能以这些条件和用这种代价来建立和实现，巴勒斯坦的事业不幸遭到破坏，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遭到暗算，这样一种交易毫无疑问会给阿拉伯民族的前途带来严重后果。安理会的决议和最近称作“罗杰斯计划”的美国计划，实际上只能以取消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作为条件才得以完全实施。

这就是我们的忧虑。

就我们来说，我们的愿望是：这样的灾祸不会发生，因为，如果发生了，其后果对阿拉伯民族来说将比 1948 年、1956 年和 1967 年更加不幸。

光荣属于马科雷克和马格里布的阿拉伯烈士！

光荣属于阿拉伯民族！

译自《非洲革命》第 340 期，1970 年 8 月 28 日—9 月 3 日

## 在阿拉伯律师联合会第十一届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阿拉伯律师联合会创立于1944年。1970年9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第十一届代表大会。布迈丁在大会上作题为《我们不能容忍那些侵犯别国人民生活权利的倡议》的讲话，着重阐明阿尔及利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的立场，谴责帝国主义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号召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等。全文如下。

律师先生们：

在你们召开第十一届大会的阿尔及利亚——你们的故乡欢迎你们，我感到高兴。我确信你们十分了解本届会议的重要意义，这次会议是在当前阿拉伯民族面临危险的情况下举行的。

阿拉伯民族处在一个发表许多有关自由、尊重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庄严宣言的时代，事实上却遭到了种种不公正待遇和压迫。在阿拉伯祖国某些地方发生的种种事件，极其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阿拉伯的律师们，是他们民族有觉悟的分子的代表，通晓权利、公正和自由的一切原则，因而有责任启发

和引导广大群众提高觉悟，把他们提高到承担历史性责任的水平。

向各种国际组织揭露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计划，这是阿拉伯律师具有最重大意义的行动，因为就他们职务的性质而言，他们应该为这一事业取得成功集中所必需的物质和精神条件。

他们写作和研究的目的，应该是促使最大多数人改变他们对巴勒斯坦的看法，去认清那些被剥夺权力的人就是巴勒斯坦的真正合法的主人。把这项工作做好，就是阿拉伯的律师们有效地对巴勒斯坦的解放和更全面地为保卫权利作出贡献。

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其唯一的起因在于来自不同国家的犹太人在那里强行霸居，而原来在那里的全体人民却被赶出了他们的祖国。这同样是一个由种族歧视和种族的复杂性所产生的问题，但这首先是一个纯粹的、露骨的殖民事件，它同其他殖民事件并无任何差别。巴勒斯坦问题，它的形式和实质，是和津巴布韦、南非、纳米比亚、几内亚(比绍)、安哥拉、莫三鼻给问题一样的。从帝国主义剥削和扩张的目标来看，它类同于越南事件，越南人民，长期以来坚韧不拔和英勇不屈地继续抗击一个殖民主义以后又抗击着另一个殖民主义，无比坚定地保卫他们的自由和权利，维护完整的主权和尊严。

因此，这是以斗争中的巴勒斯坦人民所代表的权利为一方和以受到决心保持其利益及其势力范围的世界帝国主义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侵略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

联合国最不幸的一项决议，无疑就是全面批准在阿

拉伯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这个国家——我们顺便指出——在我们看来，不过是某些集团的强烈意志的实施罢了。这些集团在联合国组织内，已不耐烦再耍手腕搞阴谋了，因此运用强权作出决定，这些都已经不断得到证实。巴勒斯坦人民在成为政治交易和联合国无数决议的对象之后，毅然作出了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决策，从此以后，他们就不再指靠那些“保护人”和朋友或自称为“保护人”和朋友的人了。

巴勒斯坦人民决心解放他们被夺去的土地，为此，他们拿起为他们赢得胜利的武器，并且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奋勇投身到一系列事变中去。

巴勒斯坦人民的武装抵抗，动摇了被认为不可战胜的联合在一起的犹太复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地位，从此成为阿拉伯人民理想的真正的表现，因为他们的尊严受到损害，他们渴望恢复权利，恢复对他们应有的尊重与重视。

巴勒斯坦人民广泛响应武装斗争的号召，并不令人惊异，因为他们坚信，这是恢复他们权利和被侵占的祖国的最可靠的途径。同样清楚的是，每一个试图妨碍这种革命斗争或限制其活动的行动，只能满足犹太复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愿望，而犹太复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正致力于在我们祖国这块亲爱的土地上维持其统治，并以此来确立向阿拉伯世界其余地区进行殖民主义扩张的基地，阿拉伯世界是扩张主义和以色列统治梦寐以求的对象。

我们已经多次宣布，我们今天重申，我们尊重任何国家提出的倡议，只要这种倡议是关系到它本身事务的就

行。我们承认每个国家有权处理它所确认的它自己的事务。但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忍那些损害别国人民生活权利的倡议，这些倡议危害别国人民的命运，对他们的反对意见和英勇斗争置于不顾。

我们的立场是根据我们自己对付殖民主义及其阴谋的经验确定下来的，也是由于我们强烈意识到殖民主义及其阴谋加之于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民族的危害而确定下来的。所以，某些人会觉得我们措辞强硬，但这不过反映了我们的坦率态度罢了。

事实是，我们不仅有责任同兄弟的巴勒斯坦人民紧密团结，并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的背信弃义、朋友的屡犯错误当然感到担心，而且我们还意识到我们的共同命运，因为我们是构成同一整体的一部分。

巴勒斯坦问题的严重性，使我们无法设想它可能取得一种纯粹形式上的解决办法。我们仍然坚信，采取行动，逐步推进，才会取得彻底的和可靠的解决办法，即唯一可能结束这个地区的动荡不安并彻底清除不公正和侵略以恢复权利的解决办法。

按照革命战争的策略和方式，在反对以色列的战斗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巴勒斯坦人民。只有他们不疲倦地采取行动，才能挫伤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的锐气，击败它们的军队，不管他们拥有多么强大的空军、火箭或装甲部队。这是他们解放被夺去的土地、恢复已丧失的对阿拉伯人的重视、尊敬和尊严的唯一手段。

如果说巴勒斯坦人民是这场斗争的先锋，那么，所有阿拉伯人却有义不容辞的义务给他们以有效的支持，真

正站在他们一边,不管承担多大的牺牲和风险。

正象战斗的团结是不可抗拒的需要一样,在这决定阿拉伯民族命运的斗争中,动员广大群众,同阿拉伯民族团结起来,阿拉伯民族将象过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一样,夺取对那武装起来的数量并不少的同盟的胜利。

某些方面曾经提出所谓“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建议”,这实际上是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日益强大的冲击下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帝国主义要运用其全部影响,试图窒息这一真正的解放运动,借以挽救它的犹太复国主义盟友。我们每天都听到有关政治上军事上对巴勒斯坦人进行迫害和施加压力的报道,其由来就在这里。

实际上,这些建议没有任何和平的东西,所以巴勒斯坦人民在当前只要一提到这种建议,就恰如其份地称之为失败主义的建议。

这些建议谈不上是公正的,因为提出建议的人,正是不断向以色列提供大量物质手段借以保证他们在阿拉伯地区的地位与优势的人,他们所根据的原则事实上就是“武力均势”的挡箭牌。

更为严重的事实是,这些建议根本不让巴勒斯坦领导人参加,假装不知道有这些人存在,也不让作为当事人的他们的组织参加,而巴勒斯坦领导人和他们的组织正是为自己的命运而斗争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法定代言人。

不把原来的权利所有者——巴勒斯坦人民考虑进去的任何解决方案,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只有巴勒斯坦人民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阿拉伯民族、特别是在要求击退扩张主义者的侵



略和失败主义者的阴谋的巴勒斯坦人民横遭非难的这个阶段,我们坚决重申,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坚持我们所承担全部义务的立场,我们准备调动我们所有力量和使用一切可能手段,以使权利和正义赢得胜利,尽到兄弟般的诚挚团结所赋予我们的职责。

借此机会,我们要向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切为自由和统一而斗争的人民致敬。我们认为重提我们在1967年6月5日事件后所立即宣告的话是不必要的,这就是:人民的自由,只有坚持战斗、顶住风暴才能获得。确实如此,被武器夺走的东西,只能用武器收回。

在我们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中,包括有支持世界正义事业一项,这是因为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过去,不能忘记我们人民整整一世纪以武装斗争反对殖民统治所承担的巨大牺牲,这是从我们对自由和正义的事业是不可分的整体这一信念出发的。

女士们,先生们: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目标是要把我们保持在它们的势力范围内,把我们国家变成它们产品的开放市场。它们还要使我们的人民听任他们掠夺资源和财富,在知识和文化方面处于落后状态,并且把我们的人民紧紧束缚在依附地位上,禁止他们自卫,特别禁止他们支援别人的斗争。

外国资本家的公司为了它们的利润,自以为拥有榨取第三世界资源的特权,从来也没有考虑过原是这样资源的合法所有者的人民的利益。

正是这些公司的本性,促使它们力图榨取它们正在

开发的能源，以便加速牟取高额利润。

因此，有关国家的人民，对他们自己、对历史都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因为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就意味着人类奴役状态和屈从状态的延长。

所以，收回我们的财富，运用这些财富为人民大众服务，是当务之急。我们采取一项真正独立的政策，使我们确保必要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而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正致力于培养符合实现这些目标的民族干部。

在这种背景下，凡不是建立在现实可能性和需要的基础上的政策，而又不采取必要的革命方法去克服遇到的障碍，这种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被剥削的人民就会永远屈服于外来势力支配之下，永远屈服于一项由进行剥削的强国所制定的、更有利于他们的战略。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没有相应的经济独立的支持，任何政治独立只能是形式上的独立。

我们认为，所有阿拉伯民族的成员的共同使命是建立真正的、有效的团结。这一使命是构成我们这个共同命运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的要求所确定的。

因此，正是这个崇高任务，号召阿拉伯民族有觉悟的优秀分子进行合作。为了做好这样的工作，要求我们有坚定信心和真诚决心去排除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仅仅凭感情，不论它是多么合理、合法，也不可能把人民的希望变为具体事实。所以，为实现人民的希望的积极行动在没有得到支持的情况下，希望仍不过是希望，也就是说，只是单纯的动机而已。

我们并不是不知道各个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互不相同。但是这种差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阻止我们去实现我们的最高目标，这就是面对日益增长的危险，我们的共同命运所要求我们的团结一致。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当前的危险，这是很可忧虑的。

女士们，先生们：

在祝愿你们在这个也是你们的国家里愉快地逗留的同时，我提出这样一种希望：你们要担负起你们肩上的重大责任，作为阿拉伯人民的代表，你们应该为他们操心。

最后，我祝愿你们大会的工作取得完满的成功。

永恒的光荣属于阿拉伯民族的烈士们。

译自《非洲革命》第 341 期，1970 年 9 月 4—10 日

## 在劳特菲上校客运自管制企业 分红大会上的讲话

1971年2月初，布迈丁出席劳特菲上校客运自管企业分红大会并发表讲话，除谈到国内问题外，着重谈了阿法石油合作问题，驳斥法国报纸提出的改变阿尔及利亚政治体制的荒谬主张是干涉内政，表示只有双方利益相等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并号召要为结束资本主义国家和垄断组织的剥削而战斗。以下是有关阿法石油合作问题部分的摘译。

.....

我敢于重复一遍，亲爱的兄弟们，我认为有必要指出，战斗是艰巨的，然而胜利是必然的。但重要的是，我们要经常铭记在心，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应该把这一革命的前途看作自己的责任。当我们大家都能贯彻执行这个无上命令、满怀这种精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的革命是能够胜利地经受一切考验的。

说到这一点，我愿意谈一下我们同胞、特别是工人经常关心的一个课题。这就是人们有意无意地用“石油战”这个词来命名的问题。这场“石油战”，以石油资源的合法所有者和产油国为一方，同以消费者和开采石油

的那些公司为另一方,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了;但在这以前,它原来只是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间的问题。

是什么原因迫使我们投入这场战斗的呢?最近时期以来,又是出于什么动机和由于怎样的内幕使得以法国为首的西方报纸首先攻击我们、随后又攻击其他石油生产国呢?

亲爱的兄弟们,解释是极其简单的:事实是,我们并没有要求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请求法国把它自己的一部分作为在我们土地上实行殖民化的损失赔偿归还我们,以便有助于我们发展我们的国家。我们从来没有要求过享有别人的资源,我们只是耐心地要求我们的伙伴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存在于我们地下的石油是阿尔及利亚的石油,因此,无可争辩地是阿尔及利亚的资源。

然而,新殖民主义者却不承认这个事实。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几个月来,谈判一直拖延着。他们——这些新殖民主义者——认为石油是属于他们的,而就我们来说,哈西梅萨乌德油井、哈西鲁迈勒油井和其他明明白白位于阿尔及利亚另一些地方的油井都是属于我们的,这种石油只能是阿尔及利亚的。

令人痛心的是,虽然有这些无可否认的证据,这些新殖民主义者就是无视这个事实——人们不能说得更明确了;他们没有因此改变他们的态度。

我们要明确而坚决地使我们的对话者懂得,事先不同意这些原则,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

这些原则表明：我们所生活的土地，是阿尔及利亚的土地，山、平原，同撒哈拉沙漠一样，是属于阿尔及利亚的，石油、天然气和国家的其它地下资源，同样无可争辩地是阿尔及利亚的。

正是在概念和解释方面有这种不同，才形成了我们同那些石油公司的分歧。

因此，这个问题，决非象法国报纸试图传播的那样，是一个价格问题。法国报纸多年以来一直认为，阿尔及利亚的石油价格比较昂贵，而法国公司完全是出于善意才向我们购买我们在世界其他市场上无法销售的石油产品。

由此可见，这样的人，虽然在我们国家里呆了一百三十年，可是既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记住什么。两年来，为了使我的观点更明确，我曾用坦率的语言告诉这些石油公司：我们对事情会作出正确的估计，并且会根据这种估计而采取行动的。我们不了解你们为什么坚持要购买我们的石油，而石油的价格，在你们看来又是如此昂贵；因此，不如放弃它，去买便宜货。你们已经中止购买我们的葡萄酒，那么停止向你们供应阿尔及利亚石油，让你们向阿拉伯湾或美洲去选择其他的石油供应者，是符合你们自己的逻辑的。

这就是说，这个问题完全不是一个价格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原则的问题。这些原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动摇的。

我们承认法国的、甚至我们也可以说是法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但是，这并不能使我们容许，而且在任何方式

下也不能容忍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出现剥削。我们永远不会同意让我们的人民停留在贫困之中，继续忍受处于不发达状态下的无穷苦难。

我们不准备从法国方面、也不准备从其它国家方面接受类似的境遇。

我们只是严格要求收回我们的权利和我们自己的资源的所有权，我们没有任何奢望，我们也不谋求别人的财富。

我们接受合作，然而无私的。法国有利益，阿尔及利亚同样有利益。如果我们两方面的利益是对等的，那我们就能谈真正的合作。

当我们不久前开始谈判的时候，某些人曾说阿尔及利亚不尊重它所承担的义务，它没有考虑法国的利益。

这种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法国报纸就这件事所写的一切，无非是连篇的谎言和拙劣的诡辩。

1965年，我们曾同法国缔结一项协定，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违反协定任何条款。不仅如此，由于我国所采取的立场，就是坚持要成为一个被尊敬的国家，并使我们的人民享有同样的尊重和同样的国际声誉，我们六个月来一直在进行谈判，在这期间，我们的钱财被冻结在法国公司的钱柜里，这些公司毫不讳言，在它们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协定一经签订以后，它们也不会同意把这些资金还给阿尔及利亚国库。

应该相信，这就是法国公司的逻辑。正当我们在为发展而进行战斗的时候，正当我们需要这些资金来修建

学校、工厂等等的时候，我们有权表示我们不能忍耐，然而我们曾保持镇静，而且等待了六个月之久。

同这些作出某一决定的公司达成一项协定会出现无法实现的情况，在我们看来，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那么，将会突然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我们未能同那些矿业公司取得谅解的时候，我们不是曾经因此采取过行动吗？而在国有化时期，不是无阻力地作出决定，把这些公司都国有化了吗？

的确，这些公司曾在这六个月内拒不购买我们的铁，它们还掀起一场反对我们的运动，旨在使其他购买我们产品的买主怯步不前，它们还曾预言我们的码头最后将被一堆一堆无法出口的矿产压塌……可是这并没有妨碍我们照常处理好我们的问题。

不管法国各派报纸对我们的辱骂，我们已经决定要对这些石油公司采取同样的方法。法国报纸首先是侮蔑一些负责人，可这并不能使我们采取另外的措施，对我们的恶毒咒骂反而增强了我们的信念，因为我们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成为殖民主义报纸的攻击目标，是最好的证明和最有力的证据，即我们正沿着真正的革命道路前进。

可是这种报纸并不懂得这一点，而且不久就诽谤阿尔及利亚人民和我们移居法国的劳动者，法国政府对这种诽谤无动于衷，也不制止这场卑劣的运动。我在这里附带说几句话，借以说明这决不是故意重提这些可悲的真相来激动你们的感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愧为不记仇恨的有责任感的人民，作为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徒，都



以品格高尚，情操纯正，尊重自己，尊重别人——即使是他的最坏的敌人——著称。众所周知，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控制的法国新闻机构，还从另一个方面用大量缩减以合作名义在我们这里工作的法国教师来威胁我们。亲爱的兄弟们，你们不会不清楚，犹太复国主义是非常强大的，它在全部法国新闻工具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我们在任何方式下都不能接受这个旨在反对我们人民的运动，我们的人民曾经用勇敢和献身精神教训过殖民主义者。

更加严重的是，我最近竟在一家法国报纸上读到一份向法国外交部提出的报告，主张立即寻找一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就在于变更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体制。亲爱的兄弟们，我们曾认为这些法国人已经吸取了我们所给予他们的教训，我的意思是说法国人，显然，某些法国人在向后倒退，而另一些人则倒退到要推行殖民主义。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读到一份可以意想到其内容的类似的报告，这份报告竟至于说目前阿尔及利亚政府是“宗派主义的和狂热的，迫切需要由一个更柔顺听话的政府来替代”。你们当然不会不知道，所谓柔顺，在这种场合下，就是要一个反革命政府，一些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收买的领导人。

这就是我们现在从法国报纸上所读到的报告的内容。

当我们按照我们从1954年11月1日制定的拿起武器来恢复我们自由的革命行动路线从事保卫我们的利益的时候，动员起来了的亲爱的兄弟们都投入了战斗。

我个人认为，要在阿尔及利亚改变政治体制的建议是一个严重事件，它是对我们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

实际上，殖民主义者忘记了一条根本的真理，那就是革命，为了这个革命，曾使一百五十万烈士献出了生命，革命决不会迷失它的道路，不管作出了多少使它改变方向的尝试。这是以决不动摇其意志的人民的名义来说的，而阿尔及利亚人民正是越南人民那样的人民。阴谋也好，武力也好，都将永远损害不了人民的决心。

这就是我应该向你们说明的真相，以便你们对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的经过情况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我们意识到我们所保卫的东西，并不只是出于我们个人的看法去保卫的东西，而是由数百万阿尔及利亚人的确信所表达出来的应予保卫的东西。只要我们始终坚持表达这数百万同胞的意见，那么对我们来说，就绝无其他的选择，只有勇往直前。我们准备同一切愿意在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应该彻底明白，对我们进行威胁和施加压力，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们有能力面对和解决我们侨居国外的劳动者的问题，正象我们完全有能力对教师问题和法国拒绝购买我们的葡萄酒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一样。不过，我们在这里要着重指出，我们将仍然竭尽全力来保持法国和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我认为在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典礼上，我有责任向你们提供这些说明，使我们全体男女同胞都了解这些现实的真正意义，以免为反革命喉舌——西方新闻机构

散布的胡言乱语所欺骗，也不至于为某些专门关心其卑鄙利益的阿尔及利亚人的胡言乱语所欺骗。

目前，阿尔及利亚正在展开以发展和经济解放命名的战斗。

关于一场真正是石油的战斗，在今天，是由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肩并肩地进行着的一场战斗。你们并非不知道，在利比亚活动的那些石油公司具有异乎寻常的影响，正因为这样，它们也就能够搞垮政府，任命那些忠实于它们的部长。由于利比亚的革命，事态才取得了不同的转变，因为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决定共同进行的这场战斗，已经一下子成为石油资源的合法所有者和剥削者之间的世界性的战斗。

这些剥削者曾几次三番地重复说，阿尔及利亚的石油太贵了。然而，亲爱的兄弟们，在我告诉你们，例如当阿尔及利亚以租金的名义征收十个第纳尔时，这些外国公司净得的利润要达十倍之多，我想是不会使你们吃惊的。这就是我们由过去承袭下来而今天为反对它而进行斗争的事实。我们已经申明，产油国同开发公司之间的关系，从今以后，应该建立在新的基础上面，而我们迟早得结束资本主义国家和垄断组织的剥削是不容争议的。的确，我们的未来是同我们在这场历史性战斗中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革命的人民，我们坚信我们将取得胜利，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有权利。但是还没有这样的先例：有了权利就一切都完事了。

亲爱的工人和农民兄弟们，愿你们成为社会主义革

命的战士，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决定着我们的未来和今后世世代代的未来。

译自《非洲革命》第 363 期，1971 年 2 月 5—11 日

## 在签订有关阿尔及利亚、摩洛哥 两国边界和双边经济合作条约 的签字仪式上的讲话

1972年6月14日，第九次非洲统一组织国家首脑会议于拉巴特召开。会议开幕之前，阿尔及利亚布迈丁主席和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签订了有关两国边界和双边经济合作的条约。布迈丁在条约签字仪式上发表讲话，说明签订条约的意义及对马格里布和非洲的影响。

当我们两国还处在殖民主义枷锁下的时候，我们国家继承下来的遗产是沉重的、难以忍受的。殖民主义把我们国家投入愚昧和分裂状态之中，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以便摧毁我们。殖民主义使我们两国陷入贫困。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的大陆不得不从零开始，以便提出原则、制定法律和发展建设，来改变落后的面貌。假如说当时非洲统一组织宪章所确立的是一些基本的、首先是简单的原则，那么这些原则现在已发展成为具有象国际法那样的参考价值了。

明智曾要求我们客观而现实地去正视非洲的现实。因此，我们并不限于把不干涉他国内政、每个国家都有自

已的经验和抉择看作是一项普遍原则，而且我们要进一步按其最确切的形式和最高尚的内容把这一原则加以实施。

我们不仅应该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承认每个国家在独立时确定的不可侵犯的边界，而且应该执行这项原则，巩固这些边疆。这一切都需要作出不断的努力，互相了解，互相谅解，忘掉过去的分歧，为共同建设的理想而努力，以求达到面向未来需要这样的高度。

这正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遭到一次历史上的不幸事件之后，摩阿两国由于历史、地理、精神价值和悠久文化而紧密相连——这也就是同样的考验、无条件的团结、共同的愿望所加强的重要因素，才使今天这一切得以实现。

如今我们走出了曾经被引入的崎岖小道。在绕过了设置在我们道路上的陷阱之后，今天我们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我们划定边界是为了更好地消灭边界。我们扫清了团结道路上的障碍。我们以远大的眼光代替了狭隘的感情冲动，以共同的活生生的现实代替了人为的困难，从而按照我们时代的要求和谐相处。干劲得到了解放，思想也纯洁了。我们坚持已下定的决心，以我们的祖先为榜样，怀着完成更伟大的事业的雄心，全力以赴去从事我们的建设事业。

我们的革命是真正的革命，它的原则是从众所周知的牺牲精神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场真正属于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表达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愿望。正如过去革命鼓舞他们为解放祖国而进

行战斗，今天，革命仍然是他们在国内建设中的行动准则，也是他们支持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准则。

1965年6月19日的革命整顿证实了阿尔及利亚是信守这些原则的，这些原则是符合阿尔及利亚同其他兄弟国家的关系的，而今天这些原则正在铺设国与国之间进行富有成果的合作道路。

这一整顿又一次肯定了我们对于不干涉内政、尊重适合各国情况的抉择和经验的的原则，我们意识到，安宁和稳定是进行合作和建立真正光荣的理想的两个基本条件。

我们在您身上和尊贵的摩洛哥人民身上发现了同样的精神和意志。我们之所以宁愿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稳步前进，是为了在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的道路上能确实掌握成功的条件。

这就是我们在兄弟般的会谈中提出这些倡议的目的，我们的会谈是基于彼此间的信任、诚挚的愿望、为阿拉伯马格里布利益而采取行动的决心和献身精神。在历史上，我们曾多次形成一个国家，或者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两个部分。在这一次解放斗争中我们虽然没有组成一个国家，但并不因此我们就不是同一个民族。您曾经是在您已故的父亲穆罕默德五世陛下身边对我们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一位有力的支持者。在1955年8月20日牺牲的阿尔及利亚烈士们，也是我们两国人民在他们的解放斗争和未来的共同建设中兄弟团结的象征。

我们今天正在继续这一共同事业，为未来打下基础。

这是我们后代寄厚望于我们的、我们最为关注的事业。当前世界各地力求达到的首要目标就是重新组织经济，它的特点是协调的合作，目的是相辅相成地共同实现完全的统一。在这方面，伟大的加拉·杰比来计划就是我们建造这座正在建设中的雄伟大厦的一个重要阶段。

两国人民过去在他们的共同战斗中建立的团结合作使得一方的问题也成了另一方的问题，那么，今天，在为恢复摩洛哥至今还处在殖民统治下的领土主权的斗争中，有没有必要重申我们同兄弟的摩洛哥的团结合作呢？

对于那迄今还带着殖民地名称的撒哈拉，现在是我们实行在努阿齐布确定的解放政策的时候了。

三年前，我们同兄弟国家突尼斯改变了过去那种消极状态，同突尼斯人民和他们的尊敬的领袖布尔吉巴总统建立了新的富有成果的合作气氛。阿拉伯马格里布人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朝着实现他们最深切的愿望的道路上前进的。

虽然阿拉伯世界在这个六月份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我们仍然要再一次重申，马格里布的建设将有助于加强阿拉伯民族，阿拉伯民族在解放和发展的斗争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团结、协调和共同努力。

这一地区的合作将成为建设非洲大陆的基石。这是一种没有任何依赖关系、条约关系和盟约关系的合作。这是在各个领域里的共同事业。对我们马格里布来说，这是为了它的人民的利益，为了这一地区的繁荣和全人类的幸福而实现雄心壮志和有效合作的推动力量。这也



将成为解决类似问题以及任何发展问题的范例。

为使这种努力遍及整个非洲，并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参加国民服务制的阿尔及利亚青年现在正在实现一项有利于整个撒哈拉地区非洲人民的接触和贸易的伟大计划。这就是一条横贯撒哈拉的公路，我们理所当然地要把这条公路命名为“非洲统一公路”。

.....

译自《非洲革命》第 435 期，1972 年 6 月 23—29 日

## 在市镇人民议会主席第七次全国 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布迈丁在1973年2月召开的市镇人民议会主席第七次全国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着重说明了土地革命第一阶段取得的成果和有关第二阶段等问题。摘译如下。

市镇人民议会主席兄弟们！

如今我们每年在此集会一次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了，而本月份则是第一次在此举行市镇人民议会。这种集会，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借以培养干部、工作人员以及基层管理者的讨论会。这也为你们提供一个交换意见和交流经验的机会，并把最高级负责人可能还不曾注意到的有关你们的某些困难向政权机构反映。因此，你们在这里集会是为了陈述或提出建议——总的说来，旨在解决公民们所关心的某些问题。

.....

我们曾有机会着重指出，明天的阿尔及利亚是市镇人民议会的阿尔及利亚，这种市镇人民议会将使革命具备坚实的基层，通过人民群众实际参加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他们本身事务的管理，必将体现出民

主政治和地方分权政策的真正形式。

.....

土地革命和农村发展既是你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课题，因而我们决定让当选的议会和地方当局负起他们的责任来。

我们曾在这同一地方申述过，6月19日复兴后采取的政策，一直是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的：即建立负责的组织，使所有公民得以参加各级组织。去年，我本人曾在这个讲坛上代表革命委员会和政府说过，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加强军区和市镇的权力，这是历史性的伟大责任。因为，军区级和市镇级还是第一次处理这样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使他们的日常工作打破了常规。土地革命这一新的战斗，不论在经济、社会或其它各方面，必将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

我感到特别高兴，得悉你们今年这次会议是在进行土地革命和发展农业的情况下举行的。回顾去年我们还只能提出土地革命的原则和目标，而目前这场新的革命则是在为实现这些原则和目标而努力。

尽管过去有些人因对文件有所误解而表现出某种担心，但现在，在土地革命实行了一年之后，我相信，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对文件进行了多次解释，并通过成立几百个合作社来贯彻实行土地革命宪章，这些就是在一年内所发生的事件，它们有助于在全国范围内创造出一种新的气氛，并必将为促进下一阶段的工作实施而奠定新的基础。

.....

如果我给第一阶段下一个结论的话，我可以肯定地说：尽管第一阶段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成绩还是巨大的。如果去年我们还有一些怀疑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必须动员起来，做好第二阶段的工作。这第二阶段正如第一阶段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第二阶段已经顺利地进行了土地调查，确定土地所有者名单，以及分发受益者证书等工作。

第二阶段工作既细致又重要，它要求采用今年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以避免那些可能犯的错误。

今天我们公民中的绝大多数都相信土地革命，把土地革命看作是一项紧迫而必要的措施。连那些受到这一新措施影响的公民，也正确地认识到，这是一个为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和社会的利益应该实施的全国性的宪章。

各市镇人民议会主席都得考虑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土地革命宪章的实施问题。如果切实地实施这一宪章，既不忽视所有者的利益，也不忽视社会的利益，那么这些实施是不成问题的。因此，在确定土地所有者的名单和限制所有权时，都应该严格地坚持不偏不倚的客观性。

.....

在开始实施土地革命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认为就下列几点作一说明是必要的。

独立之后，我们已经看到正在出现一个迅速走向富裕、繁荣的过程，因而有些公民甚至忘记了还得完成一项神圣的职责，那就是确保革命的持续性。

依靠全体公民，特别是他们从6月19日复兴运动以

来继续不断的努力，我们今天才能阐明目前已成为我们国家根本属性的这一革命的复兴事业。事实上，土地革命只是革命复兴事业本身的一个主要方面。因为任何革命如果不是日新月异，那就必然会趋于灭亡。

这项战斗任务并不仅仅限于把几公顷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或者在这里那里建立起哪怕是数以千计甚至更多的农村，也不限于对农民仅仅发放一点补助金，而是一项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任务，它已超越了物质的方面，它最终是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市镇一级工作的成败要由各市镇人民议会主席来负责。只要还存在着一些服务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就应该对这些合作社的发展予以充分的注意和必要的支援，因为这些合作社正是市镇将用以克服下一阶段困难的重要的工具……

我要讲的第二点是关于发展问题。……

我们学会了怎样在一起检查我们的问题，并且共同寻求一项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只能是依靠我们自己——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和依靠本国所掌握的资源。

此外，如果我们想研究和谈论一下政治——关于解放运动、世界上的冲突、反帝斗争以及巴勒斯坦的解放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认为，要想有一个卓有成效的对外政策，在国内就得呈现一派健全的形势，这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既不向外伸手也不诉诸武力威胁，我们自己应该拥有强大的经济。因为这些办法都是同阿尔及利亚的政策不相容的。从事国内的发展工作，必然导致我们奉

行极其明确的对外政策，就是对待那些在世界各地为争取自由或实现正义事业而发生的冲突也是如此。因此，发展应该一直作为我们的准则。

我们采用这个准则，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若干年以来，甚至远在独立之前，我们就已经采用了。我们宣布过：阿尔及利亚的未来取决于它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表示担心，可能进入使我们忘记这一现实的阶段。我们认为，值得令人尊敬的国家，就是成功地解决发展问题的国家。

但是在不发达状态中挣扎的国家是注定要在永久的依赖状态中生活的，因为它始终不得不依赖外国贷款的援助，来行使它的行政机构的职能、建设学校、道路以及其它项目，同时就冒着对它可能施加种种压力的风险。

至于我们，我们是选择了民族独立的政策，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获得解放并享有充分而完全的主权。它可以向任何国家——哪怕是大国也好——用明确而毫不含糊的方式发表它的意见，按照自己的抉择而采取各种态度，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

每一个人应当把发展问题作为一个根本问题来看待。

.....

我们认为，发展是一种政策，政策就是发展。如果我们在这方面获得成功，那么其余各种问题都将变成次要的了。

过去，世界被划分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集团——请你们原谅我暂时撇开市镇问题——但今天的现

实绝不是这么一回事。事情已经起了变化，现实世界被划分为富国和穷国，而我们是属于穷国世界，这就是事实。因为世界上既不存在光是以某种意识形态的名义提供款项以帮助劳动群众；也不存在以某种自由主义或某种资本主义的名义，慷慨解囊，以帮助自由经济的发展的国家。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各人都因谋求自身利益而造成剧烈危险的冲突。

我们有一些朋友，我们了解他们，他们也了解我们，但是，我们各自都有需要关注的事情：应当为儿童设立学校，为病人设立医院，为市镇和偏僻的小村庄建立发展起来的都市中心和交通网，为我们的学生创办大学，为我们的工人建设工厂。

我们的政策也正是从那些理想中产生的。因此，我们一定要赢得这一场发展的战斗，我们的成功对第三世界各国、非洲大陆和世界其它地区来说，必将成为一个先例。当然，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表示某种立场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发展问题的解决却需要行动，需要各级领导者和负责人具有信心、意志和决心。

解决发展问题也要求把一切潜在的物力、人力和技术力量统统动员起来。因此，必须把这些条件全部结合在一起。而这正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发展”应该对谁有利？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是十分明确的。发展不是为剥削者阶层服务的，发展首先应该有利于人民和劳动群众。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既没有虚张声势也没有大肆宣传地在进行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每天都在跨过新的阶段，

使新的目标具体化。因此,我们认为,发展应当为劳动群众服务。

.....

我们独立已经十年了。我们曾几次提到我们的市镇已经存在七年了。如同去年一样,今年我们国家仍然处在土地革命的气氛中;与此同时,已经作出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有关劳动者利益的决议,例如企业的社会主义管理章程。

今年也是四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和下一个发展计划第一年度的前夕,因此,在这一年,就得准备好这个规模庞大的未来计划。此外,这个计划正第一次按照地方分权政策的原则基础在进行。

一些重要的事件过去了,新的事件正在酝酿之中。每一个阶段都应当由一个相应的组织来巩固它,这个组织不仅要同新阶段的要求相适应,而且还得同新阶段协调一致。这样才能保证我们革命的持续性,才能达到我国一百五十万优秀儿女不惜作出最大牺牲而为之奋斗的所有目标。最后,我祝贺你们的工作圆满成功。

译自《圣战者报》,1973年2月15日



## 接见意大利电视广播记者时的谈话

1973年4月，布迈丁接见意大利电视广播记者时，在国际问题方面着重谈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地中海以及与欧洲、法国、美国的关系问题。以下是谈话中有关这一部分的节译。

关于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有许多话要讲，我准备在可能范围内就阿尔及利亚对这个既重大又严重的问题的观点，作一简要的阐明。

最近几年、特别是1967年失败以来，流传着这样的谣言，说阿尔及利亚的立场是过激主义者的立场。事实上这一立场并没有任何过激主义，因为它来自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从古今历史中所吸取的教训。

我们重申，伟大的事业总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它关系到被一些占领这个地区的外来移民所赶出自己国家的人民的问题，这些移民来自世界各地：有西方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有美洲和地球上其他地区的。他们利用暴力和恐怖活动，硬要住在这里，建设他们的所谓以色列国。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并且得到许多国际机构的援助。

我们认为，以色列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第三世界

各国在当前这个时代都曾饱受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祸害。事实上，这是牵涉到一个巨大的武装侵略基地的问题，这个基地就是为了在维护国际资本主义垄断集团利益中发挥重大作用。人们不能把以色列问题同石油问题割裂开来，因为阿拉伯地区拥有巨大石油财富，是世界能源的主要部分。根据这一点，在当前，特别是在越南问题的巴黎协议之后，对于在中东进行的这场斗争的真正性质，我们是十分清楚的。

今天，局势紧张的地区在哪里呢？前一个时期是在德国，后来是世界上其他地区。最近一个时期是在越南。而今天，我们看到，最紧张的地区，即国际斗争最尖锐的地区，是在中东。

我认为：巴勒斯坦人民收回他们祖国的各种权利和主权的唯一道路，是武装斗争。这也是阿拉伯国家收复被占领的土地不能不采取的唯一办法，别的办法是没有的。因为任何其他解决办法，或者可能是来自美国，或者是来自苏联或某一欧洲国家，都不是阿拉伯的解决办法，也根本不符合阿拉伯人的愿望。这就是根据我们的过去和我们自己的经验所作出的分析。

在我们看来，当前的问题不是阿拉伯统一的问题，而是解放的问题……阿拉伯领土的解放和巴勒斯坦人民收复被剥夺的权力的问题。

共同斗争是通往阿拉伯统一的道路，这场斗争的实质并不在于进行几次简单的协商或达成几项政治协议。其实，在中东适用的，在马格里布也同样适用，虽然阿拉伯马格里布的形势与阿拉伯东部的形势完全不同。我们

所讲的马格里布,把它看作是阿拉伯祖国的组成部分,但实现这种统一却有赖于某些特定的条件。

正因为这样的理由,我们选择了下面所说的道路,这是一条经过几个阶段才能实现统一的道路,这是合乎情理的道路,而不是大肆叫嚷和逃避现实的道路,因为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阿拉伯祖国一般需要具备的政治现实。

作为关心局势稳定的人民,我们已经不断地发出号召并进行工作,以便使地中海成为一个和平与安全之湖,因为,如果在我们生活的整个地区不能实现普遍和平的话,任何真正的进步和合作都将是一句空话。正因为这样,在我们看来,我们不能把外国舰队的出现看作是安全的因素,不如说这是对这个地区应有的和平的一种威胁……我这里所指的是地中海的西部。

恢复真正安全的条件之一就是外国舰队撤出。具备了这个条件,就能使我们建立一种有效合作的基础,我的意思是,地中海两岸在经济、技术、科学和文化各方面都能进行合作。

我借此机会对欧洲国家说几句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势已经大变。目前,在地中海北岸有西方国家,在地中海南岸是阿拉伯国家。这是一个需要反复思考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在地中海两岸,也就是说,在以非洲的阿拉伯国家为一方和以欧洲国家为另一方,如果没有真正的了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

我们不但主张撤离舰队,还主张撤出军事基地,特别是因为大国之间签订了和平共处的协议,这些基地已不

象以前那样重要了。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赞成进行各种会谈，其目的在于有益地和卓有成效地商定一个起码的协议，即一方面撤离外国舰队，另一方面撤销外国基地。这样就能够在这些邻国或者地中海沿海国家之间，扎实地奠定持久合作的基础。

关于苏联在阿尔及利亚的基地问题，我们建议你们到阿尔及利亚作一次旅行，我们提供费用，以便你们能去看看这些所谓基地所在的地区。这就是我对那些说法所作的回答。

阿尔及利亚和意大利之间敷设一条天然气管道，主要要由意大利人来决定。所以要由你们向有关机构提出。

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出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我们完全赞同实施这方面的任何计划，因为这样的计划在阿尔及利亚和意大利，或者在阿尔及利亚和其他所有欧洲国家之间，在人们能称之为了一项卓有成效的合作中，确是体现了一种真实的关系。

阿法关系经历了很多变化，出现过种种危机。最后的危机便是石油危机。今天，两国关系是正常的，我们认为在我们两国间维持正常关系是符合最确实可靠利益的，因为我们相信，最重要的一点莫过于建立在共同利益上的一种合作，这种看法指引并支配着我们同法国的关系。关于法国对于阿拉伯问题的立场，可以说是这样，一方面是官方的立场，另一方面是法国社会内部所存在的一种压力。如果说，法国官方立场的特点是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了解阿拉伯问题——我且不说对阿拉伯事业真

正支持，那么，在法国社会内部恰好相反，却存在着一些为以色列利益效力的势力。

法国对阿拉伯人的立场，和其他欧洲国家并没有多大的不同。欧洲在阿拉伯地区具有利益，但照我们的看法，这个大陆推行的却是支持和赞助以色列的政策。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项好的政策，实际上，它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未来的前景、也不符合这个地区历史演变的，因为，尽管人们过去或现在都可能为以色列提供物质力量，但是这对以色列来说，从来不可能、明天或在遥远的将来也永远不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人，是空间。

关于法国的立场，它作为欧洲国家，以及近来欧洲所发生明显的政治变化，我们所要讲的就是这些。

我们的国际政策是从我们要实现民族独立这一观念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试图改变我们的国际关系，扩大到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欧洲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的国际关系的多样化，就是要保证和巩固民族独立。这种多样化关系进而必须使不结盟政策具体化，并赋予现实的内容。

至于我们同欧洲国家和共同市场的关系，我们不妨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国家和这个经济组织本身。对于发展中的国家，欧洲共同市场事实上采取了什么政策呢？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参加欧洲共同市场的国家在当前结合起来，为保卫自身特殊利益而不顾第三世界呢，还是兼顾第三世界国家利益、特别是阿尔及利亚的利益准备推行一种经济平衡政策？

正是根据欧洲共同市场对这个问题将要作出的回答,阿尔及利亚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全体发展中的国家,可以对欧洲共同市场确定自己的立场。

过去我们曾经进行过反对直接的殖民主义的残酷战斗,显然,我们永远也不会接受把另一种新型的殖民主义强加给我们。

我们是一个向全世界开放的国家,无论从地理上或从历史上来说,欧洲是同我们最接近的大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曾经在许多世代并且在历史上同这个大陆始终保持不断的联系。

关于美国,我们目前同这个国家的关系纯粹是贸易往来。我们已经说过,我们要再一次申明:阿尔及利亚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企图统治世界某些地区的这种政策。

人们今天在独立十年以后所能汲取的教益是:阿尔及利亚人民渴望自由和自主地生活。为此,阿尔及利亚人民必须依靠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力量。我们相信,他们一定能够把他们的力量动员起来做到这一点,以便为他们——作为社会集体的事业服务。阿尔及利亚作为自由国家在开始的短时期内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仅仅是个开端。我们要全力以赴在我们国家建立真正的正义事业,为有朝一日在我国呈现出繁荣、正直和平等而努力工作。既然在这十年中我们已经取得了成绩,既然已经解决过去殖民者遗留下来的和独立以后所面临的问题,那么要做到上述几点是完全可能的事。

面对着未来,我们现在比过去武装得更好。阿尔及利亚的经验是当前第三世界从实践中所取得的经验的一部

分。此外,我们深信,如果说过去我们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已经取得胜利,那么,阿尔及利亚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也必将取得胜利。我们所进行的战斗,同样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战果辉煌的战斗的一部分,这场战斗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和平、正义和繁荣。

译自《圣战者报》,1973年4月15—16日

## 在第四次圣战者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73年5月，布迈丁在第四次圣战者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除谈到阿尔及利亚军队过去的作用和当前的责任、号召参加民族解放阵线党外，着重阐明有关中东、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问题。以下是有关国际问题部分的节译。

.....

圣战者兄弟们！

你们应当考虑：你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如果认为任务已经到此结束，那就是一种背叛。我们认为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要时刻想着：我们还没有完全履行我们的义务。阿尔及利亚的战斗正如我先前讲过的那样，要把战斗的范围扩大，因为，我们只要回顾一下过去的历史和当代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阿尔及利亚所发生的事情和我们周围其它远近地区所发生的一切都有连带关系。

1954年，当阿尔及利亚发动武装斗争的时候，法国殖民主义的形势又是怎样的呢？

在阿尔及利亚发动革命之前，突尼斯和摩洛哥已经发生了一些事变。阿尔及利亚的这次革命是全面的、具



有普遍性的，和法国殖民主义所熟悉的历次革命，即局部性的革命完全不同。那么殖民主义是怎样对付的呢？它的对付办法是试图孤立阿尔及利亚的革命，也就是：殖民主义先是平定了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局势，然后专心致志地来扑灭已在阿尔及利亚诞生的革命风暴。

与此同时，或几年之后，当非洲的殖民地开始行动的时候，殖民主义则在事变发生之前就急急忙忙地给予这些殖民地以完全独立或内部自治，其唯一目的在于保全它赖以生存的堡垒——最后一个坍塌的堡垒。这个最后的堡垒不是别的，就是阿尔及利亚。殖民主义原来企图把它变为自己的堡垒，可是由于阿尔及利亚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个殖民主义堡垒很快就变成了自由的堡垒。世界上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都有权向这个自由的堡垒提出援助的要求。

今天，我们在非洲和其他地方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对于非洲的解放运动，对越南、柬埔寨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为了清算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统治和帝国主义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尽我们国家和革命应尽的责任。

我们还有别的作用，那就是对阿拉伯事业和巴勒斯坦人民的神圣责任。巴勒斯坦人民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被赶了出来，并且继续到处受到追击。同时，巴勒斯坦人民又是一个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想杀害的对象。

今天屠杀巴勒斯坦人的不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且还有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屠杀他们。巴勒斯坦人吃阿拉伯人的苦头比吃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苦

头要大得多，我们今天说这句话真感到非常痛心。巴勒斯坦人被阿拉伯人亲手杀死，而且还借口说是要保卫国家主权和内部安全，这对阿拉伯民族来说，真是莫大的耻辱。

当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行使其合法权利为口实对一个阿拉伯国家发动侵略的时候，最奇怪的事莫过于反击的矛头不是指向犹太复国主义者，而是指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飞机一般只在袭击难民营时才升空炫耀一番。

有一支属于侯赛因的军队，外国报纸曾赞扬过它的勇敢，但他的英雄主义并不表现在反对掠夺成性的敌人方面，而表现在反对巴勒斯坦人民。

……

然而，使我们感到大为吃惊的，倒不是外国人的态度，而是阿拉伯人的态度。

以色列之所以取得胜利，并不是由于它的力量特别强大，而是由于阿拉伯世界不论在武装力量方面还是在各国政府方面都陷于混乱状态。其实，以色列之所以有力量，是由于阿拉伯人在各方面都存在着弱点。

阿拉伯世界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收入，但它所缺乏的却是当机立断的机智和勇敢。

我在五·一节说过，我们曾被指责为集中全力搞国家建设。起初，我们对此不予理会，然而他们却硬要来质问我们。难道搞国家建设现在也构成了一种罪名或者过错吗？作几次演说，以激起从大西洋到海湾的阿拉伯民族的高昂热情，这样就能对付得了以色列吗？不！暴力

只能用暴力去对付。正义的事业唯有通过铁的决心和不可估量的牺牲才能取得胜利。

我们对于巴勒斯坦人民的必胜抱有信心。不仅是经历过艰苦的解放战争的圣战者这一代，而且是未来的一代，对于巴勒斯坦人民迟早会取得胜利也始终是坚信不疑的，他们相信巴勒斯坦人民也象经受过一个半世纪的苦难和牺牲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一样，最后一定取得胜利。

这就是我们对巴勒斯坦事业的看法。那些想要把巴勒斯坦事业拿来作交易的人是枉费心机！至于我们，我们永远不会参与对这种神圣事业的任何政治交易。有人竟想利用政治交易作为取得政权的手段，那就让他们踩着为巴勒斯坦事业而牺牲的烈士的尸体去登上宝座吧！我们国家的政权是在同法国殖民主义进行真正的斗争中形成的。

我们听到这样一些说法和宣传，有人借口要阿拉伯人采取集体行动，借口保卫把国家建立在穆斯林和基督教社会上的已经衰弱了的黎巴嫩，或者借口要保全叙利亚、埃及或约旦留下的土地，但我们的政策不会受到任何外来影响，它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我们拒不接受这一切。我们唯一能接受的是，动员阿拉伯所有潜在的人力、物力投入真正的战斗，以恢复阿拉伯人的尊严。这就是阿拉伯问题唯一的光荣的解决办法。

光荣的解决办法完全不是来自外部，它必然要从阿拉伯人自身的力量中取得。关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兄弟和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现在还有分歧。这种情况在一

个真正的战士看来不应成为一种讨价还价的理由。同样,通过上述这一态度的阐明,我们并不想要争取什么领导地位,因为我们所要关心自己国家的事已经够多的了,我们专心致力于解决在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

阿拉伯民族今天处于十字路口。对我们来说,巴勒斯坦问题可能成为破坏整个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的导火线,因为要我同那些沾满巴勒斯坦人鲜血的阿拉伯人去握手是很困难的。作为圣战者,要我们向那些挑起兄弟之间流血冲突的人伸出手来那就更加办不到了。因为我们总是想起当初我们为了恢复自由而流的纯洁的鲜血,对此,我们这一代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

我们也曾指出,把希望寄托在来自外部的解决办法,只不过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到今天,时间已过去六年,以色列还是平安无事地占据着西奈、戈兰和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领土,并把我们在耶路撒冷的伊斯兰圣地重新变为犹太人教堂,从而证明希伯来“国家”具有种族的和排外的性质。

更严重的是,以色列甚至可以任意进攻阿拉伯人的首都,例如昨天发生的贝鲁特事件就是这样。以色列人在那里进出就象一个赶集的人只担心万一遇到拦路抢劫的盗贼。以色列人侵入贝鲁特,杀人、伤人、大肆屠杀,然后扬长而去。

那时,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海市蜃楼”式、“猎人”式和“鬼怪”式的飞机。

亲爱的同胞们!

这就是阿拉伯民族目前的痛苦处境。从理论上说，只有两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是投降的道路，我们如果已经失去斗争和恢复我们的尊严的一切愿望，那么要付出的代价将不仅仅是丧失阿拉伯人的领土。而且更严重的是，巴勒斯坦事业也将会被牺牲掉，我们民族的生存也将受到损害。

——第二条道路是光荣和尊严的道路。要付出极大的牺牲代价。然而这是摆在阿拉伯民族面前唯一的解决办法。

我们老实说，以色列并不是一个象人们所想象那样可怕、不可制服的吃人魔鬼，我们还敢于重复这句话：我们可以肯定，以色列之所以有力量，是由于阿拉伯人的软弱和内部的混乱。

倘若阿拉伯人果真能够发掘曾被西方发掘过的阿拉伯民族所蕴藏的巨大潜力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们能够成功地彻底改变这一地区的面貌，使它成为真正的天堂。

我们的收回全国财富的政策就是由此而来的，我们对于这些财富的开发历来非常重视，这样会有利于阿拉伯民族的发展和强盛，并且有利于造就新型的阿拉伯人。

不幸的是，阿拉伯人的财富并不是为了阿拉伯人的利益而开发，阿拉伯人的财富流入一些外国首都，为大家所利用，唯独阿拉伯人没有份。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胜利？怎么能够得到蓬勃发展和进步？

.....

今天我们阐述巴勒斯坦问题，正如我们以往讲过的越南问题一样，都是本着这样一个信念：我们是全世界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尽管有人散布流言蜚语，指责我们谈论越南问题比谈论阿拉伯问题多。

越南人进行了这一场战争。以奠边府战役的胜利结束了战争的第一阶段，这也正象阿尔及利亚人民经过艰苦斗争在1962年胜利完成第一阶段一样，1962年胜利给法国人在政治和经济上造成的后果要比奠边府战役的后果严重得多，这是因为阿尔及利亚武装力量和法国进行过一次决战，最后把他们赶回老家去了。

正因为我们是这样来理解全世界解放运动的意义和内容的，所以才想到非洲的解放事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优先考虑这个或那个事业，尽管有人说，阿尔及利亚的政策与其说是阿拉伯的政策还不如说是非洲的政策。

我们相信阿拉伯主义。不论在什么场合，时机是否具备，我们都不厌其烦地重申我们的阿拉伯主义。我们同样深信：敌人只有一个，殖民主义者只有一个，反对殖民主义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同反对在非洲的殖民主义的斗争是一致的。

我们也对非洲的兄弟们十分坦率地说过，我们对他们的做法很不理解。他们既然和以色列这样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那又怎么可能同时对葡萄牙殖民主义和南非种族主义制度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呢？我们今天只能采取这种态度——一方面反对他们这种做法，另一方面则要求在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立场上取得一致。

亲爱的同胞们！

我在这篇讲话中曾经特别着重讲阿拉伯马科雷克问题，因为这是今天世界纷争的焦点。现在，越南问题正在走上解决的道路，尽管那里的战斗尚未完全停止。阿拉伯马科雷克地区所以成为世界纷争的焦点，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巴勒斯坦事件；二是由于能源问题。以色列扮演了石油保护者的角色，替那些世界性的公司效劳，于是资本主义国家便相应地负责保护以色列。

西方国家——一般是指美国和其它国家——相信，他们在这个地区只有一个朋友、一个真诚的同盟者，那就是以色列。对欧洲人来说，这个地区的所有其它国家，不论是被称为进步的或反动的国家，都是不折不扣的进行投机的工具。所以要在西方国家的行列中寻求一个真诚的同盟者一起去反对搞移民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是不可能的。

此外，你们大家都注意到，以色列在各方面——不论在财政上、技术上还是在情报上——都得到了大量的多种形式的支援。这件事情只能证明，以色列乃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这个地区的前哨——保障它们利益的前哨，而它们也对以色列给予保护和支援。这一前哨制造了持久的紧张局势，其目的在于使各阿拉伯国家精疲力竭，并给它们制造种种麻烦和问题。

我对这个问题之所以讲得较多，因为这对阿拉伯民族和世界和平不论就广度或深度来说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我们希望阿拉伯世界的各兄弟负责人能充分理解这一点。

今天我对你们描绘的图景虽然暗淡，但我们对光荣前途仍然满怀信心，正义的事业总是要取得胜利的。

译自《圣战者报》，1973年5月9日



## 在庆祝土地革命全国日 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布迈丁于1973年6月17日在庆祝土地革命全国日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在谈到城乡、工农、知识分子和士兵之间团结的新气象之后，重申土地革命的意义，着重阐明土地革命第二阶段的政策方针等。以下是讲话的节译。

.....

6月17日，这个日子将用金光闪闪的文字写入我国史册。这一天，就象11月1日、7月5日和6月19日一样，可以列为新阿尔及利亚值得纪念的日子之一，它使革命重新走上真正的道路。同时，也让阿尔及利亚农村，和我们今天在这个小城市艾因—优素福一样度过这些现在已成了历史性的日子。我敢断言，革命不再是一个梦想，也不再是空洞的口号或者单纯的文件，在今天，它已成为具体的现实。

我高兴地以你们的名义向所有土地革命的合作社主席，向来自我国西部各地区的那些在土地革命第一阶段中的受益者致敬，在这值得纪念的时刻，让我们一起生活，团聚一堂，凝成一体，在农民、工人、知识青年和士兵之间

达到真正的和谐。难道这不是人民和革命的真实表现吗？

.....

所有这些决议都是阿尔及利亚革命取得的辉煌胜利。就在去年的今天，我们曾在阿尔及尔军区克米斯—赫什纳举行过给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分发第一批土地所有权证书的庆祝仪式。今天，6月17日，正是土地革命开始实行的纪念日，我们在艾因—优素福庆祝这一伟大事业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这个阶段是在比去年更为有利更为明确的条件下实行的。

也是在去年，更确切地说是在去年8月，我们曾为第一批上千的社会主义村庄奠定了初步基础，这种村庄将在阿尔及利亚乡间到处建立起来。

.....

目前，艾因—奈哈拉就是代表着未来，它不止是象征性的。今天早晨，我们所以感到格外愉快和满意，因为我们作为革命的负责人和忠诚的战士，认为这就是一种补偿。面对着到处涌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成果——这些现在专为我们的劳动群众利益服务的成果，我们更加感到高兴。

亲爱的同胞们！

阿尔及利亚革命经历了既是历史性也是值得纪念的时刻。对于城市公民的志愿队下乡帮助农民建立新的村庄或者开垦土地的气象，我们感到高兴。城乡之间的这种相互交流、彼此鼓动和团结一致的新气象，确实是一种革命气象，应该进一步加以发扬，以期在全体公民中达到有

效的全面的团结。这样做可以缔造一个合理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城市将不会在损害农村的情况下求得发展，一部分公民将不会在损害阿尔及利亚全体人民的情况下去享受物质文明。

我国革命政策所有这些目标今天正在具体化，这要归功于大家对我们人民的命运、对我们祖国的转变有信心，对建设一个铲除了一切形式的剥削的、真正社会主义社会有信心，这是一个决不容许新的特权阶级存在的社会。

由于从殖民主义踏上我国的土地时起直到取得独立为止，阿尔及利亚人民就展开了艰苦的斗争，承担了最重大的牺牲。因此，现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不能忍受剥削了。

革命政权所采取的措施，不论是在工业或在社会、文化方面，都光辉地证明了我们所贯彻执行的这条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近几年来，我们经常有机会着重说明这一政策，今天通过真正的文化高潮已使这一政策具体化了。仅在几天以前，我们在阿尔及尔庆祝了一所新的大学的诞生，这就是一项旨在制定为农村服务的文化革命的政策。

土地革命发动以来已经一年，今天我们可以肯定，这一事业正在切合实际的道路上前进。凡是愿意深入了解的人，对今后的发展是会看得一清二楚的。至于那些不愿意探索这次新的革命意义的人，应该说，只因他们缺乏信心，因此他们不愿意去了解。

我们曾多次申明，特别是在庆祝五·一节时讲到，土

地属于种田的人，不属于那些只是从城里通过电话来遥控的人。

既然我们已经进入土地革命的第二阶段，就应该重申，这个革命意味着对所有权的限制。凡是占有多余土地的人，应该把这些土地让给他的兄弟，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里佃农仅分到二成的制度早已断然废除了。因此，一切拥有土地的人都应同他的家庭成员一起在土地上亲自参加劳动。所有者不能亲自劳动的那块多余土地应归还国家，由国家分配给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

这是我们政策的第一个原则。而第二个原则规定，凡是抛弃土地的人就要被土地所抛弃。对于那些不需要土地的人，对于那些经商或有其它收入足以生活的人，我们为什么要让他做土地所有者呢？这样做不是为了保障他的生活，因为他已另有收入，从国家财富中获得收益。因此这种人应该把他所不需要的土地让给别人。

对公务人员来说也是一样，他已有一笔可观而足够的收入，在他看来，应该为了别人的利益放弃他的土地。因此，所有不在自己土地上亲自参加劳动经常外出的人都应当把他的土地让给贫苦农民。

当然，我们不必谈论只拥有几公顷土地的小农，因为法律条款没有涉及这些人，但却涉及到那些有着可观收入的而又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从农村里取得收入的人应该仍然留在农村里。其余的阿尔及利亚人，则从国营工厂以及从全国广泛的商业活动中取得收益。居住在农村的那些人也是阿尔及利亚人。

阿尔及利亚是一切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这

便是我们革命的政策和哲学，也是土地革命的哲学。过去，当敌人在各方面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论贫富都经受这种考验。不管是牧民还是佃农，过去既不经商也不拥有土地，更休想有朝一日会成为省长或部长了，但他们都成了革命的先锋。我讲这些话不是偶然的发挥，而是实际情况。我们曾和牧民们生活在一起，这些牧民当过兵，他们为革命、为祖国作出了牺牲，由于他们才使我们过着自由和幸福的生活。

今天是结束剥削的时候了，土地革命的最高目标就是结束剥削。我曾在各种不同场合讲过，土地革命这一事业并不是一种对富人的报复行动；同样，我们也曾讲过，土地革命意味着社会正义的实现。换句话说，一切阿尔及利亚人都应当享受独立的好处。因此，土地革命并不是对某一特定部分的人进行报复的问题，而是一项总政策的实施，也是为了实行有利于全体公民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正义。

因此，关于限制土地的第二个原则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每个人应该亲自在他的土地上劳动，那些外出的人的土地应由国家收回，以便分配给贫苦农民。国家不占有任何土地，这只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的原则，不然的话，国家就将名不副实。

这就是土地革命的真正含义和深远意义。国家有权利收回土地，同时也有义务对已经实施国有化的土地给以补偿。由此可以看出，土地革命的这一新阶段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以致要求把一切赞成土地革命的人全都动员起来。

因此我们发出“拥护或者反对土地革命”的口号，这就是说，是赞成土地革命还是反对土地革命。我认为：凡是拥护土地革命的人，就是拥护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人；凡是反对土地革命的人，归根到底就是反对阿尔及利亚的人，这种人只能是人民的敌人和人民最高利益的敌人。

在土地革命开始进入这一重要阶段的时刻，应当说，这个阶段不是容易渡过的。但是同时也应肯定，它是可以理解为一场特别宏伟的阿尔及利亚革命。这个革命已经战胜了殖民主义，摆脱了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匮乏，殖民主义者曾经自信：在他们离开后的第二天，阿尔及利亚就会陷入混乱状态，这样他们将卷土重来，然而我们国家终于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了。凭着革命的才智，我们进行了石油战和收回国家财富的战斗，并且已赢得了这场战斗。

今天，阿尔及利亚正在展开一场土地革命的战斗，为的是要改变农村的面貌。只要把一切对革命转变有信心的人，把坚决相信我们人民所面临的问题是能够在一次真正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求得解决的人，全部动员起来，我们的革命必将在另一场战斗中夺取胜利。

因此，我首先要对与此有关的全体农民发出号召，号召他们提高觉悟，号召他们当独立的阳光开始在他们身上照耀的时候，要善于掌握这一历史性的契机。

我也要代表革命政权对全体工人发出号召，号召他们确保同劳动阶级的组成部份的农民兄弟的真正团结，希望工人彻底了解，他们的命运是和农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工农决不能分离。

最后,我还要对知识青年讲几句话,他们代表着民族的未来,由于他们的纯洁,由于他们既有革命的热情又有革命的意志,因而形成了一种会把革命发扬光大的力量。对于青年,我要说,当前正是一个历史性的大好机会,正是领导阶级——其实,学生不正是明天的领导者吗?——和未来的负责人、和工农组成的劳动群众之间相互学习、互相结合的历史性的的大好机会。

祝你们工作圆满成功。

译自《圣战者报》，1973年6月18日

## 在6月19日复兴运动八周年 纪念会上的讲话

1973年，布迈丁在6月19日复兴运动八周年纪念会上向国家干部、工会干部发表讲话，提出在城市要和农村一样开展革命运动，以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为中心内容，说阿尔及利亚革命应该建立在工业革命、土地革命和文化革命三大支柱上。节译如下。

.....

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意义特别重大，理由也不止一个。会议选择在工会会址召开本身就是确认和肯定我们过去通过的一个原则，后来又在总工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强调过的那个原则，即劳动群众是政权的组成部分。我们有责任澄清这一点，因为近几年来以及工会领导初期，工人们曾自认为是政权的局外人。

的确，问题很多，矛盾也是很明显的。至于我们，我们声明，在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人们不会把劳动者看作是处于政权之外代表一个单独的等级。总而言之，我们有权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次革命是否是为全体工人、农民和劳动群众服务的？



亲爱的同胞们：

我们把企业的社会主义管理作为这次庆祝6月19日的中心内容，与此同时，我们还决定从今天起正式发起一次对群众的解释运动，这样就可以在年底以前召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

1971年，在实行石油国有化的次日，我们便在哈西梅萨乌德召开6月19日庆祝大会。革命政权和全体国家干部，都前来参加庆祝会以便向全世界表明：哈西梅萨乌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属于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翌年，在我们庆祝这一纪念日的同时，斯基克达大型石油化工联合企业诞生了。这件事确是使我们政策走向具体化的一个雄辩的证明，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于把全国所有资源都用来为国家的最高利益服务。因此，我们明确地说：革命不能半途而废，我们的独立应该是彻底的。

……对我们来说，哈西梅萨乌德和斯基克达所实施的计划，表明石油和天然气仿佛是一长串链条中互相补充的环节。这些计划实施以后，受益的毕竟是阿尔及利亚的劳动者和人民。这种工业企业的唯一目标，就是为了扩大工人阶级队伍，以加强我们革命的社会主义基础。

去年的庆祝会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当时某些人认为我们的工作毫无成果。这种说法是出自一些国外敌人和国内某些诽谤者之口。等到我们着手实现宏伟的工业计划以后，我们曾听到有人说，我们优先发展重工业，从而影响了轻工业的发展。更加严重的是，当我们把预算中的百分之四十五用在工业建设上的时候，某些人

甚至说，这是有损于农业的作法。实际上，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阿尔及利亚在把工业化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支柱之一的时候，就已经决心将它进行到底了。

诚然，过去我们只能向国外输出温扎的铁，把它运往譬如欧洲的钢铁联合企业去加工，然后再出高价把铁运回来使用。这一情况正如我们输出石油然后输入石油产品一样。

我们已经明确指出，这项政策具有互相补充的性质。经过最初几年的实施，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阿尔及利亚的发展政策，既照顾到重工业，也照顾到轻工业，同时还表明，工业化并不影响农村建设。因此，去年我们特别高兴在土地革命的情况下庆祝这一纪念日。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进行分发第一批土地所有权证书。几个月以后，我们宣布了建设上千个新村庄的计划，仅两天工夫，我们就开始进入了土地革命的第二阶段，并庆祝第一个社会主义村庄的诞生。

我们已经着手从事这项旨在消灭发展中一切不平衡现象的巨大事业。实际上，工业化的实施不能影响农村，同样，农业发展也不能影响教育和培养人材的工作。教育不是社会革命的第三个支柱吗？就是根据这样一个远景计划，我们说，阿尔及利亚革命应该立足于这样的政策之上，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三句话，即：工业革命，土地革命和文化革命。因此，我们绝不能容忍在这三方面的革命之间出现不平衡的现象，因为任何一方面革命的成功，与其他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休戚相关的。所以明摆着的

事实是，我们的任何行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和长期讨论过的。在一个阶段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总要先展开讨论，以便让每个人对国家为某一个具体部门制订的政策提出意见。我们所关心的是，避免出现一切错误或偏差。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大的路线和我们政策的基本目标已开始具体化了。

在我们谈到今天的课题，即企业社会主义管理这一课题的同时，我们不禁回想起开头几年的情况，也就是说，当我们决定采取国有化措施和建立国营公司、国家办事机构的时候，某些人认为阿尔及利亚没有社会主义，只有国家资本主义。这是来自国外的言论。

建立国家企业是必要的阶段，因为当时局势混乱，财政处在危险状况下，法令也没有得到遵守，民族解放阵线直到1962年所代表的政权，后因全国发生危机才垮台了。

从独立到1965年，我们希望看到形势有所好转，但是这种想法完全落空。为了稳定局势，奠定基础，建立机构，便于我们进行国家建设，我们就必须经过建立国家企业这一阶段。只是从那时开始，我们才有可能关心下列一些问题：劳动者的作用，他们的代表制以及他们实际参与管理等，但还没有力量关心他们参与例如被看作是神话般的管理工作，即自管制度。过去几年，我们所以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这是因为某些决定是在公共场合草率作出的，事先毫无研究，丝毫没有注意到培养一批有能力的人来管理这笔巨大的遗产和无与伦比的国家财富。过去所进行的，其实只限于一些民间性的活动，目的在使公

民们有所锻炼。这样一来,结果是老问题还未解决,新问题又成堆了。

那么,难道我们能抛开贫苦农民或靠工资收入生活的人不管,而只对他们说,随你们的便,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吗?要知道,这些人曾经遭受长期的殖民统治、剥削、愚民政策和其它一切奴化教育的迫害,已经困顿不堪了。抛开他们不管,既不合理,也不是革命负责人所应该做的事。一切真正的革命务必求得成功。在一次报告会或一次群众大会上作出一些决定似乎是容易的事,但是,如果它把革命引向失败的话,那就只能是反革命性质的了。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明确肯定,自管制是一条基本经验,不存在官员管理农业的问题。这个经验虽然在别的地方,即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试行过,但我们可以完全客观地说,它未曾收到预期的效果。我们把从殖民者手中收回来的农业土地交给阿尔及利亚的土地经营者,这是不合理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道路,仍然是把农民、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提高到管理者的地位上。

.....

的确,某些投机分子曾经准备迎接大喜日子的到来,他们心想,土地就要分配了,他们总会有一份的。但是,他们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如果允许我再一次谈这个问题,那就是要在土地革命和企业社会主义管理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我曾有机会强调,必须经过这一阶段;而完成这一阶段的办法是:建立国营公司和国家办事机构,并且指定负责人。

我们已经越过了这一阶段,现在,当务之急是,应赋予

企业组织——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企业组织以新的内容,并使它建立在我曾宣布过的原则之上,即具有工会会员资格的劳动者应是政权的组成部分。我们认为工会领导和企业领导都是革命干部。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机构,并制定了经济、社会和文化计划。为了确保对这个机构和其它部门进行有效的监督,必须设置一项有组织的人民监督制度。不然的话,即便借助于一支监督者队伍,也不可能进行全面监督。这种人民监督制,我的意思就是指劳动者代表大会。同样,即使在将来我们创建国营新企业,我们也不可能对这种机构进行监督,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在不断地发展,所有现存的企业部门都不属于私人,而是社会主义企业,这样就需要有数百名监督人员了。

.....

关于投资问题,我认为,在我们工厂中,应该把资金用在购置那些最现代化的机器上,即使这些机器使相当数量的行业被淘汰,但因为现代化机器能在二三十年内确保高质量的产品,这就补偿了损失。

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当我们必须建造一幢房屋的时候,应该购置一套最新式的最奢侈的家具。机器和家具相比,两者是极不相同的。

.....

因此,企业的社会主义组织的目标之一也就是要在我国革命范围内达到的革命目标,即让劳动者参加与生产单位生活相联系的所有工作。.....参加工作并不意味着在企业内部制造某种矛盾,而是使劳动者各得其所,成

为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把劳动者的命运与企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休戚与共，因为这样一来，企业搞得成功，劳动者就觉得有自己一分成绩，而企业一旦失败、或遭到破坏和不能发展了，劳动者也必自食其果。

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不至于举起标语向政府提出抗议。每个人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应该把企业看成是自己的家，因此要保护企业。而负有责任的工人就应该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一分子。因此，他就根本不会有被辞退的危险。

亲爱的同胞们：

我们已经进入为发展而战斗的阶段，这是一场特别艰苦的战斗。前几天，我已经谈过了这个问题。

在政治上经过一系列战斗，从而稳定了局势和建立了有组织国家机构以后，我们已经开始讨论四年计划。这次讨论引起了某些人老调重弹。这些人幸灾乐祸地希望会有那么一天可以看到这些人垮台，他们提出如下的问题：他们到哪里去找他们所说的数十亿资金呢？他们打算出卖国家吗？在开始实施第一个四年计划之前的形势显然就是这样。实现这个计划所需的经费，曾估计为二百七十亿阿尔及利亚第纳尔，而在我们最近举行的几次会议上，已经发觉，为实现这个计划已经支出了三百二十亿至三百七十亿第纳尔，也就是说，比最初的估计增加了七十亿。尽管如此，国家还是日益强盛。

再说，即使这次计划的经费预计要达到二百七十亿，但现在专家们为了使数目不太惊人，把各个公司建议的数字统统加在一起，预计达到六百至一千亿第纳尔。超

过原计划一百或二百亿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投入到最艰巨而又多么光荣的战斗中去了。难道还有比解放以后建设一个国家更加激动人心的战斗吗？然而这样的战斗需要钱，尤其是需要协调配合、深谋远虑以及严格履行勤俭节约。

.....

当工人的命运同企业和生产的命运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时候，工资问题必然要提到日程上来。这个问题一旦有人提出来，我在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工资问题应该把工人同生产联系起来考虑、还是不把他们联系起来考虑呢？讲到工资改革问题，应该说，我们国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国家的工资改革是与生产发展相联系的。如果我们不在一定限度上把工资改革和生产发展联系起来，那就意味着我们必将面临某种经济停滞现象。

.....

因此，在城市里必须推广企业社会主义管理和在农村必须继续进行土地革命。这两件事是齐头并进的。这就是我在这次会上要向各位谈的问题。

.....

至于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今天是否有力量解决工资问题。事实上，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如果从总的方面来看国家财政状况完全象企业那样，有可能提高工资的话，那么我们就将作出决定。这对我们工人群众来说，是一份应得的礼物。完全象第一个四年计划一样，下一个四年计划也需要工人和负责人作出巨大的努力。在最

近几个月里，革命委员会和政府方面已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的一无所有的群众的社会问题。从现在起到本年度末，我们计划在这方面作出一项重要决定，即有关在国营企业内实施公费医疗问题。

这是我们能够着手进行的有利于一无所有的群众的最起码的工作。我们认为，这样一项决定将进一步巩固革命和社会的经验，将促进阿尔及利亚贯彻执行社会正义事业。我们将每年作出一项有利于群众的新决定，因为我们考虑到，革命是应该为群众服务的。

一句话，首要之点是劳动。我们正在展开一场包括城乡在内的伟大战斗——一场独一无二的、同心协力的战斗。我们需要进行一次全力以赴的全面动员，让我们确定在1980年重新聚会吧！让我们把今后的七年作为一个建设的阶段吧……

……

译自《圣战者报》，1973年6月20日



## 在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于1973年9月5日在阿尔及尔召开。布迈丁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不结盟本身蕴藏着无可置疑的力量”，表示反对关于不结盟的悲观论调；说“真正的和平，不是从大国关系的调整中自然产生的”，“要实现真正的和平”，只能“靠我们的斗争”；主张地中海成为“和平湖”；认为当前面临的任务是反帝反殖和反对各种形式的外国霸权等。讲话全文如下。

各位陛下，  
各位阁下，  
尊敬的代表们、先生们：

阿尔及尔以自豪和喜悦的心情欢迎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当我国还没有恢复它的独立的时候，就是不结盟运动的首倡者之一，对于我国被选定为这次会议的召开地点，它是有理由感到骄傲的。

我们相信，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这次会议，将在我们的人民巩固他们的民族独立、实现他们的合法愿望和加强他们的团结的共同斗争中，使不结盟运动获得新的飞

跃,其目的就是要在世界上建立以各国人民的正义、自由和尊严为基础的持久和平。

这次会议,在目前国际形势发展所赋予它的历史意义之外,还由于参加者的地位和参加会议国家之多而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事实上,今天开幕的会议,是继联合国组织之后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

这种政治活动表明不结盟本身蕴藏着无可置疑的力量。情况远不是象不结盟能否继续存在那种悲观估计那样,完全相反,不结盟大大扩大了它的基地和边疆。不结盟以事实证明,它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的副产品。它涉及一种更为深刻的现实,并符合那些共同决心确保自己生存和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国家最主要的合法的关注。

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不结盟行列,它的国际影响的扩大,说明了这样的事实:不结盟体现了符合我们时代愿望的指导思想。这是不结盟政策富有生命力的有力证明,而不结盟政策首先是以一部分人类的要求为依据的,这一部分人类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长期统治下从默默无闻和屈辱的生活条件中站出来了。

我们这些国家,从各自不同的政治制度、从彼此分隔开来的地理上的距离、从各自文化的特点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从各个国家和地区各自所关心的事务中,在共同的名义下,找到了一种足以掌握形成当前这个世界的某些重大事件、符合伙伴这个日益得到确认的称号的表达思想的方式和采取行动的手段。

不结盟不仅是一个会晤地点，更重要的是它被证明是吸引整个第三世界和其他努力维护独立和稳定以谋求进步的国家的中心。在支配着世界的各种互相影响的力量当中，不结盟的贡献肯定是导致国际关系积极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每天发生的种种事件都显示出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些事件迫使我们思考，并要求我们的看法不断适应事物的发展，以使我们的责任不因表面现象而迷失方向，我们的行动也不要因各种遁词和注意力分散而误入歧途。

直到最近几年，国际生活一直处于原子战争狂和世界毁灭前景的支配之下。冷战中的辩论所造成的僵局，加上现代化武器的贮备和巨大改进，已使各集团直接对抗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除了进行对话和寻求和解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在超级大国之间正在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它们这样做是符合它们现有科学技术和经济水平给他们带来的利益的。与此同时，另一些有关的实力中心正在出现，并且这种相互关系的组成正在增加。所有这些事情都有助于国际关系的调整，而促成这种调整的是由于外交上发生了一些极为重大的事件：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东西方之间的各种最高级会晤、欧洲安全合作会议的召开。

这种变化，在它有助于建立和平的情况下，肯定是积极的。但是，这种变化如果半途而废，不扩大到发达世界的范围以外，我们认为这不过是徒有其表的新气象，只能是在这个特权世界与人类其余部分之间的关系中引起不和

的一个根源。

和平的问题依然有待于解决。仅仅是在发达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不一定就是世界和平。真正的和平,不是从大国关系的调整中自然产生的。真正的和平,并不等于对世界均势的片面看法,也不是把冲突转移到其他大陆去,这些大陆正被当作寻求新的势力范围的对象而在经济上与战略上押下了赌注。一方面,人们喧嚷缓和已经到来,大讲和平共处与合作的好处,另一方面,却继续进行殖民战争,进驻军队,加强战略基地,通过政治干涉和经济侵略等一切奴役企图进行分裂阴谋和操纵武装冲突。

和平依然主要取决于以统治和奴役势力为一方、以解放和独立力量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的根本对抗,也正是这种对抗,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引起了最尖锐的冲突。

只要那种主宰世界的野心没有被铲除,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和真正的发展。要实现真正的和平,只能靠我们作出牺牲,靠我们的斗争,靠我们团结的觉悟,特别是靠对自己和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

关于殖民统治和种族统治继续存在,特别是在南非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人们再不能相信仅仅靠正式表明立场就会取得效果。是时候了,我们应该共同以政治和物质方面寻求加速这些国家的解放和完全实现非洲大陆政治解放的办法。这场斗争同我们大家都密切相关,我们不能对那些对我们的兄弟所犯下的罪行无动于衷,也不能目睹人民处在殖民统治下而自甘屈辱。

既然其他许多非洲国家人民将继续与殖民主义作斗

争，继续抵抗各种形式的压迫和种族隔离，那么，非洲就应该把它看作是自己受到世界帝国主义干涉的威胁。世界帝国主义就是殖民主义的支持者。

在那样的情况下，非洲各国的独立就是不完整的，而且有丧失的危险。

要改变这种局面，非洲各国人民只有加强他们的武装斗争，并从非洲各国和世界上一切支持自由事业的力量那里争取对他们正义斗争的更大的支持。

我们注意到，在第三世界建立和平的条件并不仅仅是消灭直接的殖民统治和种族压迫。帝国主义干涉日益明显的趋势是在一些地区制造紧张局势，以保证它对一些在经济上和战略上具有重大利益的地区进行控制。

因此，我们看到：直接或通过中间国家进行侵略，利用政治不稳定、一般通过经济上的威胁和施加压力手段插手干涉的情况层出不穷。在这一点上，阿拉伯湾的局势特别令人不安。

这些事实说明了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政策特征，这些事实集中表现在中东，“以色列”在那里充当了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进行侵略和统治的工具。继续执行种族主义政策、把整个一个民族从它的祖国驱逐出去、对各主权国家不断进行侵略、用武力占领和并吞领土；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以色列”这个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殖民地和军事力量在这个地区究竟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已纳入了广泛的人民解放运动，它在第三世界的枢纽地带抵抗帝国主义。因此巴勒斯坦

人民有权得到我们的支持和尊敬。同所有解放运动团结一致，是不结盟的根本原则之一。这种团结是不容选择的。

非洲国家决定同“以色列”断绝关系是觉悟提高的结果，而这种觉悟的提高正在不断明确地表现出来。这是鼓舞我们团结的理所当然的表现，因为这种表现是符合不结盟这个正确的概念的。

无论历史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色列”肯定不能战胜各国人民的意志和抵抗。

各位陛下，

各位阁下，

尊敬的代表们：

在现阶段，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造成的冲突和紧张局势是构成对各国人民的安全与和平最严重的障碍。

越南人民的抵抗既是一个榜样，又是一个警告。帝国主义国家不管使用什么灭绝手段与方法，都不能战胜一个民族的决心。

越南人民的斗争成果，同柬埔寨和老挝人民的斗争成果一样，都有助于促进不结盟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潮流。当然，动荡不定的情况继续存在，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但是越南已经取得的成果、临时革命政府所取得的胜利，加上由于民族和解而得到确认的老挝中立以及柬埔寨爱国者即将取得的胜利，这一切都表明实力政策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总破产。

在我们方面，我们一贯致力于在地中海实现不结盟

的目标、防止世界这一地区成为各集团之间的另一个对抗地区和危害各国人民安全的大量军事力量的集结点。

在这个地区,同在印度洋一样,也没有什么要填补的真空。我们这些国家已经成熟了,并认识到为保障自己的未来所肩负的责任。使地中海成为一个和平湖,成为一个不受实力和野心任意摆布的合作地区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但是,我们这些国家要得到安全,就必须取得经济解放,结束垄断组织的压迫和剥削,建立真正的民族独立。如果通过各国人民获得民族独立来消除殖民统治已成为历史现实,那么很明显,这种独立只要没有被真正的经济解放所充实和支持,仍将是不可靠的和形式上的。当然,老牌殖民主义已经在许多战线上退却,但是它正在用另一种形式控制世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财富。事实上,第三世界的国家正在遭到外来强国和多国公司的压迫和束缚,被置于经济上依赖和从属的地位,从而使它们的发展计划全部落空。

殖民主义对各国资源的掠夺,不仅过去是使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在各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至今仍然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状况日益恶化的不变的原因,它们与各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逐年扩大。

还应该提醒一下,过去和今天的掠夺——过去随着殖民征服而进行的掠夺和今天仍在我们眼前以更巧妙更疯狂的方式进行的掠夺——在很大程度上给西方带来了繁荣和惊人的发财致富。事实确实如此,尤其是因为我

们亲自看到新殖民主义剥削制度的强化，速度不断地加快，胃口也越来越大，其目的是企图把发展中国家掠夺一空。

此外，世界贸易的结构和现行规章使事情恶化了，这些结构和规章主要是根据工业化国家的利益而建立的，它们把第三世界的贸易放在次要地位，好象这些国家的人民只是为工业化的国家服务的一些简单工具而已，工业化国家不断地发财致富和获得发展，而第三世界则不断地穷困和衰退。

只应由西方国家负责的国际货币危机，给我们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并严重地影响这些国家谋求发展的努力。

从那时起，每个人都在考虑如何制止这种严重的衰退过程，因为这种衰退过程损害我们三大洲的前途。至于我们，我们应该自问，为完全消灭我们的落后，排除那些阻碍我们发展和解放的一切消极因素，我们是否已经尽了力呢？

实际上，解决问题的关键掌握在我们手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只有动员和发挥这些国家人力物力的全部潜力，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够彻底改变当前的历史局面。

如果各国人民的意志统一起来，有效地加以指导，并能自由地表达出来的话，那么，这种意志就能够改变局势，使事态的演变进程正常化，也就能与各种外来的威胁作斗争。

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中，收回民族财产



的进程，规模很大。这一进程表现了各国人民要结束不平等条约和拒绝过时的、反映帝国主义国家利益的国际法的束缚这一日益坚定不移的决心。根据现代世界的新条件，考虑到各国人民有收回和使用他们的财富而不受到任何危害的当然权利，把作为对那些在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中掠夺和剥削他们、因而当然应向他们赔罪的人的犒赏的国际法准则重新加以调整，现在不是已经是时候了吗？

当然，不结盟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应当把它们的合作扩大到各个方面。每当涉及维护和捍卫第三世界利益时，它们主要应通过不断的磋商来使它们的立场协调一致。同样，它们的合作还应当扩大到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进一步研究扩大贸易的可能性，并在货币和金融方面建立紧密的合作，以便不结盟国家能够有效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使它们在正在准备中的重要贸易与货币谈判中能够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至于同发达国家的合作问题，只要这种合作在健康、平衡的基础上进行，只要这种合作遵循平等互利的目标，它就可能成为我们这些国家发展政策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补充。

各位陛下，  
各位阁下，  
尊敬的代表们：

说非殖民化，或者更确切地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本世纪真正的历史性重大事件之一，并不夸大。然而，这一广泛的解放运动不应陶醉在自满自足中。

民族解放事业必然具有一种总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性质。首先,它也属于精神范畴。显然,在各方面实行真正的非殖民化,首先意味着精神的非殖民化。

这就是说,我们各国人民觉悟的提高,仍然要以确定下面一种政治思想和建立下面一种行动计划为条件:考虑各国的现实、有效价值和更好的生活与尊严的向往,而不是考虑过去的无效的神话和目前微不足道的贷款。我们各国人民在发扬久经考验和最能促进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与文化成就的同时,将谨慎而勇敢地把能够促使他们前进的——并使他们避免停滞不前和留恋过去这种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危险的——现代化和普遍化的因素,纳入到他们能得到恢复的国民生活中。

各位陛下,

各位阁下,

尊敬的代表们:

通过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一切,得出了不结盟的一种概念,但是这种概念将由于大家提出的高见而得到更好的确定。

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斗争,反对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外国霸权的斗争,解散集团,撤消军事基地,全面彻底裁军,这些就是我们面临的任務,如果我们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出现建立在各国平等、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的基础上的和平的话。这种民主化应当越来越成为现实。解决与我们这些国家直接有关的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不应当只取决于某些集团的权力,

让其中几个人的责任来代替大家的责任。

在同一范围和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要说的是，联合国应当考虑由于好几个第三世界国家取得独立而在世界上发生的积极的变化，重新审查它的结构，以便实现公正与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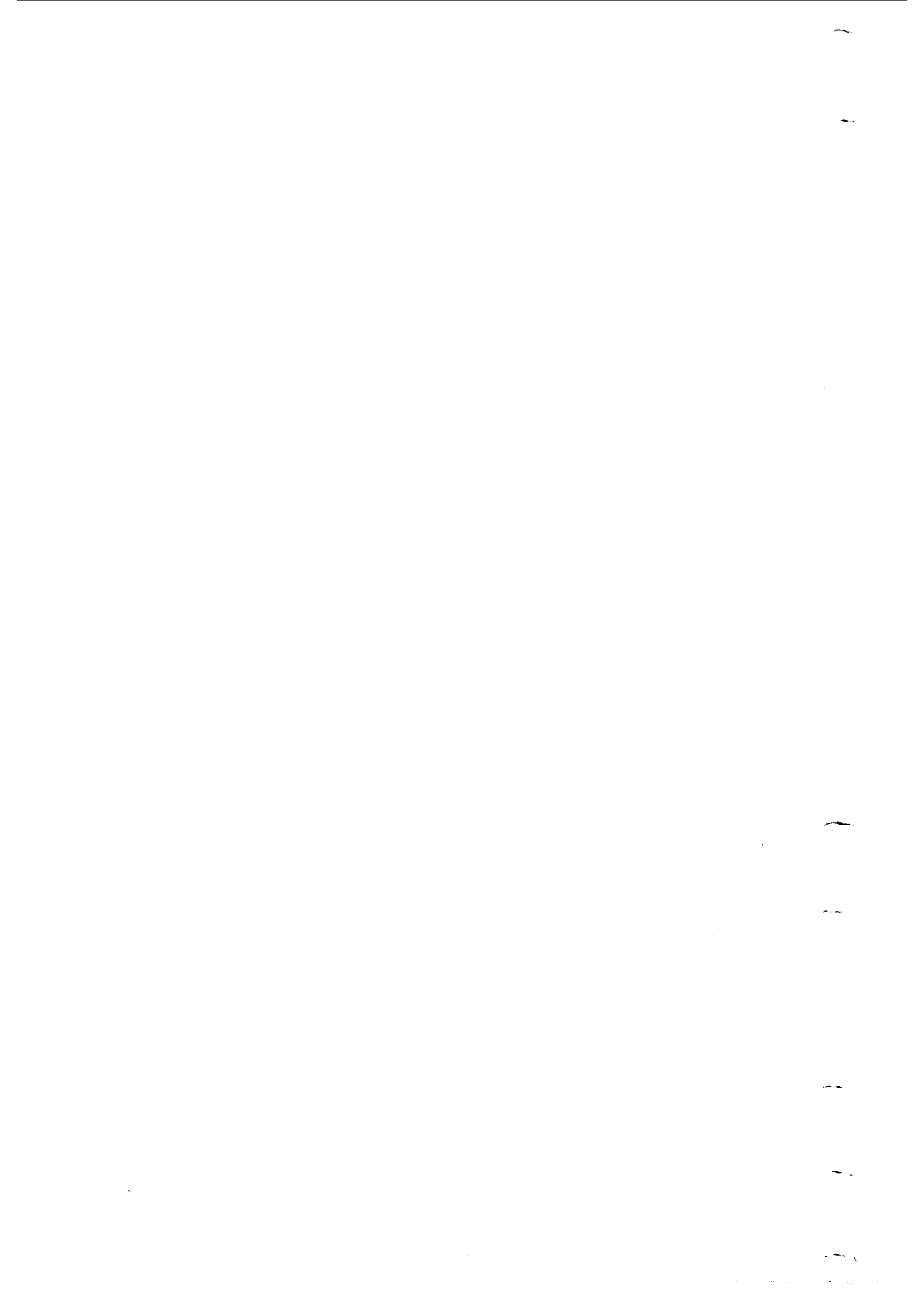
为了实现它的崇高目标，不结盟国家运动应该组织它的力量，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商，加强它们的团结，特别是在群众组织中，并在各方面提出多种多样有利于各成员国和有利于人类的创造性建议。

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为了符合越来越多的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国家的愿望，为了完成不结盟的历史进程，在这种意义上，应该以什么形式组织我们的力量呢？

这要我们大家来决定。我们希望，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在这方面，就象在其他应受到我们重视的方面一样，能够提供最适合我们各国人民的期望和我们时代的理想的解决办法。

我再一次对你们来到阿尔及利亚表示欢迎，同时祝愿你们访问愉快，并祝愿我们的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译自《非洲革命》第498期，1973年9月7—13日



# 附 录

## 胡阿里·布迈丁

1932年(?)8月23日生。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主席兼总理。军官。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胡阿里·布迈丁上校是忠实的社会主义者，同时又是虔诚的穆斯林。他上台已五年多了，在世界各国首脑当中，他仍然是一个谜一样的、难以捉摸的人物。甚至他的名字也增加了这种神秘感。胡阿里·布迈丁是他在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革命初期战争中用的一个化名，在反法革命中他是一个关键人物。尽管他的私人生活带有神秘的色彩，但是，毫无疑问，布迈丁自从1965年6月从艾哈迈德·本·贝拉手中夺取政权以来，在为一千三百五十万阿尔及利亚人民提供政治稳定 and 经济发展方面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就，他在阿拉伯国家各政府间是很受尊敬的。布迈丁又是阿尔及利亚的总理兼国防部长。

胡阿里·布迈丁的生活和他的名字是同阿尔及利亚革命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关于他早年的生活事迹，众说不一而又互相矛盾，布迈丁对他本人的出身经历的各种说法也没有加以澄清。甚至对于他的年龄也是有争论的，他的出生年月就有从1925年到1932年之间的种种说法。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他的童年和学生时代的情况，大部分是从1965年秋天一批新闻记者从访问他的父

亲时得来的，访问记由彼得·布雷斯特拉普和戴维·奥塔韦发表在1966年2月13日的《纽约时报杂志》上。访问记说：布迈丁于1932年8月23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东部的贫苦地区，靠近格勒马的一个叫做克劳泽尔的小村庄，父母共有七个孩子。布迈丁的本名是穆罕默德·本·卜拉欣·布哈鲁巴。老布哈鲁巴是一个种小麦的小土地所有者、虔诚的穆斯林，从未学过法语。他父亲记得，布迈丁是一个“羞怯、沉静的孩子”，喜欢读书，为了读书可以不出去玩，甚至不吃饭。

布迈丁六岁的时候进了格勒马的一所法国小学读书，同时又在本地的古兰经学校接受宗教训练和学习阿拉伯语法。1945年他在格勒马亲眼看到法国警察驱散穆斯林的一次街头示威时，第一次尝到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与法国当局之间的冲突的滋味。十四岁的时候，布迈丁开始了他那一段与大多数青年同胞不同的教育。由于阿尔及利亚当时被看作是法兰西宗主国的一部分，阿尔及利亚人一般都是按照法国的课程接受教育的。布迈丁相反却在君士坦丁一所在阿尔及利亚也很少有的凯塔尼-梅德尔萨中学学习了六年传统的阿拉伯伊斯兰教课程。

1952年布迈丁为了进一步深造，进了开罗的著名的阿兹哈尔伊斯兰教大学。据他父亲说，法国军队曾经征召他去服役，当他的父亲请求延期服役遭到拒绝后，他便同四个朋友一起向东逃走，越过突尼斯边境前往开罗。据说布迈丁在开罗学习时，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了。1952年开罗正处于青年军官们推翻法鲁克国王的革命

时期。他在开罗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小组发生联系——其中就有艾哈迈德·本·贝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历史性的领袖人物”。也有些材料说布迈丁曾经在突尼斯大学的齐图纳学院读过书，说他一个很短时期内在法国一家工厂做工，又说他在参加民族解放阵线这个为人所知的阿尔及利亚革命组织之前，曾经在格勒马当过教师。

1954年11月，民族解放阵线第一次公开反抗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时，布迈丁已经是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了。法国报刊说他在莫斯科或北京受过训练，这种说法看来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已经为他的亲密的战友否定了。据信他于1954年在埃及希尔温的训练营第一次接受军事训练。后来，他又在西属摩洛哥的纳多尔由埃及资助的游击训练营中受过训练。

1955年初，布迈丁同其他八个人秘密越过摩洛哥边境进入阿尔及利亚，开始从事游击活动。他的活动地区是瓦赫兰，但是那里的法国居民很多，而且阿拉伯人的态度冷淡，使民族主义者感到泄气。就在这个时候，他把瓦赫兰附近的一条山脉的名称作为他的化名。到1957年布迈丁已是第五军区——包括瓦赫兰军区——的司令。这是民族解放阵线把阿尔及利亚分为六个军区中的一个。1958年6月他率领部队越过边境回到摩洛哥的庇护所，成为边境两侧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部队——民族解放军的司令。1958年9月民族解放阵线建立了以费尔哈特·阿巴斯为总理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总部设在开罗。据说布迈丁是临时政府的国民议会——



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国民会议的成员，同时他继续指挥边界部队。

1960年3月15日，布迈丁这时已是上校(民族解放军最高的军衔)，被任命为民族解放军总参谋长，其总部设在突尼斯的加迪茅。这样，他事实上已经成为阿尔及利亚军队的首脑。那时边界部队约有两、三万人。由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边界的防卫力量不断增强，民族解放军那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与之抗衡，因此布迈丁没有在阿尔及利亚境内亲自参加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而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前这一段时期内，他致力于向民族解放军灌输为使命而战的观念，使之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战斗部队。在意识形态方面，他强调阿尔及利亚传统和阿拉伯文化，而不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或毛派的理论。曾经发生过几次要把他罢黜的企图，都未得逞，他赢得了部下的效忠，为他几年后取得阿尔及利亚主席的权力打下了基础。

阿尔及利亚革命于1962年3月28日宣告结束，法国政府与民族解放阵线在埃维昂进行了五个月的秘密谈判之后，终于同意了阿尔及利亚独立。1962年7月1日阿尔及利亚全国举行公民投票，百分之九十一的投票者投票赞成独立。两天后，法国总统戴高乐正式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

选举之前建立的临时政府以本优素福·本·赫达为首，其中有曾在突尼斯流亡政府中占优势的其他“中央集权主义者”政客。布迈丁并不尊重这些中央集权主义者，他认为他们在流亡时生活太浮华了，在埃维昂谈判

时对法国人让步太多了。而中央集权主义者也不信任布迈丁。本·赫达唯恐发生政变，于1962年7月25日把布迈丁和军队参谋部其他两个成员一起免职。可是，布迈丁仍然得到军队的拥护，他转而支持刚从法国监狱获释的、颇得人心的革命英雄艾哈迈德·本·贝拉。1962年7月11日，布迈丁和本·贝拉从摩洛哥返回阿尔及利亚，在特累姆森另设总部。本·贝拉的势力巩固了他们的权力，孤立了中央集权主义者。在1962年9月20日的全国选举中，一批经过精选的本·贝拉派的候选人，以约百分之九十的选票被选进了国民议会，本·贝拉被推选为总理。布迈丁经内阁任命为国防部长，1962年9月29日通过。1963年5月17日，布迈丁又成为第一副总理。

本·贝拉在执政三十三个月中，在国外赢得了作为亚非集团的主要领袖之一的声誉，但在国内由于八年战争的破坏和大部分欧洲专家、熟练工人的撤离，却未能减轻政治上经济上的混乱。本·贝拉体制的那种个人专断作风和社会主义实验，引起了某些革命的“历史性的领导人物”的不满，特别是在贫穷和有独立传统的卡比利亚地区。起先，布迈丁支持本·贝拉，把几次叛乱的企图压了下去。1963年夏天，他扑灭了由穆汉德·乌·哈杰上校和埃特·艾哈迈德在卡比利亚领导的叛乱。一年后，他又镇压了南方地区司令穆罕默德·沙巴尼上校领导的叛乱，穆罕默德·沙巴尼最后被俘并被处决。

与此同时，布迈丁集中力量加强阿尔及利亚的军队，1963年至1964年冬，这支军队在同摩洛哥进行的一次边

界战争中打得不好。1963年底他访问莫斯科，为获得苏联的军事装备和教官而进行谈判。他不声不响地采取步骤使军队实际上成为国中之国：提高了军饷，组织了一些合作社去经营军队印刷厂、养鸡场以及家具工厂等企业。由军队主办，出版了一种双周刊《陆军》。1964年夏天，一些外国观察家注意到，布迈丁的这支五万人的国家人民军，看来是阿尔及利亚的“唯一有组织的力量”。

1963年9月，本·贝拉根据新宪法被选为任期五年的主席，布迈丁被选为副主席，仍兼国防部长和陆军司令。本·贝拉把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两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1963年4月，本·贝拉免去穆罕默德·赫德尔的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的职务，由他亲自担任总书记。1964年3月，本·贝拉任命塔哈尔·兹比里上校为陆军总参谋长，以加紧对军队的控制和削弱布迈丁的权力。但是布迈丁和兹比里达成协议，继续由他本人掌管军队。1964年7月，本·贝拉命令十五个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向他汇报，而不向布迈丁的亲信内政部长艾哈迈德·迈德格里汇报。不久，艾哈迈德·迈德格里向内阁辞职，以示抗议。

到了1965年春，本·贝拉和布迈丁之间的摊牌看来是不可避免了。5月，本·贝拉试图迫使布迈丁在内阁中的主要盟友之一、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辞职。一些观察家把预定于1965年6月29日在阿尔及尔召开亚非会议的安排，视作本·贝拉为扩大自己的权力，提高自己的威信，便于实现有计划地解除布迈丁

陆军首脑职务的行动。兹比里将本·贝拉密谋驱逐布迈丁的内情告知布迈丁。布迈丁相信军队对他是忠诚的，于是在1965年6月19日使用一支大约一千人的部队，发动了一次不流血的政变。本·贝拉和他的五个助手被捕。亚非会议先是延期，后来就取消了。

1965年7月5日，布迈丁正式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由二十六人组成的政权机构。他在一次广播讲话中表示阿尔及利亚愿意同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他声明军事政变的目的在于恢复“合法的国家体制……允许人民有表达意愿的自由，并按照为独立而斗争的革命原则制订宪法”。美国在第二天就承认了布迈丁的政权。二十人的新内阁于7月10日组成，成员大都是以有技术知识而闻名的人物，包括几个本·贝拉政权留下来的成员，如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和内政部长迈德格里。

最初，人们对布迈丁的政治方向很少了解。有些观察家认为他是“毛派”或“卡斯特罗派”，而另一些观察家则认为他是右翼军人。可是，不久他就以一个实用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面貌出现了，他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远不及受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教海的影响来得大。他上台不久就这样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哲学的。必须使非特权阶级从我们的革命中得到好处。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准则。”

布迈丁采取了一种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相混合的实用主义政策，用来摆脱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困难；为了表示阿尔及利亚在需求上也是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他既邀请苏联国家计划部门、也邀请世界银行前来阿尔及

利亚进行经济开发的调查。1966年他把矿山和保险公司收归国有，1967年又把国内石油销售公司收归国有；但是，以前收归国有的企业如小商业和农场，却归还给原主。他的政府虽然曾经没收过一些外国控制的公司，但是他仍然设法鼓励外国投资。在年青有为的技术干部的协助下，布迈丁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计划，特别是在作为阿尔及利亚经济基础的石油生产方面。1970年6月，他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四年经济发展计划。虽然有大量失业等问题尚未解决，外国观察家对布迈丁政权在经济方面的成就仍然是有好评的。

布迈丁给阿尔及利亚带来了某种稳定，在民族解放阵线统治下，阿尔及利亚仍然是一党执政的国家。在初期，他曾受到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工人运动的挑战，但在1966年他已控制了运动。他以前的合作者兹比里上校于1967年12月发动了一次反对他的政变，但没有成功，被迫逃往国外。1968年4月，有一些身份不明的凶手企图暗杀布迈丁，也未得逞。从此以后，他的权力，就没有遇到过严重的挑战。

在对外政策方面，布迈丁试图把社会主义思想同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利益和独立调和起来。虽然阿尔及利亚从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接受了很多援助，但阿尔及利亚仍处于苏联的轨道之外。阿尔及利亚同法国之间尽管偶有磨擦，但是两国的合作，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内的合作，依然是布迈丁对外政策的主要方面。在中东政策方面，布迈丁主张以战争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他是巴勒斯坦游击运动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在1967年6月以色列-

阿拉伯六天战争时，他批评苏联没有给阿拉伯国家以更多的支援，并因美国援助以色列同美国断交。但在非正式的交往方面，阿尔及利亚同美国的关系最近已有所改善。在解决同摩洛哥和突尼斯的边界纠纷方面，他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胡阿里·布迈丁上校身材中等，瘦削，谈吐温和，外貌象个苦行者，绿眼睛，淡茶色的红头发。他曾有过“瑞典人”的绰号。在《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把他的外貌描绘成“与其说象一个老游击队员，不如说更象一个饥饿的爱尔兰诗人”。他烟不离口，据报道，几年以前他已从抽香烟改抽哈瓦那雪茄烟了。他喝黑咖啡很多，并且是一个熟练的棋手。有些材料说他结过婚，现在离婚了，但接近他的人否认此说。他的一个同事说，“他唯一的老婆就是军队”。

译自美国《现代传记》(Current Biography)月刊

1971年1月号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